

魯迅論史選集



通俗本

上海龍書局
海虎書店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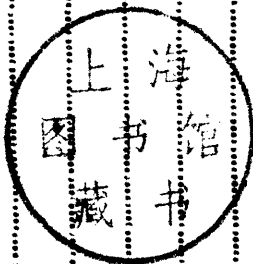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6912B

魯迅論文選集目次

代序(一)——新中國的思想界領袖魯迅	一
代序(二)——魯迅論	一
一九一八年	四五
「聖武」	四五
一九二一年	四九
事實勝於雄辯	四九
一九二二年	五一
反對「含淚」的批評家	五一
卽小見大	五四
一九二四年	五七



曠勿「糾正」	五七
一九二五年	六一
並非閒話	六一
一九二六年	八一
一點比喻	八一
馬上日記	八七
一九二七年	一〇三
革命時代的文學	一〇三
盧梭和男口	一一三
革命文學	一一七
無聲的中國	一二〇
一九二八年	一二九

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	一二九
一九二九年.....	一三七
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一三七
流氓的變遷.....	一四四
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	一四六
我和「語絲」的始終.....	一四七
一九三〇年.....	一六三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一六三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一九三
一九三一年.....	一九九
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	一九九
「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二〇五

唐朝的釘棺	二二一
一九三二年	二二三
論「第三種人」	二二三
祝中俄文字之交	二二九
一九三三年	二三七
又論「第三種人」	二三七
「蜜蜂」與「蜜」	二四三
九一八	二四五
「以夷制夷」	二五一
電的利弊	二六一
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	二六三
關於翻譯	二七五

中華學藝社清點組

清點證

圖字第 023821 號
類別

1954年 月 日

一九三四年.....二七九

憶章素園君.....二七九

一九二五年.....二八九

病後餘談.....二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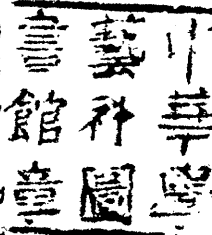
完



代序（一）

——新中國的思想界領袖魯迅

M. Bartlett
石 孚 譯



中國最有名的小說家魯迅先生，是新文化運動裏的健將。周樹人氏（魯迅是他的別名）曾在日本留學至十年之久。他雖對於醫學很有興趣，但是他的時間大部分是用在研究俄國文學及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學上了。他的兄弟周作人氏幾乎和他齊名，並且是散文作家中的代表者。他們兄弟二人在日本留學時，便翻譯一些俄羅斯，波蘭，及南歐其他各國的小說。他們回國後，完全在文學方面努力。魯迅和 C ekhov, Schaitzler, Oliver, Wendell, Holms 一樣，拋棄了醫業。以致力於文藝的創造。他現在四十七歲，一般人認他為現代中國文學的寫實大家和短篇小

說的名手。

我會見魯迅，在一九二六年夏天他還未從北京到廈門以前，他是個急進派，對於張作霖統治下摧殘思想的手段深表不滿，所以不能不設法離開。當時從北京南下的風氣很甚，把北京多數的文人都吸引走了，魯迅便是其中之一。

『我覺得俄國文化比其他外洋文化都要豐富，』他對我說。『中俄兩國間好像有一種不期然的關係，他們的文化 and 經驗好像有一種共同的關係。契可夫是我頂喜歡的作者。此外如哥可利，屠格涅夫、陀斯托夫司基，高爾基、托爾斯太，安特別夫，顯克微支，尼采，和希列等，我也特別高興。俄國文學作品已經譯成中文的，比任何其他外國作品都多，並且對於現代中國的影響最大。中國現時社會裏的奮鬥，正是以前俄國小說家所遇着的奮鬥……。』新青年雜誌裏，常有魯迅的小說。中國短篇小說的開始，即在一九一八年他的狂人日記出版的時候。

魯迅注重寫實，敢於描寫平常事件。他不問詩詞，他的着重點在鄉村和農民生

活。他曾說：「我的生活裏沒有愛，也沒有詩。」他的小說很像陀斯妥夫司基和高爾基二人的作品，極富於同情心和熱烈的情緒。最著名的阿Q正傳已經譯成了法、俄、英、德、四國文字。法國文學大家羅蘭氏讀完這篇小說後曾說：「這一篇寫實作品，裏面很多譏諷言詞。我永也不會忘記阿Q那副憂愁的面孔。」這是魯迅小說中唯一已經譯成西文的作品。魯迅用寫實方法描寫一個農民——阿Q——的思想，把阿Q那種無知的情景，繪得淋漓盡緻。阿Q不識革命爲何物，不解新時代的意義，這都歷歷說了出來。在風波裏，他描寫鄉村生活，並且用滑稽和諷刺筆調，敘述農民怎樣不受社會改革的影響。狂人日記是一個對於舊文化的諷刺作品。魯迅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吶喊於一九二三年出版，以後還陸續爲其他小說集和論文集。有人說：魯迅作品裏充滿了人生悲劇中種種極平庸的事件。他是一個天生的急進派，一無所懼的批評家和諷刺家，有獨立的精神，並且是民主化的。他用普通話寫作品。他是一切迷信的死敵人，篤信科學，鼓吹新思想。他曾對我說：「孔教和

佛教都已經死亡，永不會復活了。我不信上帝，祇信科學和道德。中國人本和宗教無緣，所以再也不會信仰它。中國人今日最大的毛病是懶，他們一旦努力起來，內戰馬上就會停止。那時中國也就強盛。工作和科學二者是中國的救星。一

X

X

X

X

X

(文載美國『Current History』一九二七年十月號，謂文載當代第一卷第一期。)

代序（二）

魯迅論

方璧

幾年來，常在各種雜誌報章上，看到魯迅的文章。我和他沒甚關係，從不會見過面，然而很喜歡看他的文章，並且讚美他。只因我一向居無定處，又所居之地，在最近二三年來，是交通不便，難得看見外界書報的地方，所以並未完全看過魯迅的著作。近來看見一本關於魯迅及其著作，——這是去年出版的，可是我到今年纔看得到。——方知世間對於魯迅這人及其著作，有如此這般不同的論調。又從此書，知道魯迅的著作，大都已有單行本，要窺全豹，亦非難事，這就刺戟我去買了他的已出版的全部著作來看。兩月前，在一個山裏養病，竟把他的著作全體看了一

遍，頗有些感想，拉雜寫下來，遂成此篇。如果題名曰「我所見於魯迅者」或是「關於魯迅的我見」，那自然更漂亮，不幸我不喜這等扭扭捏捏的長題目，便率直的套了從前做史論的老調子，名曰「魯迅論」了。

二

魯迅是怎樣的一個人呢？看見過他的人們描寫他們的印象道：

一個瘦瘦的人，臉也不漂亮，不是分頭，也不是平頭。穿了一件灰青長衫，一雙破皮鞋；又老又呆板，並不同小孩一樣。他手裏老拿著烟捲，好像腦筋裏時時刻刻在那兒想什麼似的。（關於魯迅及其著作的初次見魯迅先生，馬珏。）這是一個小學生的印象。

又一位女士描寫他的印象道：

我開始知道魯迅先生是愛說笑話的。……然而魯迅先生說笑話時他自己並

不笑，……我只深刻地記得魯迅先生的話很多令人發笑的。然而魯迅先生並不笑。可惜我不能將魯迅先生的笑話寫了出來。（曙天女士訪魯迅先生。）

說起畫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報副刊裏林玉堂先生畫的『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要是你沒有看見過魯迅先生，我勸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鬍子。頭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

（致志摩，陳源。）

這又是一位大學教授的描寫。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前面就有一張魯迅最近畫像。八字鬍子，瘦瘦的臉兒，果然不漂亮；如果在冬天，這個人兒該也會戴皮帽子，穿厚厚的大氅罷。可惜瘦了一點，不然，豈但是「很可以表出，」簡直是「生就成的官僚」罷。

上舉三篇，是值得未見魯迅的人們讀一遍的。在小學生看來，魯迅是意外地不

漂亮，不活潑，又老又呆板；在一位女士看來，魯迅意是外地並不「沉悶而勇猛，」愛說笑話，然而自己不笑；在一位大學教授看來，魯迅「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官僚，不是久已成爲可厭的代名詞麼？

好了，既然人各有所見，而所見又一定不同；我們從魯迅自己的著作上找找我的印象罷。

三

張定璜在他的魯迅先生（亦見關於魯迅及其著作）裏告訴我們說：

魯迅先生站在路旁邊，看見我們男男女女在大街上來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羣在那里蠢動。從我們的眼睛，面貌，舉動上，從我們的全身上，他看出我們的冥頑，卑劣，醜惡和飢餓。飢餓！在他面前經過的有一個不是餓得慌的人麼？任憑你拉着他的手，給他說你正在救國，

或正在向民衆去，或正在鼓吹男女平權，或正在提倡人道主義，或正在作這樣作那樣，你就說了半天也白費。他不信你。他至少是不理你，至多，從他那枝小烟捲兒的後面他冷靜地朝着你的左腹部望你一眼，也懶得告訴你他是學過醫的，而且知道你的也是和一般人的一樣，胃病。……我們知道他有三個特色，那也是老於手術富於經驗的醫生的特色，第一個，冷靜，第二個，還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你別想去恐嚇他，蒙蔽他。不等到你開嘴說話，他的尖銳的眼光已經教你明白了他知道你也許比你自已知道的還更清楚。他知道怎麼樣去抹殺那表面的細微的，怎麼樣去檢查那根本的扼要的。你穿的是什麼衣服，擺的是那一種架子，說的是什麼口腔，這些他都管不着，他只要看你這個赤裸裸的人。他要看，他於是乎看了，雖然你會打扮得漂亮時新的，包扎得緊緊貼貼的，雖然你主張紳士的體面或女性的尊嚴，這樣，用這種大膽的強硬的甚至於殘忍的態度，他在我們裏面看見趙家的狗，趙貴翁的眼色，看見說『咬你幾

口」的女人，看見青面獠牙的笑，看見孔乙己的竊偷，看見老栓買紅饅頭給小栓治病，看見紅鼻子老拱和藍皮阿五，看見九斤老大，七斤嫂，六斤等的一家，看見阿Q的鎗斃——一句話，看見一羣在飢餓裏逃生的中國人。曾經有過這樣老實不客氣的剝脫麼？曾經存在過這樣沈默的旁觀者麼？……魯迅先生告訴我們，偏是這些極其普通，極其平凡的人事裏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魯迅先生並沒有把這個明明白白地寫出來告訴我們，他不是那種人。但這個悲哀畢竟在那里，我們都感覺到，我們無法拒絕他。他已經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時代感傷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裏飽嘗了憂患之後的嘆息，發出來非常之微，同時發出來的地方非常之深。

這是好文章，竟整大段的抄了來了。「老實不客氣的剝脫，」「沈默的旁觀，」「魯迅之爲魯迅，盡於此二語罷。然而我們也不要忘記，魯迅站在路旁邊，老實不客氣的剝脫我們男男女女，同時他也老實不客氣的剝脫自己。他不是一個站在

雲端的「超人」，「嘴角上掛着莊嚴的冷笑，來指斥世人的愚笨卑劣的；他不是這樣的「聖哲」！他是實實地生根在我們這愚笨卑劣的人間世，忍住了悲憫的熱淚，用冷諷的微笑，一遍一遍不憚煩地向我們解釋人類是如何脆弱，世事是多麼矛盾！他決不忘記自己也含有這本性上的脆弱和潛伏的矛盾。一件小事（吶喊六三頁）和端午節（吶喊一八九頁），便是很深刻的自己分析和自己批評。一件小事裏的意義是極明顯的，這裏，沒有頌揚勞工神聖的老調子，也沒有呼喊無產階級最革命的口號，但是我們卻看見鳩首囚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上面，卻有一顆質朴的心，熱而且跳的心。在這面前，魯迅感覺得自己的「小」來，他沉痛地自白道：

這事到了現在，還是時時記起。我因此也時時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幾年來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時候所讀過的「子曰詩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獨有這一件小事，却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暴氣和希望。

所以我對於這篇「並且即稱爲隨筆都很拙劣的一件小事，」——如一位批評者所說，卻感到深厚的趣味和強烈的感動。對於端午節，我的看法亦自不同，這位批評者說：

我讀了這篇端午節，纔背得我們的作者已再向我們歸來，他是復活了，而且充滿了更新的生命。而最使我覺得可以注意的，便是端午節的表現的方法恰與我的幾個朋友的作風相同。我們的高明的作者當然不必是受了我們的影響；然而有一件事是無可多疑的，那便是我們的作者原來與我的幾個朋友是一樣的境遇之下，受着大約相同的影響，根本上本有相同之可能的。無論如何，我們的作者由他那想表現自我的努力，與我們接近了。他是復活了，而且充滿了更新的生命。在這一點，端午節這篇小說對於我們的作者實在有重大的意義，欣賞這篇作品的人，也不可忘記了這一點。（關於魯迅及其著作八〇頁，成仿吾

——吶喊的評論。）

論一段話。雖然反覆詠歎，似乎並未說明所謂「自我表現」是指端午節所蘊含的何方面（在我看來，端午節還是一篇剝露人的弱點的作品，正和故鄉相彷彿，所以其中蘊含的意思，方面很多，）但是尋釋之後，我以為——當然只是我以為——或者是暗指「憤世嫉俗，懷才不遇」等情調是作成了端午節的「自我表現」的「努力。」如果我這尋釋的結論不錯，我卻不能不說我從原文所得的印象，竟與這個大不相同了。我以為端午節的表面雖頗似作者借此發洩牢騷，但是內在的主要意義却還是剝露人性的弱點，而以「差不多說」為表現的手段。在這里，作者很巧妙地刻畫出「易地則皆然」的人類的自利心來；並且很坦白地告訴我們，他自己也不是怎樣例外的聖人。端午節內寫方玄綽向金永生借錢而被拒後，有着這樣的一段話：

方玄綽低下頭去了，覺得這也無怪其然的。況且自己和金永生本來很疏遠。他接着就記起去年年關的事來，那時有一個同鄉來借十塊錢，他那時明明已經收到了衙門的領款憑單的了，因為恐怕這人將來未必會還錢，便裝了一副

爲難的神色，說衙門裏既然領不到俸錢，學校裏又不發薪水，實在「愛莫能助」，將他空手送走了。他雖然自己並不看見裝了怎樣的臉，但此時却覺得很局促，嘴唇微微一動，又搖一搖頭。

並且端午節的末了，還有一段話：

這時候，他忽而又記起被金永生支使出來以後的事了，那時他惘惘然的走過稻香村，看見店門口豎着許多斗大的字的廣告道：「頭彩幾萬元，」彷彿記得心裏也一動，或者也許放慢了脚步的罷，但似乎因爲捨不得皮夾裏僅存的六角錢，所以竟也毅然決然的走遠了。

這又是深刻的坦白的自己批評了。

我覺得這兩段話比慷慨激昂痛哭流涕的義聲，更使我感動；使我也「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人類原是十分不完全的東西，全璧的聖人是沒有的。但是赤裸裸地把自己剝露了給世人看，在現在這世間，可惜竟不多了。

魯迅板着臉，專剝露別人的虛偽的外套，然而我們並不爲可厭，就因爲他也嚴格地自己批評自己分析呵！紳士們討厭他多嘴；把他看作老鴉，一開口就是「不祥。」並且把他看作「火老鴉」他所到的地方就要火着。然而魯迅不餒法，不妥協。在這樣的戰士（野花七七頁）裏，他高聲叫道：

要有這樣的一種戰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鎗的；也並不疲憊，如中國綠營兵而却佩着盒子砲。他毫無乞靈於牛皮和廢鐵的甲冑；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擲的投鎗。

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砲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

那些頭上有各種族幟，繡出各樣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

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微笑，偏側一擲，却正中了他們的心窩。

一切都頹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無物。無物之物已經脫走，得了勝利，因為他這時成了戕害慈善家等類的罪人。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在無物之陣中大踏步走，再見一式的點頭，各種的旗幟，各樣的外套……。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終於在無物之陣中走老衰，壽終。他終於不是戰士，但無物之物則是勝者。在這樣的境地裏，誰也不開戰叫：太平。

太平……。

但他舉起了投槍！

看了這一篇短文，我就想到魯迅是怎樣辛辣倔強的老頭兒呀！然而還不可不看墳後的記中的幾句話：

至於對別人，……還有願使憎惡我的文字的東西得到一點嘔吐——我自己知道，我並不大度，那些東西因我的文字而嘔吐，我也很高興的。……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我有時想就此朋驅除旁人，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即使是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纔真是我的朋友。倘使連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但現在我並不。因為，我還沒有這樣勇敢，那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在這社會裏。還有一種小緣故，先前也曾屢次聲明，就是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着，給他們的世界多有一點缺

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爲止。

（寫在墳後面，墳三〇〇頁。）

看！這個老頭子的口吻何等嫉媚！

四

如果你把魯迅的雜感集三種仔細讀過了一遍，你大概不會反對我稱他爲「老孩子！」張定璜說魯迅。

已經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時代的感傷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裏飽嘗了憂患之後的嘆息，發出來非常之微，同時發出來的地方非常之深。

這話自是確論；我們翻開吶喊，彷徨，華蓋集，隨時隨處可以取證。但是我們也不可忘記，這個在「人生的航海裏飽嘗了憂患」的舟子，雖然一則曰：

本以爲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吶喊自序。）

再則曰：

但我並無噴泉一般的思想，偉大華美的文章，既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一種什麼運動。（寫在墳的後面。）

然而他的胸中燃着少年之火、精神上，他是一個「老孩子」！他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一種什麼運動，然而他的著作裏，也沒有「人生無常」的歎息，也沒有暮年的暫得甯靜的歎羨與自慰（像許多作家常有的），反之，他的著作裏却充滿了反抗的呼聲和無情的剝露。反抗一切的壓迫，剝露一切的虛偽！老中國的毒瘡太多了，他忍不住拿着刀一遍一遍地不懂世故地儘自刺。我門翻開魯迅的雜感集三種來看，則雜感集第一的熱風大部分是剝剔中華民族的「國瘡」，在雜感集第二華蓋集中，我們看見魯迅除奮勇剝剔毒瘡而外，又時有一「歲月已非，毒瘡依舊」的新憤慨。忽然想到的一，三，四，七等篇（見華蓋集），這個與那個（華蓋集一四二頁至一五三頁），無花的薔薇之三（華蓋集續編一一八），春末閒譚（墳二二三

頁），再論雷峯塔的倒掉（墳二〇一頁），看鏡有感（墳二〇七頁）等，都充滿着這種色彩。魯迅憤然說：

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於改變的麼？倘如此，將來的命運便大略可想了，也還是一句爛熟的話：古已有之。（華蓋集十一頁。）

他又說：

看看報章上的論壇，『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還是這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法。（華蓋集一五頁。）

熱風中所收，是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所作的雜感，這六年中，我們看見『思想革命』運動的爆發，看見牠的橫行不可一世的殺那，看見牠終於漸漸軟下去，被利用，被誤解下去，到一九二四年，蓋幾已銷聲匿跡。是不是老中國的毒瘡已經剝

去？不是！魯迅在一篇雜感長城裏說：

我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兩種東西聯爲一氣造成了城壁，將人們包圍。何時纔不給長城添新磚呢。

（華蓋集五百〇〇。）

舊有的和新補添的聯爲一氣又造成了束縛人心的堅固的長城，正是一九二四年以後的情狀。在另一處，魯迅有極妙的諷刺道：

在報章的角落裏常看見青年們的諄諄的教誡：敬惜字紙咧；留心國學咧；伊卜生這樣，羅曼羅蘭那樣咧。時候和文字是兩樣了，但含義却使我覺得很耳熟；正如我年幼時所聽過的耆宿的教誡一般。（華蓋集續編一一九頁。）

然而攻擊老中國的國瘡的聲音，幾乎只剩下魯迅一個人的了。他在一九二五年內所做的雜感，現收在華蓋集內的，分量竟比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這六年中爲多。一九二六年做的，似乎更多些。「寂寞」中間這老頭兒的精神，和大部分青年

的「闌珊」，成了很觸目的對照。

魯迅不肯自認爲「戰士」，或青年的「導師」。他在寫在墳的後面說：

倘說爲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爲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麼走。

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那當然不止一條，我可正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有時也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而憎恨我的東西如所謂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饕餮，所以我說話常不免含糊，中止，心裏想：對於偏愛我的讀者的贈獻，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個『一無所有』。我的譯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後來加五百，近時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願意的，因爲能賺錢，但也伴着哀愁，怕於讀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時常更謹慎，更躊躇。有人以爲我信筆寫來，直抒胸臆，其

寶是不盡然的，我的顧忌並不少。我自己早知道畢竟不是什麼戰士了，而目也不能稱前驅，就有這麼多的顧忌和回憶。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裏掏出錢來放在我手裏，那錢上還帶着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我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罷。但也偶爾想，其實倒還是毫無顧忌地說話，對得起這樣的青年。但至今也還沒有決心這樣做。

但是我們不可上魯迅的當，以爲他真個沒有指引路；他確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什麼運動，他從不擺出「我是青年導師」的面孔，然而他確指引青年們一個大方針：怎樣生活着，怎樣行動着的大方針。魯迅決不肯提出來呼號於青年之前，或扳起了臉教訓他們，然而他的著作裏有許多是指引青年應當如何生活如何行動的。在他的創作小說裏有反面的解釋，在他的雜感和雜文裏就有正面的說明。單讀了魯迅的創作小說，未必能夠完全明白他的用意，必須也讀了他的雜感集。

魯迅曾對現代的青年說過些什麼話呢？我們來找找看：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華蓋集四〇頁）。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祕製膏丹，全都踏倒他。（華蓋集四三頁。）

在別一地方，我們看見魯迅又加以說明道：

……但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當向怎樣的目標，那麼，我只可以說出好為別人設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撲滅他！可是還得附加幾句話以免誤解，就是：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中國人雖然想了各種苟活的理想鄉，可惜終於沒有實現。但我却替他

們發見了，你們大概知道的罷，就是北京第一監獄。這監獄在宣武門外的空地裏，不怕鄰家的火災；每日兩餐，不慮凍餒；起居有定，不會傷生；構造堅固，不會倒塌；禁卒管着，不會再犯罪；強盜是決不會來搶的。住在裏面，何等安全，真正是『千金之子座不垂堂』了。但闕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古訓所教的就是這樣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動。……我以爲人類爲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爲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却引人到死路上去！（華蓋集四九頁至五〇頁。）

這些話，似乎都是平淡無奇的，然而正是這些平淡無奇的話是青年們所最需，而也是他們所最忽略的；魯迅又說過：

青年又何須尋那掛着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闢成平地的，遇

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華蓋集五四頁。）大概有人對於這些話又要高喊道：「這也平淡無奇！」不錯！確是平淡無奇，然而連平淡無奇的事竟也不能實現，其原因還在於「不做」。魯迅更分析地說道：

第一需要記性性記。不佳，是有益於己而有害於子孫的。人們因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漸漸地脫離了受過的苦痛，但也因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樣地再犯前人的錯誤。（墳一六七頁。）

其次需要「韌性」。魯迅有一個很有趣的比喻道：

我有時也偶爾去看看學校的運動會……競走的時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個人一到決勝點，其餘的便鬆懈了，有幾個還至於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數的勇氣，中途擠入看客的羣集中；或者佯為跌倒，使紅十字隊用擔架將他抬走。假若偶有雖然落後，却儘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為他太不聰明，『不恥最後』的緣故罷。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

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利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

亡。（華蓋集一五〇頁。）

魯迅鼓勵青年們去活動去除舊革新，說：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於舊狀況那麼心平氣和，於較新的機運就這麼疾首蹙額；於已成之局那麼委曲求全，於初興之事就這麼求全責備！

知識高超而眼光遠大的先生們開導我們：生下來的倘不是聖賢，豪傑，天才，就不要生；寫出來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寫；改革的倘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極樂世界，或者，至少能給我（！）有更多的好處，就萬萬不要動！……那麼，他是保守派麼？據說：並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獨他有公平，正當，穩健，圓滿，平和，毫無流弊的改革法；現下正在研究室裏研究着哩，只是還沒有研究好。

什麼時候研究好呢？答曰：沒有準兒。

孩子初學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來，的確是幼稚，危險，不成樣子，或者簡直是可笑的。但無論怎樣的愚婦人，却總以懇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這第一步去，決不會因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礙闖人的路綫而『逼死』他；也決不至於將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夠飛跑時再下地。因為她知道：假如這麼辦，即使長到一百歲也還是不會走路的。（華蓋集一五二頁。）

他對於現在文藝界的意見，也是鼓勵青年努力大胆去創作，不要怕幼稚。（見墳一七一頁未有天才之前。）

對於所謂正人君子學者之流的欺騙青年，他在一點比喻內說：

……這樣的山羊我只見過一回，確是走在一羣胡羊的前面，頸子上還掛着一個小鈴鐸，作為知識階級的徽章。……人羣中也很有這樣的山羊，能領了羣衆穩妥平靜地走去。直到他們應該走到的所在。袁世凱明白一點這種事，可惜用得不大巧，……然而『經』一事，長一智，『二十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頸子上

掛着小鈴鐸的聰明人是總要交到紅運的，雖然現在表面上還不免有些不拙折。

那時候，人們，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規蹈矩，既不囂張，也不浮動，一心向着「正路」前進了，只要沒有人問——

「往那裏去？」

君子若曰：「羊總是羊，不成了一長串順從地走，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君不見夫豬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終於也還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動，不過是空費力氣而已矣。」

這是說：雖死在應該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這計畫當然是很妥貼，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見夫野豬乎？牠以兩個牙，使老獵人也不免於退避。這牙，只至豬脫出了牧豕奴所造的豬圈，走入山野，不久就會長出來。（華蓋集續編三二至三三頁。）

然而魯迅也不贊成無謂的犧牲，如「請願」之類。北京「三一八」慘案發生了後，

魯迅有好幾篇雜感寫到這件事，在「死地」內，他說：

但我却懇切的希望：『請願』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這許多血，竟換得一個這樣的覺悟和決心，而且永遠紀念着，則似乎還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華蓋集續編九一頁。）

在空談內，魯迅更詳細地說道：

請願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但並非非常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那樣的慘殺，我實在沒有夢想到，雖然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只知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願，而況又是徒手，却沒有料到這麼陰毒與凶殘。……有些東西……我稱之為什麼呢，我想不出——說：羣衆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這些東西彷彿就承認了對徒手羣衆應該開鎗，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

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我對於這回的犧牲者，非常覺得哀傷。

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

（華蓋集續編一〇九至一一一頁。）

在無花的薔薇之二第八節內，魯迅又有這樣幾句話：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華蓋集續編八

五

離開魯迅的雜感，看魯迅的創作小說罷。前面說過，喜歡讀魯迅的創作小說的人們，不應該不看魯迅的雜感；雜感能幫助你更加明白小說的意義，至少，在我自己，確有這種經驗。

吶喊所收十五篇，彷徨所收十一篇，除幾篇例外的，如不周山，兔和貓，幸福的家庭，傷逝等，大都是描寫「老中國的兒女」的思想和生活。我說是「老中國」，並不含有「已經過去」的意思，照理這是應該被剩留在後面而成爲「過去的」了，可是「理」在中國很難講，所以吶喊和彷徨中的「老中國的兒女」，我們在今日依然隨時隨處可以遇見，並且以後一定還會常常遇見。我們讀了這許多小說，接觸了那些思想生活和我們完全不同的人物，而有極親切的同情；我們跟着單四嫂子悲哀，我

們愛那個懶散苟活的孔乙己，我們忘記不了那負着生活的重擔麻木着的閩土，我們的心爲祥林嫂而沉重，我們以緊張的心情追隨着愛姑的冒險，我們鄙夷然而又憐憫又愛那阿Q……總之，這一切人物的思想生活所激起於我們的情緒上的反映，是憎是愛是憐，都混爲一片，分不明白。我們只覺得這是中國的，這正是中國現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們的生活，這正是圍繞在我們的「小世界」外的大中國的人生！而我們之所以深切地感到一種寂寞的悲哀，其原因亦卽在此。這些「老中國的兒女」的靈魂上，負着幾千年的傳統的重擔子，他們的面目是可憎的，他們的生活是可以咒咀的，然而你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存在，並且不能不懷懷地反省自己的靈魂究竟已否完全脫卸了幾千年傳統的重擔。我以爲吶喊和彷徨所以值得並且逼迫我們一遍一遍地翻讀而不厭倦根本原因便在這一點。

人們的見解是難得一律的，並且常有十分相反的見解；所以上述種種，只是「我以爲」而已。但是以下的一段文字却不可不抄來看看：

……共計十五篇的作品之中，我以為前面的九篇與後面的六篇，不論內容與作風，都不是一樣。編者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恰依我的分法把目錄分為兩面了。如果我們用簡單的文字來把這不同的兩部標明，那麼，前九篇是『再現的』，後六篇是『表現的』。

嚴格地說起來，前九篇中之故鄉一篇應該歸入後期作品之內，然而下面的阿Q正傳又是前期的作品，而且是前期中很重要的一篇，所以便宜上不妨與前期諸作並置。

前期的作品有一種共通的顏色，那便是再現的記述。不僅狂人日記，孔乙己，頭髮的故事，阿Q正傳是如此，即別的幾種也不外是一些記述 (description) 這些記述的目的，差不多全部在築成 (buildup) 各樣典型的性格 (typical character)；作者的努力似乎不在他所記述的世界，而在這世界的住民的典型。所以這一個個的典型築成了，而他們所住居的世界反是很模糊的。世人盛稱作者

的成功的原因，是因爲他的典型築成了，然而不知作者的失敗，也便是在此處。作者太急了，太急於再現他的典型了，我以爲作者若能不這樣於急追求「典型的，」他總可以尋到一點「普遍的」(allgemein)出來。

我們看這些典型在他們的世界不住地盲動，猶如我們跑到了一個未曾到過的國家，看見了各樣奇形怪狀的人在無意識的行動，沒有與我們相同的地方可以使我們猜出他們的心理的狀態。而作者偏偏好像非如是不足以再現他的典型的樣子。關於這一點，作者所急於築成的這些典型本身固然應該負責，然而作者所取的再現的方法也是不能不負責任的。

(「吶喊」的評論：戒仿吾；見關於魯迅及其著作七四至七六頁。)

我和這位批評者的眼光有些不同，在我看來，吶喊中間的人物並不是什麼外國人，也不覺得「跑到了一個未曾到過的國家，看見了各樣奇形怪狀的人在無意識地行動。」所以那「裏面最可愛的小東西孔乙己」以及那引起多人驚異的阿Q正傳，

我也不以爲一淺薄的紀實的傳記，「勞而無功的作品，與一般庸俗之徒無異。」

這位批評者又說：

文藝的作用總離不了是一種暗示，能以小的暗示大的，能以部分暗示全部，方可謂發揮了文藝的效果，若以全部來示全部，這便是勞而無功了。只顧描寫的人，他所表現的不出他所描寫的以外，便是勞而無功的人。作者前期中的孔乙己，藥，明天等作，都是勞而無功的作品，與一般庸俗之徒無異。這樣的作品便再湊千百篇攏來，也暗示全部不出。藝術家的努力要在捕住全部——一個時代或一種生活的——而表現出來，像庸俗之徒那樣死寫出來的東西是沒有價值的。（引同上。）

這意思若曰：孔乙己，藥，明天等作品，所以成其爲勞而無功的庸俗作品，即因牠並不能以部分暗示全部。又若曰：孔乙己，單四嫂子，老栓，小栓，僅吶喊的小說中有此類人，其於全中國，則成爲碩果，初無其匹，故只是部分的。不錯，我也承

認，孔乙己，單四嫂子，老栓等，只是吶喊集中間的一個人物，但是他們的形相閃出在我的心前時，我總不能叫他們爲孔乙己，單四嫂子等，我覺得他們雖然頂了孔乙己……等名姓，他們該是一些別的什麼，他們不但在吶喊的紙上出現，他們是「老中國的兒女」，到處有的是！在上海的靜安寺路，霞飛路，或者不會看見這類人，但如果你離開了「洋場」，走到去年上海市民所要求的「永不駐兵」區域以外，你所遇見的，滿是這一類的人。然則他們究竟是部分的呢？抑是暗示全部的呢？我們可以再抄別一個人的意見在這裏：

……魯鎮只是中國鄉間，隨便我們走到那裏去都遇得見的一個鎮，鎮上的生活也是我們從鄉間來的人兒時所習見的生活。……他（魯迅嫌惡中國人，咒罵中國人，然而他自己是一個純粹的中國人，他的作品滿薰着中國的土氣。……

（張定璜，魯迅先生。）

現代煩悶的青年，如果想在吶喊裏找一點刺戟，（他們所需要的刺戟，）得一

點慰安，求一條引他脫離「煩悶的大路，那是十之九要失望的。因為吶喊所能給你的，不過是你平日所唾棄——像一個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唾棄一般的——老中國的兒女們的灰色人生。說不定你還在這裏面看見了自己的影子！在彷徨內亦復如此——雖然有幾篇是例外，或者你一定不肯承認那裏面也有你自己的影子，那最好是讀一讀阿Q正傳。這篇內的冷靜宛妙的諷刺，或者會使人忘記了——忽略了篇中的精要的意義，而認為只有「滑稽」，但如你讀到兩遍以上，你總也要承認那中間有你的影子。你沒有你的「精神勝利的法寶」麼？你沒曾善於忘記受過的痛苦像阿Q麼？你潦倒半世的深夜裏有沒有發過「我的兒子會鬧得多啦」的，阿Q式的自負？算了，不用多問了。總之，阿Q是「乏」的中國人的結晶；阿Q雖然不會吃大菜，不會說洋話，也不知道歐羅巴，阿美利加，不知道……然而會吃大菜，說洋話……的「乏」的「老中國的新兒女」，他們的精神上思想上不免是一個或半個阿Q罷了。不但現在如此，將來——我希望這將來不會太久——也還是如此。所以阿Q正傳的

談諧，即使最初使你笑，但立刻我們失却了笑的勇氣，轉而爲惴惴的自不安了。況且那中間的唯一大事，阿Q去革命，「文童」的「咸與維新」，再多說一點：把總也做了革命黨，不上二十天，搶案就是十幾件，舉人老爺也辦民政，然而不在把總眼裏……這些自然是十六年前的陳事了，然而現在鑽到我們眼裏，還是怎樣的新鮮，似乎歷史又在重演了。

他拿着往事，來說明今事，來預言未來的事。

（尙鉞魯迅先生，見關於魯迅及其著作三一頁。）

魯迅只是一個凡人，安能預言；但是他能夠抓住一時代的全部，所以他的著作在將來便成了預言。

彷徨中的十一篇，幸福的家庭和傷逝是魯迅所不常做的現代青年的生活的描寫。戀愛，是這兩篇的主題。但當書中人出場在小說的時候，他們都已過了戀愛的狂熱期，只剩下幻滅的悲哀了。傷逝的悲劇的結果，是已經明寫了出來的，幸福的

家庭雖未明寫，然而全篇的空氣已經向死路走，主人公的悲劇的結果大概是終於難免的罷。主人公的幻想的終於破滅，幸運的惡化，主要原因都是經濟壓迫，但是我們聽到的，不是被壓迫者的引吭的絕叫，而是疲倦的啞嚮的呻吟，這呻吟直刺入你的骨髓，像冬夜窗縫裏的冷風，不由你不毛骨悚然。雖則這兩篇的主人公似乎有遭遇上的類似，但幸福的家庭的主人公只是麻木地負荷那「戀愛的重擔」；他有他的感慨，比如作者給我們的一段精采的描寫：

「……莫哭了呵，好孩子。爹爹做「貓洗臉」給你看。」他同時伸長頸子，伸出舌頭，遠遠的對着手掌舔了兩舔，就用這手掌向了自己的臉上畫圓圈。

「呵呵呵，花兒。」她就笑起來了。

「是的是的，花兒。」他又連畫上幾個圓圈，這纔歇了手，只見她還是笑迷迷地掛着眼淚對他看。他忽而覺得她那可愛的天真的臉，正像五年前的她

的母親，通紅的嘴唇尤其像，不過縮小了輪廓。那時也是晴朗的冬天，她聽得他說決計反抗一切阻礙，爲她犧牲的時候，也就這樣笑迷迷地掛着眼淚對他說。他惘然的坐着，彷彿有些醉了。

『阿阿，可愛的嘴唇……』他想。

門幕忽然掛起。劈柴運進來了。

他也忽然驚醒，一定睛，只見孩子還是掛着眼淚，而且張開了通紅的嘴唇對他看。『嘴唇……』他向旁邊一瞥，劈柴正在進來，「……恐怕將來也就是五五二十五，九九八十一！……而且兩隻眼睛陰淒淒……』他想着，隨即粗暴的抓起那寫着一行題目和一堆算草的綠格紙來，揉了幾揉，又展開來給她拭去了眼淚和鼻涕。『好孩子，自己玩去罷。』他一面推開她說；一面就將紙團用力的擲在紙簍裏。

（彷徨六五頁。）

這一段是全篇中最明顯的一點，好像是陰霾中突然的陽光的一閃，然而隨即過去，陰暗繼續統治着。從現在的通紅的嘴唇，笑迷迷的眼睛，反映出五年前，可愛的母親來，又從現在兩隻眼睛陰凄凄的母親，預言這孩子的將來：魯迅只用了極簡單的幾筆，便很強烈的刻畫出一個永久的悲哀。我以為在這里，作者奏了一藝術上的凱旋。」

我們再看傷逝，就知道傷逝的主人公不像幸福家庭內的主人公似的，只是麻木地負擔那「戀愛的重担」。傷逝的主人公涓生是一個神經質的狷介冷僻的青年，而他的對手子君也似乎是一個憂悒性的女子。比起涓生來，我覺得子君尤其可愛。她的溫婉，她的女性的忍耐，勇敢，和堅決，使你覺得她更可愛。她的沉默多愁善感的性格，使她沒有女友，當涓生到局辦事去後，她該是如何的寂寞呵，所以她愛動物，油鷄和叭兒狗便成她的白天寂寞時的良伴。然而這種委宛的悲哀的女性的心理，似乎涓生並不能了解。所以當經濟的壓迫終於到來時，這一對人兒的心理狀態

起了變化，走到了分離的結局了。我們引一段在下面：

子君有怨色，在早晨，極冷的早晨，這是從未見過的，但也許是從我看來的怨色。我那時冷冷地氣憤和暗笑了；她所磨練的思想和豁達無畏的言論，到底也還是一個空虛，而對於這空虛却並未自覺。她早已什麼書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這求全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奮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扯着一個人的衣角，那便是雖戰士也難於戰鬥，只得一同滅亡。

我覺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們的分離；她應該決然捨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懺悔了。幸而是早晨，時間正多，我可以說我的真實。我們的新的道路的開闢，便在這一遭。（彷徨二〇〇頁。）

涓生覺得「分離」是二人惟一的辦法，所以他在通俗圖書館取暖時的冥想中，往往瞥見一閃的光明，新的生路橫在前面。她勇猛地覺悟了，毅然走出這

冰冷的家，而且，——毫無怨恨的神色。我便輕如行雲，漂浮空際，上有蔚藍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廣廈高樓，戰場，摩托車，洋場，公館，晴明的鬧市，黑暗的夜。（彷徨二〇三頁。）

覺得要求的事，却終於來到了。

子君並沒通知涓生，回到家庭，並且死了——怎樣死的，不明白。——涓生

要向着新的生活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

地前行，用遺忘和說慌做我的前導……。（彷徨二一三頁。）

涓生怎樣跨進新生活的第一步，我們不知道——作者並沒告訴我們。可是我以為這個神經質的青年大概不會有什麼新的生活的。因為他是——

一個卑怯者，應該被擯於強有力的人們，無論是真實者，虛偽者。

（彷徨二〇八頁。）

幸福的家庭所指給我們看的，是：現實怎樣地嘲弄理想。傷逝的意義，我不大看得

明白；或者是在說明一個脆弱的靈魂（子君）於苦悶和絕望的掙扎之後，死於無愛的人們的面前。

彷徨中還有兩篇值得對看的小說，就是在酒樓上和孤獨者。這兩篇的主人公都是先曾抱着滿腔的「大志」，想有一番作爲的，然而環境——數千年傳統的灰色人生——壓迫他們，使他們成了失敗者。在酒樓上的主人公呂緯甫於失敗之後變成了一個「敷敷衍衍，隨隨便便」的悲觀者，不願挾起舊日的夢，以重增自己的悲哀，甯願在寂寞中寂寞地走到他的終點——墳。他並且也不肯去挾破別人的美滿的夢。所以他在奉了母親之命改葬小兄弟的遺骸時，雖然墳穴內只剩下一堆木絲和小木片，本已可以不必再遷，

但他仍然鋪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小兄弟先前身體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來，裝在新棺材裏，運到我父親埋着的墳地上，在他墳旁埋掉了。……這樣總算完了一件事，足夠去騙騙我的母親，使她安心些。（彷徨四二頁）

孤獨者的主人公魏連艾却另是一個結局。他是寂寞撫養大的，他有一顆赤熱的心，但是外形很孤僻冷靜。他在嘲笑咒罵排擠中活着，甚至幾於求乞地活着，因為他雖然已經灰却了「壯志」，但還有一個人願意他活幾天。後來，連這也沒有了，於是
他改變了；他說：

……然而我還有所爲，我願意爲此求乞，爲此凍餒，爲此寂寞，爲此辛苦。但滅亡是不願意。你看，有一個願意我活幾天的，那力量就這麼大。然而現在是沒有了，連這一個也沒有了。同時，我自己也覺得不配活下去；別人呢？也不配的。同時，我自己又覺得偏要爲不願意我活下去的人們而活下去；好在願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經沒有了，再沒有誰痛心。使這樣的人痛心，我是不願意。然而現在是沒有了，連這一個也沒有了。快活極了；舒服極了；我已經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的崇拜，所主張的一切了。我已經真的失敗，——然而我勝利了。（彷徨一六四頁。）

願意他活幾天的，是什麼人？愛人呢，還是什麼親人，我們可以不管，總之，這不是中心問題。總之，他因此改變了，他以毀滅自己來「復仇」了。他做了杜師長的顧問。他這環境的突然改變，性格的突然改變，剝露了許多人的醜相。他勝利了！然而他也照他預定地毀滅了自己。這裡有一段寫出他「的報復來」：

「你可知道魏大人自從交運之後，人就和先前兩樣了，臉也抬高起來，氣昂昂的。對人也不再先前那麼迂。你知道，他先前不要像一個啞子，見我是叫老太太的麼？後來就叫「老傢伙」。唉唉，真是有趣。人送他仙居朮，他自己是不喫的，就摔在院子裏——就是這地方，——叫着：「老傢伙，你喫去罷。」……」

「可是魏大人的脾氣也太古怪，」她忽然低聲說：「他就不肯積蓄一點，水似的化錢。……他就冤裏冤柱胡裏胡塗地化掉了。譬如買東西，今天買進，明天又賣出，弄破，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彷徨一七二，四頁。）

作者在篇末很明白地告訴我們：

隱約是長嘯，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裏夾雜着憤怒和悲哀。（彷徨一七六頁。）

六

上述幸福的家庭等四篇，以我看來，是彷徨中間風格獨異的四篇。說他們獨異，因為不是「中國的兒女」的灰色人生的寫照。

魯迅的小說對於我的印象，拉雜地寫下來，就是如此。我當然不是文藝批評家，所以「批評」我是不在行的，我只願寫我的印象感想，慚愧的是太會抄書，未免笑於大雅，並且我自以為感想者，當然也是「舐皮論骨」而已。

然而不敢謬托知己，或借為廣告，却是我敢自信的。完了。

一九一八年

「聖武」

我前回已經說過「什麼主義都與中國無干」的話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見，便再寫在下面：

我想，我們中國本不是發生新主義的地方，也沒有容納新主義的處所，即使偶然有些外來思想，也立刻變了顏色，而且許多論者反要以此自豪。我們只要留心譯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樣對於外國事情的批評議論，便能發見我們和別人的思想中間，的確還隔着幾重鐵壁。他們是說家庭問題的，我們却以爲他鼓吹打仗；他們是寫社會缺點的，我們却說他講笑話；他們以爲好的，我們說來却是壞的。若再留心看看別國的國民性格，國民文學，再翻一本文人的評傳，便更能明白別國著作裏寫出

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幾乎全不是中國所有。所以不會了解，不會同情，不會感應；甚至彼我間的非愛憎，也免不了得到一個相反的結果。

新主義宣傳者是放火人麼，也須別人有精神的燃料纔會着火；是彈子人麼，別人的心上也須有絃索會出聲；是發聲器麼，別人也必須是發聲器，纔會共鳴。中國全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會相干。

幾位讀者怕要生氣，說：「中國時常有將性命去殉他主義的人，中華民國以來，也因為主義上死了多少烈士，你何以一筆抹殺？嚇！」這話也是真的。我們從舊的外來思想說罷，六朝的確有許多焚身的和尚，唐朝也有過砍下臂膊布施無賴的和尚；從新的說罷，自然也有過幾個人的。然而與中國歷史，仍不相干。因為歷史結賬，不能像數學一般精密，寫下許多小數，却只能學粗人算賬的四捨五入法門，記一筆整數。

中國歷史的整數裏面，實在沒有什麼思想主義在內。這整數只是兩種物質，

——是刀與火，「來了」便是他的總名。

火從北來便逃向南，刀從前來便退向後，一大堆流水賬簿，只有這一個模型。倘嫌「來了」的名稱不很莊嚴，「刀與火」也觸目，我們可以別想花樣，奉獻一個證法，稱作「聖武」，便好看了。

古時候，秦始皇常很闊氣，劉邦和項羽都看了；邦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羽說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麼呢？便是取邦所說的「如此」。「如此」的程度，雖有不同，可是誰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與「丈夫」的心中，便都是說「聖武」的產生所，受納所。

何謂「如此」？說起來話長；簡單地說，便只是純粹獸性方面的慾望的滿足——威福，女子，玉帛，——罷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現在的人，還被這理想支配着。

大丈夫「如此」之後，慾望沒有衰，身體却疲敝了；而且覺得暗中有一個黑影

——死——到了身邊了。於是無法，只好求神仙。這在中國，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現在的人，也還被這理想支配着。

求了一通神仙，終於沒有見，忽然有些疑惑了。於是要造墳，來保存死屍，想用自己的屍體，永遠佔據着一塊地面。這在中國，也要算一種沒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現在的人，也還被這理想支配着。

現在的外來思想，無論如何，總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氣息，互助共存的氣息，在我們這單有「我」，單想「取彼」，單要由我喝盡了一切空間時間的酒的思想界上，實沒有插足的餘地。

因此，只須防那「來了」便夠了。看看別國，抗拒這「來了」的便是有主義的人民。他們因為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

曙光在頭上，不抬起頭，便永遠只能看見物質的閃光。

一九二一年

事實勝於雄辯

西哲說：事實勝於雄辯。我當初很以為然，現在纔知道在我們中國，是不適用的。

去年我在青雲閣的一個舖子裏買過一雙鞋，今年破了，又到原舖子去照樣的買一雙。

一個胖夥計，拿出一雙鞋來，那鞋頭又尖又淺了。
我將一隻舊式的和一隻新式的都排在櫃上，說道：

「這不一樣……」

「一樣，沒有錯。」

「這……」

「一樣，你瞧！」

我於是買了尖頭鞋走了。

我順便有一句話奉告我們中國的某愛國大學，您說，攻擊本國的缺點，是拾某國人的唾餘的，試在中國上，加上我們二字，看看通不通。

現在我敬讓加上了，看過了，然而通的。

您瞧！

（十一月四日。）

（選自熱風——北新版。）

一九二二年

反對「含淚」的批評家

現在對於文藝的批評日見其多了，是好現象；然而批評日見其怪了，是壞現象，愈多反而愈壞。

我看了很覺得不以為然的是胡夢華君對於汪靜之君蕙的風的批評，尤其覺得非常不以為然的是胡君答覆章鴻熙君的信。

一、胡君因為蕙的風裏有一句「一步一回頭瞟我意中人」，便科以和金瓶梅一樣的罪；這是鍛鍊周納的。金瓶梅卷首誠然有「意中人」三個字，但不能因為有三個字相同，便說這書和那書是一模樣。例如胡君要青年懺悔，而金瓶梅也明明說是「一部改過的書」，若因為這一點意思偶合，而說胡君的主張也等於金瓶梅，我實

在沒有這樣的粗心和大膽。我以爲中國之所謂道德的神經，自古以來，未免過敏而又過敏了，看見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見一個「瞞」字，便即穿鑿到別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淨：倘竟如此不淨，則即使「授受不親」，後來也就會「瞞」，以至於瞞以上的等事，那時便一部禮記，也即等於金瓶梅了，又何有於蕙的風？

二、胡君因爲詩裏有「一個和尚悔出家」的話，便說是誣讒了普天和尚，而且大呼釋迦牟尼佛；這是近於宗教家而且援引多數來恫嚇，失了批評的態度的。其實一個和尚悔出家，並不是怪事，若普天下的和尚沒有一個悔出家的，那倒是大怪事。中國豈不是常有酒肉和尚，還俗和尚麼？非「悔出家」而何？倘說那些是壞和尚，則那詩裏的便是壞和尚之一，又何至誣讒了普天下的和尚呢？這正如胡君說一本詩集是不道德，並不算誣讒了普天下的詩人。至於釋迦牟尼，可更與文藝界「風馬牛」了，據他老先生的教訓，則做詩便犯了「綺語戒」——，無論道德或不道德，

着不免受些孽報，可怕得很的！

三、胡君說汪君的詩比不上歌德和雪利，我以為是對的。但後來又說：「論到人格，歌德一生而十九娶，爲世詬病，正無可諱。然而歌德所以垂世不朽者，乃五十歲以後懺悔的歌德，我們也知道麼？」這可奇特了。雪利我不知道，若歌德卽 Goethe，則我敢替他呼幾句冤，就是他並沒有「一生而十九娶」，並沒有「爲世詬病，並沒有「五十歲以後懺悔」。而且對於胡君所說的「自『耳食』之風盛，歌德，雪利之真人格遂不爲國人所知，無識者流，更妄相援引，可悲亦復可笑！」這一段話，也要請收回一些去。

我不知道汪君可曾過了五十歲，倘沒有，則卽使用了胡君的論調來裁判，似乎也還不妨做「一步一回頭矚我意中人」的詩，因爲以歌德爲例，也還有到「懺悔」的時候。

臨末，則我對於胡君的「悲哀的青年，我對於他們只有不可思議的眼淚！」

我還想多寫幾句，我對於悲哀青年底不可思議的淚已盈眶了。」這一類話，實在不明白「其意何居」。批評文藝，萬不能以眼淚的多少來定是非。文藝界可以收到創作家的眼淚，而沾了批評家的眼淚却是污點。胡君的眼淚的確灑得非其地，非其時，未免萬分可惜了。

起稿已完，纔看見青光上的一段文章，說近人用先生和君，含有尊敬和小觀的差別意見。我在這文章裏正用君，但初意却不過貪圖少寫一個字，並非有什麼春秋筆法。現在聲明於此，却反而多寫了許多字了。

(十一月十七日。)

(選自熱風——北新版。)

卽小見大

北京大學的反對講義收費風潮，芒硝火燄似的起來，又芒硝火焰似的消滅了，其間就是開除了一個學生馮省三。

這事很奇怪，一回風潮的起滅，竟只關於一個人。倘使誠然如此，則一個人的

魄力何其太大，而許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無呢。

現在講義費已經取消，學生是得勝了，然而並沒有聽得有誰爲那做了這次的犧牲者祝福。

卽小見大，我於是竟悟出一件長久不解的事來，就是：三貝子花園裏面，有謀刺良弼和袁世凱而死的四烈士墳，其中有三塊墓碑，何以直到民國十一年還沒有人去刻一個字。

凡有犧牲在祭壇前瀝血之後，所留給大家的，實在只有「散胙」這一件事了。

(十一月十八日)

(選自熱風——北新版。)

一九二四年

望勿「糾正」

汪原放君已經成了古人了，他的標點和校正小說，雖然不免小謬誤，但大體是有助於作者和讀者的。誰料流弊却無窮，一班効顰的便隨手拉一部書，你也標點，我也標點，你也作序，我也作序，他也校改，我也校改，又不肯好好的做，結果只是糟蹋了書。

花月痕本不必當作寶貝書，但有人要標點付印，自然是各隨各便。這書最初是本刻的，後有排印本；最後是石印，錯字很多，現在通行的多是這一種。至於新標點本，則陶樂勤君序云，「本書所取的原本，雖屬佳品，可是錯誤尙多。余雖都加以糾正，然失檢之處，勢必難免。……」我只有錯字很多的石印本，偶然對比了第

二十五回中的三四頁，便覺得還是石印本好，因為陶君於石印本的錯字多未糾正，而石印本的不錯字兒却多糾歪了。

『敘黛直是個子虛烏有，算不得什麼。……』

這「直是個」就是「簡直是一個」之意，而糾正本卻改作「真是個」，便和原意很不相同了。

「秋痕頭上包着縐帕……突見痴珠，便含笑低聲說：『我料得你挨不上十天，其實何苦呢？』」

「……痴珠笑道：『往後再商量罷。』……』

他們倆雖然都淪落，但其時卻沒有什麼大悲哀，所以還都笑。而糾正本却將兩個「笑」字都改成「哭」字了。教他們一見就哭，看眼淚似乎太不值錢，況且「含哭」也不成話。

我因此想到一種要求，就是印書本是美事，但若自己於意義不甚了然時，不可

便以爲是錯的，而奮然「加以糾正，不如「過而存之」，或者倒是並不錯。

我因此又起了一個疑問，就是有些人攻擊譯本小說看不懂——，但他們看中國人自作的舊小說，當真看得懂麼？

（一月二十八日）

這一篇短文發表之後，曾記得一回遇見胡適之先生，談到汪先生的事，知道他很康健。胡先生還以爲我那成了古人——云云，是說他做過許多工作，已足以表見於世的意思。這實在使我誠惶誠恐——。因爲我本意實不如此，直白地說，就是說已經死掉了——。可是直到那時候，我纔知道先前所聽到的竟是一種毫無根據的謠言。現在我在此敬向汪先生謝我的粗疎之罪，並且將舊文的第一句訂正，改爲：汪原放君未經成了古人了。——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身熱頭痛之際，書。

（選自熱風——北新版。）

一九二五年

並非閒話

凡事無論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覺。即如這一回女子師範大學的風潮，我因為在那里擔任一點鐘功課，也就感到震動，而且就發了幾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日的京報副刊上。自然，自己也明知道違了「和光同塵」的古訓了，但我就是這樣，並不想以騎牆或陰柔來買人尊敬。三四天之後，忽然接到一本現代評論十五期，很覺得有些稀奇。這一期是新印的，第一頁上目錄已經整齊（初版字有參差處），就證明說至少是再版。我想：爲什麼這一期特別賣的多，送的多呢，莫非內容改變了麼？翻開初版來，校勘下去，都一樣；不過末葉的金城銀行的廣告已經杳然，所以一篇女師大的學潮就赤條條地露出。我不是也發過議論的麼？自然

要看一看，原來是贊成楊蔭榆校長的，和我的論調正相反。做的人是「一個女讀者」。

中國原是玩意兒最多的地方，近來又剛鬧過什麼「琴心是否女士」問題，我於是心血來潮，忽而想：又搗什麼鬼，裝什麼佯了？但我即刻不再想下去，因為接着就起了別一個念頭，想到近來有些人，凡是自己善於在暗中播弄鼓動的，一看見別人明白直接的言動，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動，是某黨，是某系；正如偷漢的女人的丈夫，總願意說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裏纔覺舒暢。這種思想是卑劣的：我太多心了，人們也何至於一定而裙子來做軍旗。我就將我的念頭打斷了。

此後，風潮還是拖延着，而且展開來，於是有七個教員的宣言發表，也登在正月二十七日的京報上，其中一個是我。

這回的反響快透了，三十日發行（其實是二十九日已經發賣）的現代評論上，西滢先生就在閒話的第一段中特地評論。但是，據說宣言是「閒話正要付印的時候

「纔在報上見到的，所以前半只論學潮，和宣言無涉。後來又做了三大段，大約是見了宣言之後，這纔文思泉湧的罷，可是閒話付印的時間，大概總該頗有些耽誤了。但後做而移在前面，也未可知。那麼，足見這是一段要緊的「閒話」。

閒話中說：「以前我們常常聽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在北京教育界佔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所以他只在宣言中摘出「最精彩的幾句」，加上圈子，評爲「未免偏袒一方」；而且因爲「流言更加傳佈得厲害」，遂覺「可惜」，但他說「還不信我們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這些話我覺得確有些超妙的識見。例如「流言」本是畜類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實在應該不信牠。又如一查籍貫，則即使裝作公平，也容易啓人疑竇，總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則同籍的人固然憚於在一張紙上宣言，而別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給同籍的人幫忙了。這些「流言」和「聽說」，當然都只配當作狗屁！

但是，西滢先生因爲「未免偏袒一方」而遂歎爲「可惜」，仍是引用「流言」

，我去以爲是「可惜」的事。清朝的縣官坐堂，往往兩造各賣小板五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沒有了，可是終於不免爲胡塗蟲。假使一個人還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說的好；否則，雖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會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過是自己的陰險和卑劣。宣言中所謂「若離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者，似乎也就是爲此輩的手段寫照。而且所謂「挑剔風潮」的「流言」，說不定就是這些伏在暗中，輕易不大露面的東西所製造的，但我自然也「沒有調查詳細的事實，不大知道」。可惜的是西澧先生雖說「還是不信」，却已爲我輩「可惜」，足見流言之易於惑人，無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却直到看見這閒話之後，纔知道西澧先生們原來「常常」聽到這樣的流言，並且和我偶爾聽到的都不對。可見流言也有種種，某種流言，大抵是奔湊到某種耳朵，寫出在某種筆下的。

但在閒話的前半，即西澧先生還未在報上看見七個教員的宣言之前，已經比學校爲「臭手廁」，主張「人人都有掃的義務」了。爲什麼呢？一者報上兩個相反的

啓事已經發現；二者學生把守校門；三者有「校長不能在學校開會，不得不借鄰近的飯店召集職員開會的奇聞」。但這所述的「臭毛廁」的情形還得修改些，因為層次有點顛倒。據宣言說，則「飯店開會」，乃在「把守校門」之前。大約西澧先生覺得不「最精彩」，所以沒有摘錄，或者已經寫好，所以不及摘錄的罷。現在我來補摘幾句，並且也加些圈子，聊以效顰——

「……迨五月七日校內講演時，學生勸校長楊蔭榆先生退席後，楊先生乃於飯館召集教員若十燕飲，繼即以評議會名義，將學生自治會職員六人揭示開除，由是全校譁然，有堅拒楊先生校長之事變。……」

講話裏的和這事實的顛倒，從神經過敏的看起來，或者也可以認爲「偏袒」的表現；但我在這裏並非舉證，不過聊作插話而已。其實，「偏袒」兩字，因我適值選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厭觀，倘用別的字，便會大大的兩樣。況且，即使是自以爲公平的批評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長同籍貫，或是好朋友，或是

換帖兄弟，或是叨過酒飯，每不免於不知不覺間有所「偏袒」。這也算人情之常，不足深怪；但當侃侃而談之際，那自然也許流露出來。然而也沒有什麼要緊，局外人那里會知道這許多底細呢，無傷大體的。

但是學校的變成「臭毛廁」，却究竟在「飯店召集教員」之後，酒醉飯飽，毛廁當然合用了。西濼先生希望「教育當局」打掃，我以為在打掃之前，還須先封飯店，否則醉飽之後，總要拉矢，毛廁即永遠需用，怎麼打掃得乾淨？而且，還未打掃之前，不是已經有了「流言」了麼？流言之力，是能使糞便增光，蟲蛆成聖的，打掃夫又怎麼動手？姑無論現在有無打掃夫。

至於「萬不可再敷衍下去」，那可實在是斬釘截鐵的辦法。正應該這樣辦。但是，世上雖然有斬釘截鐵的辦法，却很少見有敢負責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着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有誰明說出自己所觀察的是非來的，他使用了「流言」來作不負責任的武器

：這種蛆蟲充滿的「臭毛廁」，是難於打掃乾淨的。丟盡「教育界的面目」的醜態，現在和將來還多着哩！

(五月三十日。)

(二)

向來聽說中國人具有大國民的大度，現在看看，也未必然，但是我們要說得好，那麼，就說好清淨，有志氣罷。所以總願意自己是第一，是唯一，不愛見別的東西共存。行了幾年白話，弄古的人們討厭了；做了一點新詩，吟古詩的人們憎惡了；做了幾首小詩，做長詩的人們生氣了；出了幾種定期刊物，連別的出定期刊物的人們也來詛咒了：太壞，太壞，只好做將來被淘汰的資料。

中國有些地方還在「溺女」，就因為豫料她們將來總是沒出息的。可惜下手的人們總沒有好眼力，否則並以施之男孩，可以減少許多單會消耗食糧的廢料。

但是，歌頌「淘汰」別的人也應該先行自省，看可有怎樣不滅的東西在裏面，否則，即使不肯自殺，似乎至少也得自己打幾個嘴巴。然而人是總是自以為是的，這也許正是逃避被淘汰的一條路。相傳曾經有一個人，一向就以「萬物不得其所」為宗旨的，平生只有一個大願，就是願中國人都死完，但要留下他自己，還有一個女人和一個賣食物的。現在不知道他怎樣，久沒有聽到消息了，那默默無聞的原因，或者就因為中國人還沒有死完的緣故罷。

x

x

x

x

x

據說，張歆海先生看見兩個美國兵打了中國的車夫和巡警，於是三四十個人，後來就有百餘人，都跟在他們後面喊「打！打！打！」，美國兵却終於安然的走到東交民巷口了，就回頭「笑着嚷道：『來呀！來呀！』說也奇怪，這喊打的百餘人不到兩分鐘便居然沒有影踪了！」

西滌先生於是在閒話中斥之曰：「打！打！宣戰！宣戰！這樣的中國人，呸

！

這樣的中國人真應該受「呸」！他們爲什麼不打的呢，雖然打了也許又有人來說是「拳匪」。但人們那里願意得許多，終於不打，「怯」是無疑的。他們所有的不是拳頭麼？

但不知道他們可曾等候美國兵走進了東交民巷之後，遠遠地吐了唾沫？現代評論上沒有記載，或者雖然「怯」，還不至於「卑劣」到那樣罷。

然而美國兵終於走進東交民巷口了，毫無損傷，還笑嚷着「來呀來呀」哩！你們還不怕麼？他們還敢說「打！打！宣戰！宣戰！」麼？這百餘人，就證明着中國人該被打而不作聲！

「這樣的中國人，呸！呸！」

x

x

x

x

x

更可悲觀的是現在「造謠者的卑鄙醜態更遠過於章炳麟」，真如閒話所說，而

且只能「匿名的在報上放一兩枝冷箭」。而且如果「你代被羣衆專制所壓迫者說了幾句公平話，那麼你不是與那人有『密切的關係』，便是喫了他或她的酒飯。在這樣的社會裏，一個報不顧利害的專論是非，自然免不了誹謗叢生，謠詠騰起」。這確是近來的實情。卽如女師大風潮，西滢先生就聽到關於我們的「流言」，而我竟不知道是怎樣的「流言」，是那幾個「卑鄙齷齪更遠於章炳麟」者所造。還有女生的罪狀，已見於章士釗的呈文，而那些作爲根據的「流言」，也不知道是那幾個「卑鄙齷齪」甚至於遠不如畜類者所造。但是學生却都被打出了，其時還有人在酒席上得意。——但這自然也是「謠詠」。

可是我倒也並不很以「流言」爲奇，如果要造，就聽憑他們去造去。好在中國現在還不到「羣衆專制」的時候，卽使有幾十個人，只要「無權勢」者叫一大羣警察，僱些女流氓，一打，就打散了，正無須乎我來爲「被壓迫者」說什麼「公平話」，卽使說，人們也未必盡相信，因爲「在這樣的社會裏」有些「公平話」總還不

免是「他或她的酒飯」填出來的。不過事過境遷，「酒飯」已經消化，吸收，只剩下似乎毫無緣故的「公平話」罷了。倘使連酒飯也失了效力，我想，中國也還要光明些。

但是，這也不足爲奇的。不是上帝，那里能夠超然世外，真下公平的批評。人自以爲「公平」的時候，就已經有些醉意了。世間都以「黨異伐同」爲非，可是誰也不做「黨異伐同」的事。現在，除了瘋子倘使有誰要來接吻，人大約總不至於倒給她一個嘴巴的罷。

（九月十九日。）

（三）

西澗先生這回是義形於色，在現代評論四十八期的閒話裏很爲被書賈檀自選印作品，因而受了物質上損害的作者抱不平。而且賤名也忝列於作者之列；惶恐透了

。喫飯之後，寫一點自己的所感罷，至於捏筆的「動機」，那可大概是「不純潔」的。記得幼小時候住在故鄉，每看見紳士將一點騙人的自以爲所謂恩惠，頒給下等人，而下等人不大感謝時，則斥之曰：「不識擡舉！」我的祖父是讀書的，總該可以算得士流了，但不幸從我起，不知怎的就有了下等脾氣，不但恩惠，連弔慰都不很願意受，老實說罷：我總疑心是假的。這種疑心，大約就是「不識抬舉」的根苗，或者還要使寫出來的東西「不純潔」。

我何嘗有什麼白刃在前，烈火在後，還是釘住書桌，非寫不可的「創作衝動」；雖然明知道這種衝動是純潔，高尚，可貴的，然而其如沒有何。前幾天早晨，被一個朋友怒視了兩眼，倒覺得臉有點熱，心有點酸，頗近乎有什麼衝動了，但後來被深秋的寒風一吹拂，臉上的溫度便復原，——沒有創作。至於已經印過的那些，那是被擠出來的。這「擠」字是擠羊乳之「擠」；這「擠牛乳」是專來說明「擠」字的，並非故意將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裝在玻璃瓶裏，送進什麼「藝術之宮」

。倘用現在實然流行起來了的論調，將青年的急於發表未熟的作品稱爲「流產」，則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簡直不是胎，是狸貓充太子。所以一寫完，便完事，管她媽的，書賈怎麼偷，文士怎麼說，都不再來提心弔胆。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願意看，稱讚好，我終於是歡喜的。後來也集印了，爲的是還遊賣幾文錢，老實說。

那麼，我在寫的時候沒有虔敬的心麼？答曰：有罷。即使沒有這種冠冕堂皇的心，也決不故意要些油腔滑調。被擠着，還能嬉皮笑臉，遊戲三昧麼？倘能，那簡直是神仙了。我並沒有在呂純陽祖師門下投誠過。

但寫出以後，却也不很愛惜羽毛，有所謂「敝帚自珍」的意思，因爲，已經說過，其時已經是一「便完事，管她媽的」了。誰有心腸來管這些無聊的後事呢？所以雖然有什麼選家在那里放出他那偉大的眼光，選印我的作品，我也照例給他一個不管。其實，要管也無從管起的。我曾經替人代理過一回收版稅的譯本，打聽得賣完

之後，向書店去要錢，回信却道，舊經理人已經辭職回家了，你向他要去罷；我們可是不知道。這書店在上海，我怎能趁了火車去向他坐索，或者打官司？但我對於這等選本，私心却也有「竊以爲不然」的幾點，一是原本上的錯字，雖然一見就明知道是錯的，他也照樣錯下去；二是他們每要發幾句偉論，例如什麼主義咧，什麼意思咧之類，大抵是我自己到覺得並不這樣的事。自然，批評是「精神底冒險」，批評家的精神總比作者會先一步的，但在他們的所謂死屍上，我却分明聽到心搏，這真是到死也說不到一塊兒。此外，倒也沒有什麼大怨氣了。

這雖然似乎是東方文明式的大度，但其實倒怕是因爲我不靠賣文營生。在中國，駢文壽序的定價往往還是每篇一百兩，然而白話不值錢；翻譯呢，聽說是自己能創作而嫉妬別人去創作的壞心腸人所提倡的，將來文壇一進步，當然更要一文不值。我所寫出來的東西，當初雖然很她過許多大釘子，現在的時價是每千字一至二元，但爲不很有這樣好主顧，常常只好盡些不知何自而來的義務。有些人以爲我

不但用了這些稿費或版稅造屋，買米，而且還靠牠吸烟捲，喫糖菓。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外騙來的；我實在不很擅長於先裝鬼臉去嚇書坊老闆，然後和他接洽。我想，中國最不值錢的是工人的體力了，其次是咱們的所謂文章，只有伶俐最值錢。倘真要直直落落，藉文字謀生，則據我的經驗，賣來賣去，來回至少一個月，多則一年餘，待款子寄到時，作者不但已經餓死，倘在夏天，連肌肉也都爛盡了，那里還有吃飯的肚子。

所以我總用別的道兒謀生；至於所謂文章也者，不擠，便不做。擠了纔有，則出什麼高超的「烟士披離純」呀，「創作感興」呀之類不大有關係，也就可想而知。倘說我假如不必用別的道兒謀生，則心志一專，就會有「烟士披離純」等類，而產生較偉大的作品，至少，也可以免於獻出剝皮的狸貓罷，那可是也未必。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一年到頭，一早到夜教村童，不但毫不「時時想政治活動」，簡直並不很「幹着種種無聊的事」，但是他們似乎並沒有教育學概論或「高頭講章」的待

定稿，藏之名山。而馬克思的資本論，陀思妥夫斯奇的罪與罰等，都不是發末加咖啡，吸埃及烟捲之後所寫的，除非章士釗總長治下的「有些天才」的編譯館人員，以及討得官僚津貼銀行廣告費的「大報」作者，於謀成事遂，睡足飯飽之餘，三月鍊字，半年鍛句，將來會做出超倫軼羣的奧古漂亮作品，總之，在我，是肚子一飽，應酬一少，便要心平氣和，關起門來，什麼也不寫了；即使還寫，也許不過是溫噉之談，兩可之論，也即所謂執中之說，公允之言，其實等於不寫而已。

所以上海的費化作蚊子，吸我的一點血，自然是給我物質上的損害無疑，而我却還沒有什麼大怨氣，因為我知道他們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們是蚊子。我一生中，給我大的損害的並非書賈，並非兵匪，更不是旗幟鮮明的小人：乃是所謂「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麼「鼓勵學潮」呀，「謀做校長」呀，「打落門牙」呀這些話。有一回，竟連現在為我的著作權受損失抱不平的西澐先生也要相信了，也就在現代評論（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閒話上發表出來；牠的效力就可想。譬如

一個女學生，與其被若干卑劣陰險的文人學士們暗地裏散布些關於品行的謠言，倒不如被土匪搶去一條紅圍巾——物質。但這種「流言」，造的是一個人還是多數人？姓甚，名誰？我總是查不出；後來，因為沒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僅為便於述說起見，就總稱之曰畜生。

雖然分了類，但不幸這些畜生就雜在人們裏，而一樣是人頭，實際上仍然無從辨別。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聽人們的說話；又因為無話可說，自己也就不大願意做文章。有時候，甚至於連真的義形於色的公話也會覺得古怪，珍奇，於是乎而下等脾氣的「不識抬舉」遂告成功，或者會終於不可救藥。

平心想起來，所謂「選家」這一流人物，雖然因為容易聯想到明季的制藝的選家的緣故，似乎使人厭聞，但現在倒是應該有幾個。這兩三年來，無名作家何嘗沒有勝於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是誰也不去理會他，一任他自生自滅。去年，我曾向——先生提議過，以為該有人搜羅了各處各種定期刊物，仔細評量，選印幾

本小說集，來介紹於世間（至於已有專集者，則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門之外」，但這話也不過終於是空話，當時既無定局，後來也大家走散了。我又不能做這事業，因為我是偏心的。評是非時我總覺得我的熟人對，讀作品是異己者的手腕大概不高明。在我的心裏似乎是沒有所謂「公平」，在別人裏我也沒有看見過，然而還疑心什麼地方也許有，因此就不敢做那兩樣東西了：法官，批評家。

現在還沒有專門的選家時，這事批評家也做得，因為批評家的職務不但是剪除惡草，還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則牠的原種不過是黃色的細碎的野菊，俗名「滿天星」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壇上真沒有較好的作品之故罷，也許是一做批評家，眼界便極高卓，所以我只見到對於青年作家的迎頭痛擊，冷笑，抹殺，却很少見誘掖獎勵的意思的批評。有一種所謂「文士」而又似批評家的，則專是一個人的御前侍衛，託爾斯泰呀，託爾斯泰呀，指東畫西的，就只為一人做屏風。其甚者竟至於一面暗護此人，一面又中傷他人，却又不明明白白地

舉出姓名和實證來，但用了含沙射影的口氣，使那人不知道說着自己，却又另用口頭宣傳以補筆墨所不及，使別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這不但對於文字，就是女人們的名譽，我今年也看見有用了這畜生道的方法來毀壞的。古人常說「鬼蜮技倆」，其實世間何嘗真有鬼蜮，那所指點的，不過是這類東西罷了。這類東西當然不在話下就是只做侍衛的，也不配評選一言半語，因為這種工作，做的人自以為不偏而其實是偏的也可以，自以為公平而其實不公平也可以，但總不可「別有用心」於其間的。

書賈也像別的商人一樣，惟利是圖；他的出版或發議論的「動機」，誰也知道他「不純潔」，決不至於和大學教授的來等量齊觀的。但他們除惟利是圖之外，別的倒未必有什麼用意：這就是使我反而放心的地方。自然，倘是向來沒有受過更奇特而陰毒的暗箭的福人，那當然即此一點也要感到痛苦。

這也算一篇作品罷，但還是擠出來的，並非圍爐煮茗時中的閒話，臨了，便回

上去填作題目，紀實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

(選自華蓋集——北新版。)

一九二六年

一點比喻

在我的故鄉不大通行吃牛肉，闔城裏，每天大約不過殺幾匹山羊。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單是羊肉鋪就觸目皆是。雪白的羣羊也常常滿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們那里稱縣羊的。山羊很少見；聽說這在北京却頗名貴了，因為比胡羊聰明，能夠率領羣羊，悉依牠的進止，所以畜牧家雖然偶而養幾匹，却只用作胡羊們的領導，並不殺掉牠。

這樣的山羊我只見過一回，確是走在一羣胡羊的前面，頸子上還掛着一個小鈴鐸，作爲智識階級的徽章。通常，領的趕的却多是牧人，胡羊們便成了一長串，挨挨擠擠，浩浩蕩蕩，窺着柔順有餘的眼色，跟定他怱怱地競奔牠們的前程。我看見

這種認真的忙迫的情形時，心裏總想開口向牠們發一句愚不可及的疑問——

「往那裏去！」

人羣中也很有這樣的山羊，能領了羣衆穩妥平靜地走去，直到他們應該走到的所在。袁世凱明白一點這種事，可惜用得不大巧，大概因為他是不很讀書的，所以就難于熟悉運用那些的奧妙。後來的武人可更蠢了，只會自己亂打亂割，亂得哀號之聲，洋洋盈耳，結果是除了殘虐百姓之外，還加上輕視學問，荒廢教育的惡名。然而「經一事，長一智」，二十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賴子上掛着小鈴鐸的聰明人是總要交到紅連的，雖然現在表面上還不免有些小挫折。

那時候，人們，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規蹈矩，既不囂張，也不浮動，一心向着「正路」前進了，只要沒有人問——

「往那裏去?！」

x

x

x

x

x

君子若曰：「羊總是羊，不成了一長串順從地走，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君不見夫豬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終于也還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動，不過是空費力氣而已矣。」

這是說：雖死也應該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這計劃當然是很妥貼，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見夫野豬乎？牠以兩個牙，使老獵人也不免於退避。這牙，只要豬脫出了牧豕奴所造的豬圈，走入山野，不久就會長出來。

x x x x x

Schopenhauer 先生曾將紳士們比作豪豬，我想，這實在有些失體統。但在他，自然是並沒有什麼別的惡意的，不過拉扯來作一個比喻。Pareira und Paralip-om na 裏有着這樣意思的話：有一羣豪豬，在冬天想用了大家的體溫來禦寒冷，緊靠起來了，但牠們彼此即刻又覺得刺的疼痛，于是乎又離開。然而溫暖的必要，再

使牠們靠近時，却又喫了照樣的苦。但牠們在這兩種困難中，終於發見了彼此之間的適宜的間隔，以這距離，牠們能夠過得最平安。人們因為社交的要求，聚在一處，又因為各有可厭的許多性質和難堪的缺陷，再使他們分離。他們最後所發見的距離，——使他們得以聚在一處的中庸的距離，就是「禮讓」和「上流的風習」。有不守這距離的，在英國就這樣叫：“Keep your distance”

但即使這樣叫，恐怕也只能在豪豬和豪豬之間纔有效力罷，因為牠們彼此的守着距離，原因是在于痛而不在于叫的。假使豪豬們中夾着一個別的，並沒有刺，則無論怎麼叫，牠們總還是擠過來。孔子道：禮不下庶人。照現在的情形看，該是並非庶人不得接近豪豬，却是豪豬可以任意刺着庶人而取得溫暖。受傷是當然要受傷的，但這也只能怪你自己獨獨沒有刺，不足以讓他守定適當的距離。孔子又說：刑不上大夫。這就又難怪人們的要做紳士。

這些豪豬們，自然也可以用牙角或棍棒來抵禦的，但至少必須拚出背一條豪豬

社會所製定的罪名：「下流」或「無禮」。

（一月二十五日。）

選自華蓋集——北新版。）

馬上日記

豫序

在日記還未寫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謂之豫序。

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着這樣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為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來。我想，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記却不是那樣。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面目，更無所謂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覆D信。一行滿了，然而還有事，因為紙張也頗可惜，便將後來的事寫入前一天的空白中。

總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為B來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實不甚有關係，即便不寫也無妨；而實際上，不寫的時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記上誰有來信，以便答覆，或者何時答覆過，尤其是學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是記不清楚，必須有一筆賬，以便檢查，庶幾乎兩不含糊，我也知道自己多少債放在外面，萬一將來收清之後，要成爲怎樣的一個小富翁。此外呢，什麼野心也沒有了。

吾鄉的李慈銘先生，是就以日記爲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學問，下迄相罵，都記錄在那裏面。果然，現在已有人將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這樣的年頭，不必說學生，就是先生也無從買起。那日記上就記着，當他每裝成一函的時候，早就有人借來借去的傳鈔了，正不必老遠的等待「身後」。這雖然不像日記的正脈，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貶，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試試。什麼做了一點白話，便說是要在一百年後發表的書裏面的一篇，真是其蠢臭爲不可

及也。

我這回的日記，却不是那樣的「有厚望焉」的，也不是原先的很簡單的，現在還沒有，想要寫起來。四五天以前看見半農，說是要編世界日報的副刊去，你得寄一點稿。那自然是可以的嘍。然而稿子呢？這可着實爲難。看副刊的大抵是學生，都是過來人，做過什麼「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或「人心不古議」的，一定知道做文章是怎樣的味道。有人說我是「文學家」，其實並不是的，不要相信他們的話，那證據，就是我也最怕做文章。

然而既然答應了，總得想點法。想來想去，覺得感想倒偶爾也有一點，平時接着一懶，便擱下，忘掉了。如果馬上寫出，恐怕倒也是雜感一類的東西。於是乎我就決計：一想到，就馬上寫下來，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畫到簿。因爲這是開首就準備給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於己的事，現在總藏起來。願讀者先明白這一點。

不知道。
如果寫不出，或者不能寫了，馬上就收場。所以這日記要有多麼長，現在一點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記於東壁下。

六月二十五日

晴。

生病。——今天還寫這個，彷彿有點多事似的。因為這是十天以前的事，現在倒已經可以算得好起來了。不過餘波還沒有完，所以也只好將這作爲開宗明義章第一。謹案才子立言，總須大嚷三大苦難：一曰窮，二曰病，三曰社會迫害我。那結果，便是失掉了愛人；若用專門名詞，則謂之失戀。我的開宗明義雖然近似第二大苦難，實際上却不然，倒是因爲端午節前收了幾文稿費，喫東西喫壞了，從此就不消化，胃痛。我的胃的八字不見佳，向來就擔不起福澤的。也很想看醫生。中醫，雖然有人說是玄妙無窮，內科尤爲獨步，我可總是不相信。西醫呢，有名的看資貴

，事情忙，診視也潦草。無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總還有些躊躇。事情既然到了這樣，當然只好聽憑敵胃隱隱地痛着了。

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啓超的一個腰子以後，責難之聲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黃耆歟？什麼有病，何不喫鹿茸歟？但西醫的病院裏確也常有死屍擡出。我曾經忠告過G先生：你要開醫院，萬不可收留些看來無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沒有人知道，死掉了擡出，就哄動一時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一「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設法推行新醫學，但G先生却似乎以為我良心壞。這也未始不可以那麼想，——由他去罷。

但據我看來，實行我所說的方法的醫院可很有，只是他們的本意却並不在要使新醫學通行。新的本國的西醫又大抵模模糊糊，一出手便先學了中醫一樣的江湖訣，和水的龍膽丁幾兩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於診斷學呢，我似的

門外漢可不得而知。總之，西方的醫學在中國還未萌芽，便已近於腐敗。我雖然只相信西醫，近來也頗有些望而却步了。

前幾天和季蕪談起這些事，並且說，我的病，只要有熟人開一個方就好，用不着向什麼博士化冤錢。第二天，他就給我請了正在繼續研究的 Dr. H. 來了。開了一個方，自然要用稀鹽酸，還有兩樣這里無須說；我所最感謝的是又加些 *Sirup S imbl* 使我喝得甜甜的，不為難。向藥房去配藥，可又成爲問題了，因爲藥房也不免有模模糊糊的，他所沒有的藥品，也許就替換，或者竟刪除。結果是託 *Fraenlein H.* 遠遠地跑到較大的藥房去。

這樣一辦，加上車錢，也還要比醫院的藥價便宜到四分之三。

胃酸得了外來的生力軍，強盛起來，一瓶藥還未喝完，痛就停止了。我決定多喝牠幾天。但是，第二瓶却奇怪，同一的藥房，同一的藥方，藥味可是不同一了；不像前一回的甜，也不酸。我檢查我自己，並不發熱，舌苔也不厚，這分明是藥水

有些蹊蹺。喝了兩回，壞處到也沒有；幸而不是急病，不大要緊，便照例將牠喝完。去買第三瓶時，却附帶了嚴重的質問；那回答是：也許糖分少了一點罷。這意思就是說緊要藥品沒有錯。中國的事情真是稀奇，糖分少一點，不但不甜，連酸也不酸了，的確是「特別國情」。

現在多攻擊大醫院對於病人的冷漠，我想，這些醫院，將病人當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還有在院裏的「高等華人」，將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願意的，只好上私人所開的醫院去，可是診金藥價都很貴。請熟人開了方去買藥呢，藥水也會先後不同起來。

這是人的問題。做事不切實，便什麼都可疑。呂端大事不胡塗，猶言小事不妨胡塗點，這自然很足以顯示我們中國人的雅量，然而我的胃痛却因此延長了。在宇宙的森羅萬象中，我的胃痛當然不過是小事，或者簡直不算事。

質問之後的第三瓶藥水，藥味就同第一瓶一樣了。先前的悶胡盧，到此就容

易打破，就是那第二瓶裏，是只有一日分的藥，却加了兩日分的水的，所以藥味比正當的要薄一半。

雖然連喫藥也那麼蹭蹬，病却也居然好起來了。病略見好，日就攻擊我頭髮長，說爲什麼不趕快去剪髮。

這種攻擊是聽慣的，照例「着毋庸議」。但也不想用功，只是清理抽屜。翻翻廢紙，其中有一束紙條，是前幾年鈔寫的；這很使我覺得自己也日懶一日了，現在早不想做這類事。那時大概是想要做一篇攻擊近時印書，胡亂標點之謬的文章的，廢紙中就鈔有很奇妙的例子。要塞進字紙簍裏時，覺得有幾條總還是愛不忍釋，現在鈔幾條在這裡，馬上印出，以便「有目共賞」罷。其餘的便作爲換取火柴之助

「國朝陳錫路黃爛餘話云。唐傅弈考覈道經衆本。有項羽妾。在齊武

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得之。」（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木茶香室叢鈔

卷四第二頁。）

「國朝歐陽泉點勘記云。歐陽修醉翁亭。記讓泉也。本集及滁州石刻，並同諸選本。作釀泉。誤也。」（同上卷八第七頁。）

「袁石公典試秦中。後頗自悔。其少作詩文。皆粹然一出於正。」（上海士林精舍石印本書影卷一第四百。）

「考……順治中，秀水又有一陳忱，……著誠齋詩集，不出戶庭，錄讀史隨筆，同姓名錄諸書。」（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本水滸續集兩種序第七頁。）

標點古文，確是一種小小的難事，往往無從下筆；有許多處，我常疑心即使請作者自己來標點，怕也不免於遲疑。但上列的幾條，却還不至於那麼無從索解。末兩條的意義尤顯豁，而標點也弄得更聰明。

六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得霽野從他家鄉寄來的信，話並不多，說家裏有病人，別的一切人都都在毫無防備的將被疾病襲擊的恐怖中；末尾還有幾句感慨。

午後，織芳從河南來，談了幾句，恩恩忙忙地就走了，放下兩個包，說這是「方糖」，送你喫的，怕不見得好。織芳這一回有點發胖，又這麼忙，又穿着方馬褂，我恐怕他將要做官了。

打開包來看時，何嘗是「方」的，却是圓圓的小薄片，黃棕色。喫起來又涼又細膩，確是好東西。但我不明白織芳爲什麼叫牠「方糖」？但這也就可以作爲他將要做官的一證。

景宋說這是河南一處什麼地方的名產，是用柿霜做成的；性涼，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瘡之類，用這一搽，便會好。怪不得有這麼細膩，原來是憑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來瀘過的。可惜到他說明的時候，我已經喫了一大半了。連忙將所餘的收起，

豫備將來嘴角下生瘡的時候，好用這來搽。

夜間，又將藏着的柿霜糖喫了一大半，因為我忽而又以為嘴角上生瘡的時候究竟不很多，還不如現在趁新鮮喫一點。不料一喫，就又喫了一大半了。

六月二十八日

晴，大風。

上午出門，主意是在買藥，看見滿街掛着五色國旗，軍警林立。走到豐盛胡同中段，被軍警驅入一條小胡同中。少頃，看見大路上黃塵滾滾，一輛摩托車馳過；少頃，又是一輛；少頃，又是一輛；又是一輛；又是一輛……。車中人看不分明，但見金邊帽。車邊上掛着兵，有的背着紫紅綢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肅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頃，摩托車沒有了，我們漸漸溜出，軍警也不作聲。

溜到西單牌樓大街，也是滿街掛着五色國旗，軍警林立。一羣破衣孩子，各各拿着一把小紙片，叫道：歡迎吳玉帥號外呀！一個來叫我買，我沒有買。

將近宣武門口，一個黃色制服，汗流滿面的漢子從外面走進來，忽而大聲道：「草你媽！許多人都對他看，但他走過去了，許多人也就不看了。走進宣武門城洞下，又是一個破衣孩子拿着一把小紙片，但却默默地將一張塞給我，接來一看，是石印的李國沅先生的傳單，內中大意，是說他的多年痔瘡，已蒙一個國手叫作什麼先生的醫好了。」

到了目的地的藥房時，外面正有一羣人圍着看兩個人的口角；一柄淺藍色的舊洋傘正擋住藥房門。我推那洋傘時，斤量很不輕；終於傘底下回過一個頭來，問我「幹什麼？」我答說進去買藥，他不作聲，又回頭去看口角去了，洋傘的位置依舊。我只好下了十二分的決心，猛力衝鋒；一衝，可就衝進去了。

藥房裏只有賬桌上坐着一個外國人，其餘的店夥都是年青的同胞，服飾乾淨漂亮。不知怎地，我忽而覺得十年以後，他們便都要變為高等華人，而自己却現在就有下等人之感。於是乎恭恭敬敬地將藥方和瓶子捧呈給一位分開頭髮的同胞。

「八毛五分。」他接了一面走，一面說。

「喂！」我實在耐不住，下等脾氣又發作了。藥價八毛、瓶子錢照例五分，我是知道的。現在自己帶了瓶子，怎麼還要付五分錢呢？這一個「喂」字的功用就和國罵的「他媽的」相同，其中含有這麼多的意義。

「八毛！」他也立刻懂得，將五分錢讓去，真是「從善如流」，有正人君子的風度。

我付了八毛錢，等候一會，藥就拿出來了。我想：對付這一種同胞，有時是不宜於太客氣的。於是打開瓶塞，當面嘗了一嘗。

「沒有錯的。」他很聰明，知道我不信任他。

「唔。」我點頭表示贊成。其實是，還是不對，我的味覺不至於很麻木，這回覺得太酸了一點了，他連量杯也懶得用，那稀鹽酸分明已經過量。然而這於我倒毫無妨礙的，我可以每回少喝些，或者對上水，多喝牠幾回。所以說「唔」；「唔」

者，介乎兩可之間，莫明其真意之所在之答話也。

「回見回見！」我取了瓶子，走着說。

「回見。不喝水麼？」

「不喝了。回見。」

我們究竟是禮教之邦的國民，歸根結蒂，還是禮讓。讓出了玻璃門之後，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躡行，行到東長安街左近，又是軍警林立，我正想插穿過去，一個巡警伸手攔住道：不成！我說只要走十幾步，到對面就好了。他的回答仍然是：不成！那結果，是從別的道路繞。

繞到L君的寓所前，便打門，打出一個小使來，說L君出去了，須得午飯時候纔回家。我說，也快到這個時候了，我在這裏等一等罷。他說：不成！你貴姓呀？這使我很狼狽，路既這麼遠，走路又這麼難，白走一遭，實在有些可惜。我想了十秒鐘，便從衣袋裏挖出一張名片來，叫他進去稟告太太，說有這麼一個人，要在這

里等一等，可以不？約有半刻鐘，他出來了，結果是：也不成！先生要三點鐘纔回來哩，你三點鐘再來罷。

又想了十秒鐘，只好決計去訪C君，仍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攪行，這回總算一路無阻，到了。打門一問，來開門的答道：去看一看可在家。我想：這一次是大有希望了。果然，即刻領我進客廳，C君也跑出來。我首先就要求他請我喫午飯。於是請我喫麵包，還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却喫麵。那結果是一盤麵包被我喫得精光，雖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餘無幾了。

喫飽了就講閒話，直到五點鐘。

客廳外是很大的一塊空地，種着許多樹。一株頻果樹下常有孩子們徘徊；C君說，那是在等候頻果落下來的；因爲有定律：誰拾得就歸誰所有。我很笑孩子們的耐心，肯做這樣的迂遠事。然而奇怪，到我辭別出去時，我看見三個孩子手裏已經各有一個頻果了。

回家看日報，上面說：「……吳在長辛店留宿一宵。除上述原因外，尙有一事，係吳由保定啓程後，張其鏗曾爲吳卜一課，謂二十八日入京大利，必可平定西北。二十七日入京欠佳。吳頗以爲然。此亦吳氏遲一日入京之由來也。」因此又想起我今天「不成」了大半天，運氣殊屬欠佳，不如也卜一課，以覘晚上的休咎罷。但我不明卜法，又無筮龜，實在無從措手。後來發明了一種新法，就是隨便拉過一本書來，閉了眼睛，翻開，用手指指下去，然後張開眼，看指着的两句，就算是卜辭。

用的是陶淵明集，如法泡製，那兩句是：「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詳了一會，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選自華蓋集——北新版。）

一九二七年

革命時代的文學

四月八日在黃埔軍官學校講

今天要講幾句的話是就將這「革命時代的文學」算作題目。這學校是邀過我好幾次了，我總是推宕着沒有來。爲什麼呢？因爲我想，諸君的所以來邀我，大約是因爲我曾經做過幾篇小說，是文學家，要從我這里聽文學。其實我並不是的，並不懂什麼。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自然，因爲自己的嗜好，文學書是也時常看看的，不過並無心得，能說出于諸君有用的東西來。加以這幾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經驗，對於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講的文學的議論，都漸漸的懷疑起來。那是開鎗打殺學生的時候罷，文禁也嚴厲了，我想：文

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吶喊，叫苦、鳴不平，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沒有方法對付他們，這文學于人們又有什麼益處呢？

在自然界裏也這樣，鷹的捕雀，不聲不響的是鷹，吱吱叫喊的是雀；貓的捕鼠，不聲不響的是貓，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結果，還是只會開口的被不開口的喫掉。文學家弄得好，做幾篇文章，也許能夠稱譽于當時，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虛名罷，——譬如一個烈士的追悼會開過之後，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傳誦着誰的輓聯做得好：這實在是一件很穩當的買賣。

但在這革命地方的文學家，恐怕總喜歡說文學和革命是大有關係的，例如可以用這來宣傳，鼓吹，煽動，促進革命和完成革命。不過我想，這樣的文章是無力的，因為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

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于入股，在文學中並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爲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學」倒無須急急，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所以，我想：革命，倒是與文章有關係的。革命時代的文學和平時的文學不同。革命來了，文學就變換色彩。但大革命可以變換文學的色彩，小革命却不，因爲不算什麼革命，所以不能變換文字的色彩。在此地是聽慣了「革命」了，江蘇浙江談到革命二字，聽的人都很害怕，講的人也很危險。其實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牠，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爲沒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學家告訴我們：「人類和猴子是沒有大兩樣的，人類和猴子是表兄弟。」但爲什麼人類成了人，猴子終于是猴子呢？這就因爲猴子不肯變化——牠愛用四隻腳走路。也許曾有一個猴子起來，試用兩腳走路的罷，但許多猴子就說：「我們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許你站！」咬死了。牠們不但不肯站起來，並且不肯講話，因爲牠守舊。人類就不然，他

終于站起，講話結果是他勝利了。現在也還沒有完。所以革命是並不稀奇的，凡是至今還未滅亡的民族，還都天天在努力革命，雖然往往不過是小革命。

大革命與文學有什麼影響呢？大約可以分開三個時候來說：

(一) 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學，大抵是對於種種社會狀態，覺得不平，覺得痛苦，就叫苦，鳴不平，在世界文學中關於這類的文學頗不少。但這些叫苦鳴不平的文學對於革命沒有什麼影響，因為叫苦鳴不平，並無力量，壓迫你們的人仍然不理，老鼠雖然吱吱地叫，儘管叫出很好的文學，而貓兒喫起來，還是不客氣。所以僅僅有叫苦鳴不平的文學時，這個民族還沒有希望，因為止於叫苦和鳴不平。例如人們打官司，失敗的方面到了分發冤單的時候；對手就知道他沒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經了結了；所以叫苦鳴不平的文學等於喊冤，壓迫者對此倒覺得放心。有些民族因為叫苦無用，連苦也不叫了，他們便成爲沈默的民族，漸漸更加衰頹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是沒有什麼聲音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蘊有力量

民族，因為叫苦沒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爲怒吼。怒吼的文學一出現，反抗就決到了；他們已經很憤怒，所以與革命爆發時代接近的文學每每帶有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復仇。蘇俄革命將起時，即有些這類的文學。但也有例外，如波斯，雖然早有復讎的文學，然而他的恢復，是靠着歐洲大戰的。

(二) 到了大革命的時代，文學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因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蕩，大家由呼喊而轉入行動，大家忙着革命，沒有閒空談文學了。還有一層，是那時民生凋敝，一心尋麵包喫尙且來不及，那里有心思談文學呢？守舊的人因為受革命潮流的打擊，氣得發昏，也不能再唱所謂他們底文學了。有人說：「文學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我在北京時，一窮，就到處借錢，不寫一個字，到薪俸發放時，才坐下來做文章。忙的時候也必定沒有文學作品，挑擔的人必要把擔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車的人也必要把車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時代忙得很，同時又窮得很，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關

爭，非先行變換現代社會底狀態不可，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時代的文學只好暫歸沈寂了。

(三) 等到大革命成功後，社會底狀態緩和了，大家底生活有餘裕了，這時候就又產生文學。這時候底文學有二：一種文學是贊揚革命，稱頌革命，——謳歌革命；——為進步的文學家想到社會改變，社會向前走，對於舊社會的破壞和新社會的建設，都覺得有意義，一方面對於舊制度的壞破很高興；一方面對於新的建設來謳歌。另有一種文學是弔社會的滅亡——輓歌——也是革命後會有的文學。有些人以為這是「反革命的文學」，我想，倒也無須加以這麼大的罪名。革命雖然進行，但社會上舊人物還很多，決不能一時變成新人物，他們的腦中滿藏着舊思想舊東西；環境漸變，影響到他們自身的一切，於是回想舊時的舒服，便對於舊社會眷念不已，戀戀不捨，因而講出很古的話，陳舊的話，形成這樣的文學。這種文學都是悲哀的調子，表示他心裏不舒服，一方面看見新的建設勝利了，一方面看見舊的制

度滅亡了，所以唱起輓歌來。但是懷舊，唱輓歌，就表示已經革命了，如果沒有革命，舊人物正得勢，是不會唱輓歌的。

不過中國沒有這兩種文學——對舊制度輓歌，對新制度謳歌；因為中國革命還沒有成功，正是青黃不接，忙於革命的時候。不過舊文學仍然很多，報紙上的文章，幾乎全是舊式。我想：這足見中國革命對於社會沒有多大的改變，對於守舊的人沒有多大的影響，所以舊人仍能超然物外。廣東報紙所講的文學，都是舊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證明廣東社會沒有受革命影響；沒有對新的謳歌，也沒有對舊的輓歌，廣東仍然是十年前底廣東。不但如此，並且也沒有叫苦，沒有鳴不平；止看見工會參加遊行，但這是政府允許的，不是因壓迫而反抗的，也不過是奉旨革命。中國社會沒有改變，所以沒有懷舊的哀詞，也沒有嶄新的進行曲，只在蘇俄却已產生了這些兩種文學。他們的舊文學家逃亡外國，所作的文學，多是弔亡輓舊的哀詞，新文學則正在努力向前走，偉大的作品雖然還沒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們已離

開怒吼時期而過渡到謳歌的時期了。贊美建設是革命進行以後的影響，再往後去的情形怎樣，現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來，大約是平民文學罷，因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結果。

現在中國自然沒有平民文學，世界上也還沒有平民的文學，所有的文學，歌呀，詩呀，大抵是給上等入看的；他們吃飽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一個才子出門遇見一個佳人，兩個人很要好，有一個不才子從中搗亂，生出差遲來，但終于團圓了。這樣地看看，多麼舒服。或者講上等入怎樣有趣和快樂，下等人怎樣可笑。前幾年新青年載過幾篇小說，描寫罪人在寒地裏的生活，大學教授看了就不高興，因為他們不喜歡看這樣的下流人。如果詩歌描寫車夫，就是下流詩歌；一齣戲裏，有犯罪的事情，就是下流戲。他們的戲裏的脚色，止有才子佳人，才子中狀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歡喜，他們看了也很歡喜，下等人沒奈何，也只好替他們一同歡喜歡喜。在現在，有人以平民——工人農民——為材料，做小說做詩，

我們也稱之爲平民文學，其實這不是平民文學，因爲平民還沒有開口。這是零外的人從旁看見平民的生活，假託平民底口吻而說的。眼前的文人有些雖然窮，但總比工人農民富足些。這纔能有錢去讀書，纔能有文章，一看好像是平民所說的，其實不是；這不是真的平民小說。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現在也有人寫下來，以爲是平民之音了，因爲是老百姓所唱。但他們間接受古書的影響很大，他們對於鄉下的紳士有田三千畝，佩服不得了，每每拿紳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紳士們慣吟五言詩，七言詩；因此他們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這是就格律而言，還有構思取意，也是很陳腐的，不能稱是真正的平民文學。現在中國底小說和詩實在比不上別國，無可奈何，只好稱之曰文學；談不到革命時代的文學，更談不到平民文學。現在的文學家都是讀書人，如果工人農民不解放，工人農民的思想，仍然是讀書人的思想；必待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後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有些人說：「中國已有平民文學。」其實這是不對的。

諸君是實際的戰爭者，是革命的戰士，我以為現在還是不要佩服文學的好。文學對於戰爭，沒有益處，最好不過作一篇戰歌，或者寫得美的，便可於戰餘休憩時看看，倒也有趣。要講得堂皇點，則譬如種柳樹，待到柳樹長大，濃陰蔽日，農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樹底下喫飯，休息休息。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砲就把孫傳芳轟走了。自然也有人以為文學於革命是有偉力的，但我個人總覺得懷疑，文學總是一種餘裕產物，可以表示一民族文化，倒是真的。

人大概是不滿於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只會做幾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厭了。而捏鎗的諸君，却又要聽講文學。我呢，自然倒願意聽聽大砲的聲音，彷彿覺得大砲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我的演說祇有這樣多，感謝諸君聽完的厚意！

盧梭和胃口

做過民約論的盧梭，自從他還未死掉的時候起，便受人們的責備和迫害，直到現在，責備終於沒有完。連在和「民約」沒有什麼關係的中華民國，也難免這一幕了。

例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愛彌爾中文譯本的序文上，就說——

「……本書的第五編即女子教育，他的主張非但不澈底，而且不承認女子的人格，與前四編的尊重人類相矛盾。……所以在今日看來，他對於人類正當的主張，可說只樹得一半……。」

然而復旦大學出版的復旦旬刊創刊號上梁實秋教授的意思，却「稍微有點不同了。其實豈但「稍微」而已耶。乃是「盧梭論教育，無一是處，唯其論女子教育，的確精當。」因為那是「根據於男女的性質與體格的差別而來」的。而近代生物

學和心理學研究的結果，又證明着天下沒有兩個人是無差別。怎樣的就該施以怎樣的教育。所以，梁先生說——

「我覺得『人』字根本的該從字典裏永遠註銷，或由政府下令永禁行使。因為『人』字的意義太糊塗了。聰明絕頂的人，我們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樣的叫做人，弱不禁風的女子，叫做人，粗橫強大的男人，也叫做人，人裏面的三流九等，無一非人，近代的德謨克拉西的思想，平等的觀念，其起源即由於不承認人類的差別。近代所謂的男女平等運動，其起源即由於不承認男女的差別。人格是一個抽象名詞，是一個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點總和。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點既有差別，實即人格上亦有差別。所謂侮辱人格的，即是不承認一個人特有的人格，盧梭承認女子有女子的人格，所以盧梭正是尊重女子的人格。抹殺女子所特性者，纔是侮辱

女子人格。」

於是勢必至於得到這樣的結論。

「……正當的女子教育應該是使女子成爲完全的女子。」

那麼，所謂正當的教育者，也應該是使「弱不禁風」者，成爲完全的「弱不禁風」，「蠢笨如牛」者，成爲完全的「蠢笨如牛」，這纔免於侮辱各人——此字在未經從字典裏永遠註銷，政府下令永禁行使之前，暫且使用——的人格了。盧梭愛彌爾前四編的主張不這樣，其「無一是處」，於是可算無疑。

但這所謂「無一是處」者，也只是對於「聰明絕頂的人」而言，在「蠢笨如牛的人」，却是「正當」的教育。因爲有了這樣的議論，可以使他更漸近於完全「蠢笨如牛」。這也就是尊重他的人格。

然而這種議論還是不會元結的。爲什麼呢？一者，因爲即使知道說「自然的不平等」，而不容易明白真「自然」和「因積漸的人爲而似自然」之分。二者，因爲凡有學說，往往「合吾人之胃口者則容納之，且從而宣揚之」也。

上海一偶，前二年大談亞諾德，今年大談白璧德，恐怕也就是胃口之故罷。

許多問題大抵發生於「胃口」，胃口的差別，也正如「人」字一樣的。其實這兩字也應該呈請政府「下令永禁行使」。我且抄一段同是美國的 Upton Sinclair 的，以尊重另一種人格罷——

「無論在那一個盧梭的批評家，都有首先應該解決的唯一的問題。爲什麼你和他吵鬧的？要爲他的到達點的那自由，平等，調協開路麼？還是因爲畏懼盧梭所發向世界上的新思想和新感情的激流呢？使對於他取了爲父之勢的個人主義運動的全體懷疑，將我們帶到女子服從父母，奴隸服從主人，妻子服從丈夫，臣民服從教皇和皇帝，大學生毫不發生疑問，而佩服教授的講義的善良的古代去，乃是你的目的麼？」

阿崑夫人曰：「最後的一句，好像是對於白璧德教授的一箭似的。」

「奇怪呀，」她的丈夫說。「斯人也而有斯姓也……那一定是上帝的審判

不知道和原意可有錯誤，因為我是從日本文重譯的。書的原名是「Mammonar」，在 California 的 Pasadena 作者自己出版，胃口相近的人們自己弄來看去罷。Mammonar 是希臘神話裏的財神，art 誰都知道是藝術。可以譯作「財神藝術」罷。日本的譯名是「拜金藝術」，也行。因為這一個字是作者生造的，政府既沒有下令頒行，字典裏也大概未曾註入，所以姑且在這里加一點解釋。

(十二，二一。)

(選自而已集——北新版。)

革命文學

今年在南方，聽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聽得大家叫「討赤」的一樣盛大。

而這「革命」還侵入文藝界裏了。

最近，廣州的日報上還有一篇文章指示我們，叫我們應該以四位革命文學家爲師法：意大利的唐南遮，德國的霍普德曼，西班牙的伊本納茲，中國的吳稚暉。

兩位帝國主義者，一位本國政府的叛徒，一位國民黨救護的發起者，都應該作爲革命文學的師法，於是革命文學便莫名其妙了，因爲這實在是至難之業。

於是不得已，世間往往誤以兩種文學爲革命文學：一是在一方的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一是紙面上寫着許多「打，打」，「殺，殺」，或「血，血」的。

如果這是「革命文學」，則做「革命文學家」，實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從指揮刀下罵出去，從裁判席上罵下去，從官營的報上罵開去，真是偉哉一世之雄，妙在言罵者不敢開口。而又有人說，這不敢開口，又何其怯也？對無「殺身成仁」之勇，是第二條罪狀，斯愈足以顯革命文學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這文

學並非對於強暴者的革命，而是對於失敗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窮措大想做富貴時，多用些「金」「玉」「錦」「綺」字面，自以爲豪華，而不知適見其寒蠢。真會寫富貴景象的，有道：「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殺，殺」，聽去誠然是英勇的，但不過是一面鼓。即使是鞦韆，倘若前面無敵軍，後面無我軍，終於不過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爲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用的是什麼材料，卽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賦得革命，五言八韻」，是只能騙騙盲試官的。

但「革命人」就稀有。俄國十月革命時，確會有許多文人願爲革命盡力。但事實的狂風，終於轉得他們手足無措。顯明的例是詩人葉遂寧的自殺，還有小說家梭波里，便最後的話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時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氣，才可以做革命文學。

葉遂寧和梭波里終於不是革命文學家。爲什麼呢，因爲俄國是已經在革命。革命文學家風起雲湧的所在，其實在並沒有革命的。

（選自而已集——北新版。）

無聲的中國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會講——

以我這樣沒有什麼可聽的無聊的講演，又在這樣大雨的時候，竟還有這許多來聽的諸君，我首先應當聲明我的鄭重的感謝。

我現在所講的題目是：『無聲的中國。』

現在，浙江，陝西，都在打仗。那裏的人民哭着呢還是笑着呢，我們不知道。

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這裏的中國人，舒服呢還是不很舒服呢，別人也不知道。

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來達意，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這也怪不得我們；因為那文字，先就是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產。人們費了多年的工夫，還是難于運用。因為難，許多人便不理牠了，甚至于連自己的姓也寫不清是張還是章，或者簡直不會寫，或者說道：Chang 雖然能說話，而只有幾個人聽到，遠處的人們便不知道，結果也等于無聲。又因為難，有些人便當作寶貝，像玩把戲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幾個人懂，——其實是不知可真懂，而大多數的人們却不懂得，結果也等于無聲。

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夠把他們的思想，感情，藉此傳給大眾，傳給將來。中國雖然有文字，現在却已經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那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盤散沙。

將文章當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認識，使人懂得為好，也許是有趣的事罷。但是

，結果怎樣呢？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拿最近的事情來說，如中日戰爭，拳匪事件，民元革命這些大事件，一直到現在，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民國以來，也還是誰也不作聲。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

這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洲人以異族侵入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所謂讀書人，便只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毫無關係的文章。有些新文，也還是不行的；不是學韓，便是學蘇。韓愈蘇軾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文章來說當時要說的話，那當然可以的。我們却並非唐宋時人，怎麼做和我們毫無關係的時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時代的聲音，韓愈蘇軾的聲

音，而不是我們現代的聲音。然而直到現在，中國人却還要着這樣的舊戲法。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人會沒有聲音的麼？沒有，可以說：是死了。倘要說得客氣一點，那就是：已經啞了。

要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你活過來！』我雖然並不懂得宗教，但我以為正如想出現一個宗教上之所謂『奇蹟』一樣。

首先來嘗試這工作的是『五四運動』前一年，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革命』這兩個字，在這裡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聽到就害怕的。但這和文學兩字連起來的『革命』，却沒有法國革命的『革命』那麼可怕，不但是革新，改換一個字，就很平和了，我們就稱爲『文學革新』罷，中國文字上，這樣的花樣是很多的。那大意也並不可怕，不過說：我們不必再去費盡心機，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

然而，單是文學革新是不夠的，因為腐敗思想，能用古董做，也能用白話做。所以後來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結果，是發生社會革新運動。這運動一發生，自然一而就發生反動，於是便釀成戰鬪……。

但是，在中國，剛剛提起文學革新，就有反動了。不過白話文却漸演風行起來，不大受阻礙。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就因為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漢字，用羅羅字母來替代。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就大不得了，於是便放過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衷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却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羅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其實，文言和白話的優劣的討論，本該早已過去了，但中國是總不肯早早解決的，到現在還有許多無謂的議論。例如，有的說：古文各省人都懂，白話就各處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發達就好，那時就人人都能懂較爲易解的白話文；至于古文，何嘗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裏，也沒有許多人懂得的。有的說：如果都用白話文，人們便不能看古書，中國的文化就滅亡了。其實呢，現在的人們大可以不必看古書，即使古書裏真有好東西，也可以用白話來譯出的，用不着那麼心驚胆戰。他們又有人說，外國尙且譯中國書，足見其好，我們自己倒不看麼？殊不知埃及的古書，外國人也譯，斐非黑人的神話，外國人也譯，他們別有用意，即使譯出，也算不了怎樣光榮的事的。

近來還有一種說法，是思想革新緊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淺顯的文言來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對。這話似乎也有理。然而我們知道，連他長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決不肯剪去他的辮子的。

因為我們說着古代的話，說着大家不明白，不聽見的話，已經弄得像一盤散沙，癢癢不相關了。我們要活過來，首先就須由青年們不再說孔子孟子和韓愈柳宗元們的話。時代不同，情形也兩樣，孔子時代的香港不這樣，孔子口調的『香港論』是無從做起的，『吁嗟關哉香港也』，不過是笑話。

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着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但是，這也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他們說白話文卑鄙，沒有價值；他們說年青人作品幼稚，貽笑大方。我們中國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餘的都只能說白話，難道這許多中國人，就都是卑鄙，沒有價值的麼？至於幼稚，尤其沒有什麼可羞，正如孩子對於老人，毫沒有什麼可羞一樣。幼稚是會生長，會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敗，就好。倘說待到純熟了纔可以動手，那是雖是村婦也不至于這樣蠢。她的孩子學走路，即使跌倒了，她決不至於叫孩子從此躺在牀上，待到學會了走法再下地面來的。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胆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纔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纔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上生活上生活。

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那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可聽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別的聲音可還有？

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捨掉古文而生存。

（選自三開集——北新版。）

一九二八年

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

英勇的刊物是層出不窮，『文藝的分野』上的確熱鬧起來了。日報廣告上的『戰線』這名目就惹人注意，一看便知道其中都是戰士。承蒙一個朋友寄給我三本，纔得看見了一點鎗烟，並且明白弱水做的『談中國現在的文學界』裏的有一粒彈子，是瞄準着我的。爲什麼呢？因爲先是『醉眼中的朦朧』做錯了。據說錯處有三：一是態度，二是氣量，三是年紀。複述易於失真，還是將這粒彈子移置在下面罷：

『魯迅那篇，不敬得很，態度太不興了。我們從他先後的論戰上看來，不能不說他的氣量太窄了。最先（據所知）他和西澄戰，繼和長虹戰，我們

一方面覺得正直是在他這面，一方面又覺得辭鋒太有點尖酸刻薄，現在又和創造社戰，辭鋒仍是尖酸，正直却不一定落在他這面。是的，仿吾和初梨兩人對他的批評是可以有反駁的地方，但這應莊嚴出之，因為他們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對，冷嘲熱刺，只有對於冥頑不靈者為必要，因為是不可理喻。對於熱烈猛進的絕對不合用這種態度。他那種態度，雖然在他自己亦許覺得罵得痛快，但那種口吻，適足表出『老頭子』的確不行吧了。好吧，這事本該是沒有勉強的必要和可能，讓各人走各人的路去好了。我們不禁想起了五四時的林琴南先生了！』

這一段雖然並不涉及是非，只在態度，氣量，口吻上，斷定這『老頭子』的確不行』，從此又自然而地抹殺我那篇文章，但粗粗一看，却很像第三者從旁的批評。從我看來，『尖酸刻薄』之處也不少，作者大概是青年，不會有『老頭子』氣的，這恐怕因為我『冥頑不靈』，不得已而用之的罷，或者便是自己不覺得。不過我

要指摘，這位隱姓隱名的弱水先生，其實是創造社那一面的。我並非說，這些戰士，大概是創造社裏常見他的腳踪，或在藝術大學裏兼有一隻飯碗，不過指明他們是相同的氣量。因此，所謂『戰線』，也仍不過是創造社的戰線。所以我和西澗長虹戰，他雖然看見正直，却一聲不響，今和創造社戰，便只看見尖酸，忽然顯戰士身而出現了。其實所斷定的先兩回的我的『正直』，也還是死了已經兩千多年的老頭子老聃先師的『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戰略，我並不感服這類的公評。陳西澗也知道這種戰法的，他因為要打倒我的短評，便稱讚我的小說，以見他之公正。

即使真以為先兩回是正直在我這面的罷，也還是因為這位弱水先生是不和他們同系，同社，同派，同流……。從他們那一面看來，事情可就兩樣了。我『和西澗戰』了以後，現代系的唐有壬曾說『語絲』的言論，是受了黑斯科的命令；『和長虹戰』了以後，狂飈派的常燕生曾說『狂飈』的停版，也許因為我的陰謀。但除了我們兩方以外，恐怕不大人注意或記得了罷。事不干己，是很容易滑過去的。

這次對於創造社，是的，『不敬得很』，未免有些不『莊嚴』；即使在我以為是直道而行，他們也仍可認為『尖酸刻薄』。於是『論戰』便變成『態度戰』，『氣量戰』，『年齡戰』了。但成仿吾輩的對我的『態度』，戰士們雖然不屑留心到，在我本身是明白的。我有兄弟，自以為算不得就是我『不可理喻』，而這位批評家于『吶喊』出版時，即加以譏刺道：『這回由令弟編了出來，真是好看得多了。』

『這傳統直到五年之後，再見于馮乃超的論文，說是『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我的主張如何且不論，即使相同，何以說話相同便是『無聊賴地』？莫非一有『弟弟』，就必須反對，一個講革命，一個即該講保皇，一個學地理，一個就得學天文麼？還有，我合印一年的雜感為『華蓋集』，另印先前所鈔的小說史料為『小說舊聞鈔』，是並不相干的。這位成仿吾先生却加以編排道：『我們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一小說舊聞』。『這使才初梨很高興，今年又鈔在『文化批判』裏，還樂得不可開交道，『他（成仿吾）這段文章，比』

趣味文學」還更有趣些。」但是還不夠，他們因為我生在紹興，紹興出酒，便說『醉眼陶然』；因為我年紀比他們大了，便說『老生』，還要加注道：『若許我用文學的表現』。而這一個『老』的錯處，還給『戰線』上的弱水先生作爲『的確不行』的根源。我自信對於創造社，還不至於用了他們的籍貫，家族，年紀，來作奚落的資料，不過今年偶然做了一篇文章，其中第一次指摘了他們文字裏的矛盾和笑話而已。但是『態度』問題來了，『氣量』問題也來了，連戰士也以爲尖酸刻薄。莫非必須我學革命文學家所指爲『卑污』的託爾斯泰，毫無抵抗，或者上一呈文：『小資產階級或有產階級魯迅誠恐惶恐謹呈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老爺麾下』，這纔不至於『的確不行』麼？

至于我是『老頭子』，却的確是我的不行。『和長虹戰』的時候，他也曾指出我這一條大錯處，此外還嘲笑我的生病。而且也是真的，我的確生過病，這回弱水這一位『小頭子』對於這一節沒有話說。可見有些還青年究竟還懷着純朴的心，很

是厚道的。所以他將『冷嘲熱刺』的用途，也瓜分開來，給「熱烈猛進的」製定了優待條件。可惜我生得太早，已經不屬於那一類，不能享受同等待遇了。但幸而我年青時沒有真上戰線去，受過創傷，倘使身上有了殘疾，那就又添一件話柄，現在真不知道要受多少奚落哩。『不革命』的好處，應該感謝自己的。

其實這回的不行，還只是我不行，無關年紀的。託爾斯泰，克羅頗特庚，馬克|斯，雖然言行有『卑污』與否之分，但畢竟都苦鬪了一生，以看見他們的照相，全有大鬍子。因為我一個而抹殺一切『老頭子』，大約是不算公允的。然而中國呢，自然不免又有些特別，不行的多。少年尙且老成，老年當然成老，林琴南先生是確乎應該想起來的，他後來真是暮年景象，因為反對白話，不能論戰，便從構道兒來做一篇影射小說，使一個武人痛打改革者，——說得『美麗』一點，就是神往于『武器的文藝』了。舊的和新的，往往有極其相同之點——如：個人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往往都反對資產階級，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張爲人生的藝術，都諱言黑暗

，捧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都厭惡人道主義等——林琴南先生的事也正是一個證明。至于所以不行之故，其關鍵就全在他生得更早，不知道這一階級將被『奧服赫變』，及早變計，於是歸根結蒂，分明現出Fascist本相了。但我以為『老頭子』如此，是不足慮的，他總比青年先死。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將為將來柱石的青年，還像的東拉西扯。

又來說話，氣量又太小了，再說下去，就要更小，『正直』豈但『不一定』在這一面呢，還要一定不在這一面。而且所說的又都是自己的事，並非『大貧』的民衆……但是，即使所講的只是個人的事，有些人固然只看見個人，有些人却也看見背景或環境：例如『魯迅在廣東』這一本書，今年戰士們忽以為編者和被編者希圖不朽，於是看得『煩躁』，也給了一點對於『冥頑不靈』的冷嘲。我却以為這太偏於唯心論了，無所謂不朽，不朽又幹嗎，這是現代人大抵知道的。所以會有這一本書，其實不過是要黑字印在白紙上，訂成一本，作商品出售罷了。無論是怎樣

泡製法，所謂『魯迅』也者，往往不過是充當了一種的材料。這種方法，便是「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對」的創造社也在所不免的。託羅茲基雖然已經『沒落』，但他會說，不含利害關係的文章，當在將來另一制度的社會裏。我以為他這話却還是對的。

（四月二十日。）

（選自三開集——北新版。）

一九二九年

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學國文學會講——

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諸君說什麼話了，因為革命以來，言論的路很窄小，不是過激，便是反動，於大家都無益處。這一次回到北平，幾位舊識的人要我到這里來講幾句，情不可却，只好來講幾句。但因為種種瑣事，終于沒有想定究竟章來講什麼——連題目都沒有。

那題目，原是想在車上擬定的，但因為道路壞，汽車顛起來有尺多高，無從想起。我於是偶然感到，外來的東西，單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車也須有好道路，一切事總免不掉環境的影響。文學——在中國的所謂新文學，所謂革命文學，也是

如此。

中國的文化，便是怎樣的愛國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認是有些落後。新的事物，都是從外面侵入的。新的勢力來到了，大多數的人們還是莫名其妙。北平還不到這樣，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國人是處在中央，那外面，圍着一羣翻譯，包探，巡捕，西崽……之類，是懂得外國語，熟悉租界章程的。這一圈之外，纔是許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場，永遠不會明白真實情形，外國人說“*Yes*”，翻譯道，「他在說打一個耳光」，外國人說“*No*”，翻出來却是他說『去鎗斃』。倘想要免去這一類無謂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點，衝破了這一個圈子。

在文學界也一樣，我們知道得太不多，而幫助我們知識的材料也太少。梁實秋有一個白璧德，徐志摩有一個泰戈爾，胡適之有一個杜威，——是的，徐志摩還有一個曼殊斐兒，他到她墳上去哭過，——創造社有革命文學，時行的文學。不過附

和的，創作的很有，研究的却不多，直到現在，還是給幾個出題目的人們圈了起來。

各種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推崇文藝的人，雖喜歡說文藝足以煽起風波來，但在事實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藝後變。倘以為文藝可以改變環境，那是『唯心』之談。事實的出現，並不如文學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謂革命文學者還須滅亡，待到革命略有結果，略有喘息的餘裕，這纔產生新的革命文學者。為什麼呢，因為舊社會將近崩壞之際，是常常會有近似帶革命性的文學作品出現的，然而其實並非真的革命文學。例如：戰者憎惡舊社會，而只是憎惡，更沒有對於將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却是不能實現的烏託邦；或者自己活得無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轉變，來作刺戟，正如飽於飲食的人，想喫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舊式人物，但在社會裏失敗了，却想另掛新招牌，靠新興勢力獲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沈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國更曾有過的。即如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他們歎漢族的被壓制，憤滿人的凶橫，渴望着『光復舊物』。但民國成立以後，倒寂然無聲了。我想，這是因爲他們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後，『重見漢官威儀』，峨冠博帶。而事實並不這樣，所以反而索然無味。不想執筆了。俄國的例子尤爲明顯，十月革命開初，也曾有許多革命文學家非常驚喜，歡迎這暴風雨的襲來，願受風雷的試鍊。但後來，詩人葉遂甯，小說家索波里自殺了，近來還聽說有名的小說家愛倫堡有些反動，這是什麼緣故呢？就因爲四面襲來的並不是暴風雨，來試鍊的也並非風雷，却是老老實實的『革命』。空想被擊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這倒不如古時候相信死後靈魂上天，座在上帝旁邊喫點心的詩人們福氣。因爲他們在達到目的之前，已經死掉了。

中國，據說，自然是已經革了命，——政治上也許如此罷，但在文藝上，却並沒有改變。有人說，『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抬頭』了，其實是，小資產階級文學在那

裏呢，連『頭』也沒有，那裏說得到『抬』。這照我上面所講的推論起來，就是文學並不變化和興旺，所反映的便是並無革命和進步，——雖然革命家聽了也許不大喜歡。

至于創造社所提倡的，更徹底的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自然更不過是一個題目。這邊也禁，那邊也禁的王獨清的從上海租界裏遙望廣州暴動的詩，“Po ng Pong Pong”鉛字逐漸大了起來，只在說明他曾爲電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醬園招牌所感動，有摹倣勃洛克的『十二個』之志而無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隻手』是很多人推爲佳作的，但內容說一個革命者革命之後失了一隻手，所餘的一隻還能和愛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五體，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實在還不如一隻手；一條腿就不便，頭自然更不行了。只準備失去一隻手，是能減少戰鬥的勇往之氣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犧牲的，一定不只這一點。『一隻手』也還是窮秀才落難，後來終於中狀元，諧花燭的老調。

但這些却也正是中國現狀的一種反映。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學的一本書的封面上，畫着一把鋼叉，這是從『苦悶的象徵』的書面上取來的，叉的中間的一條尖刺上，又安一個鐵鎚，這是從蘇聯的旗子上取來的。然而這樣地合了起來，却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藝家的徽章。

從這一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一直說，使大眾看去，爲仇爲友，了了分明。不要腦子裏存着許多舊的殘滓，却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無產階級！』現在的人們既然神經過敏，聽到『俄』字便要氣絕，連嘴唇也快要不准紅了，對於出版物，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學家又不肯多紹介別國的理論和作品，單是這樣的指着自己的鼻子，臨了便會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樣，令人莫名其妙。

對於諸君，『奉旨申斥』大概還須解釋幾句纔會明白罷。這是帝制時代的事。

一個官員犯了過失了，便叫他跪在一個什麼門外面，皇帝差一個太監來斥罵。這時須得用一點化費，那麼，罵幾句就完；倘若不用，他便從祖宗一直罵到子孫。這算是皇帝在罵，然而誰能去問皇帝，問他究竟可是要這樣地罵呢？去年，據日本的雜誌上說，成仿吾是由中國的農工大衆選他往德國研究戲曲去了，我們也無從打聽，究竟真是這樣地選了沒有。

所以我想，倘要比較地明白，還只好用我的老話，『多看外國書』，來打破這包圍的圈子。這事，于諸君是不甚費力的。關於新興文學的英文書或英譯書，即使不多，然而所有的幾本，一定較爲切實可靠。多看些別國的理論和作品之後，再來估量中國的新文藝，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介紹到中國來；翻譯並不比隨便的創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學發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

流氓的變遷

孔墨都不滿於現狀，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說動人主，而那用以壓服人主的傢伙，則都是「天」。

孔子之徒爲儒，墨子之徒爲俠。「儒者，柔也，」當然不會危險的。惟俠老實，所以者墨的末流，至於以「死」爲終極的目的。到後來，真老實的逐漸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俠，漢的大俠，就已和公侯權貴相餽贈，以備危急時來作護符之用了。

司馬遷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亂」之和「犯」，決不是「叛」，不過鬧點小亂子而已，而況有權貴如「五侯」者在。

「俠」字漸消，強盜起了，但也是俠之流，他們的旗幟是「替天行道」。他們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爲不反對天子，所以大

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滿洲入關，中國漸被壓服了，連有『俠氣』的人，也不敢再起盜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爲天子效力，於是跟一個好官員或欽差大臣，給他保鑣，替他捕盜，一部『施公案』，也說得很分明，還有『彭公案』『七俠五義』之流，至今沒有窮盡。他們出身清白，連先前也並無壞處，雖在欽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對一面固然必須聽命，對別方面還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然而爲盜要被官兵所打，捕盜也要被強盜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俠客，是覺得都不妥當的，於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來打，男女通姦他來捉，私娼私販凌辱，爲的是維持風化；鄉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來欺侮，爲的是看不起無知；剪髮女人他來嘲罵，社會改革者他來憎惡，爲的是寶愛秩序。但後面是傳統的靠山，對手又都非浩蕩的強敵，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現在的小說，還沒有寫出這一種典型的書，惟『

九尾龜』中的章秋谷，以爲他給妓女喫苦，是因爲她要敲人們竹槓，所以給以懲罰之類的敘述，約略近之。

由現狀再降下去，大概這一流人將成爲文藝書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學家』張資平『氏』的近作。

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

新月社中的批評家，是很憎惡嘲罵的，但只嘲罵一種人，是做嘲罵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評家，是很不以不滿於現狀的人爲然的，但只不滿於一種現狀，是現在有竟不滿於現狀者。

這大約就是『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揮淚以維持治安的意思。

譬如，殺人，是不行的。但殺掉『殺人犯』的人，雖是同是殺人，又誰能說他錯？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爺要打鬥毆犯人的屁股時，阜隸來一五一十的打，難

道也算犯罪麼？新月社批評家雖然也有嘲罵，也有不滿，而獨能超然於嘲罵和不滿的罪惡之外者，我以為就是這一個道理。

但老例，劊子手和卓隸既然做了這樣維持治安的任務，在社會上自然要得到幾分的敬畏，甚至於還不妨隨意說幾句話，在小百姓面前顯顯威風，只要不大妨害治安，長官向來也就裝作不知道了。

現在新月社的批評家這樣盡力地維持了治安，所要的却不過是『思想自由』，想想而已，決不實現的思想。而不料遇到了別一種維持治安法，竟連想也不準想了。從此以後，恐怕要不滿於兩種現狀了罷。

（選自萌芽月刊——光華版。）

我和『語絲』的始終

——「我所遇見的六個文學團體」之五——

同我關係較爲長久的，要算『語絲』了。

大約這也是原因之一罷，『正人君子』們的刊物，曾封我爲『語絲派主將』，連急進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還說我是『語絲』的『指導者』。去年，非魯迅便不足以自救其沒落的時候，我曾蒙匿名氏寄給我兩本中塗的『山雨』，打開一看，其中有一篇短文，大意是說我和孫伏園君在北京門被晨報館所壓迫，創辦『語絲』，現在自己一做編輯，便在投稿後面亂加按語，曲解原意，壓迫別的作者了，孫伏園君却有絕好的議論，所以此後魯迅應該聽命於伏園。這聽說是張孟聞先生的大文，雖然文名是另外兩個字。看來好像一羣人，其實不過一兩個，這種事現在是常有的。

自然，『主將』和『指導者』，並不是壞稱呼，被晨報館所壓迫，也不能算是恥辱，老人該受青年的教訓，更是進步的好現象，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但是，『不虞之譽』也和『不虞之毀』一樣地無聊，如果生平未曾帶過一兵半卒，而有人拱手

頌揚道：『你真像拿破崙呀！』則雖是志在做軍閥的未來的英雄，也不會怎樣舒服的。我並非『主將』的事，前年早已聲辯了——雖然似乎很少效力——這回想要寫一點下來的，是我從來沒有受過晨報館的壓迫，也並不是和孫伏園先生兩個人創辦了『語絲』。這的創辦，倒要歸功於伏園一位的。

那時伏園是『晨報副刊』的編輯，我是由他個人來約，投些稿件的人。

然而我並沒有什麼稿件，於是就有人傳說，我是特約撰述，無論投稿多少，每月總有酬金三四十元的。據我所聞，則晨報館確有這一種太上作者，但我並非其中之一，不過因為先前的師生——恕我僭妄，暫用這兩個字——關係罷，似乎也頗受優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費，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雜評，有時也送些稿費來。但這樣的好景象並不久長，伏園的椅子頗有不穩之勢。因為有一位留學生（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姓名）新從歐洲回來，和晨報館有深關係，甚不滿意於副刊，決計加以改革，並且為戰鬥計，已經得了『學

者』的指示，在開手看 *Anatole France* 的小說了。

那時的法蘭斯，威爾士，蕭，在中國是大有威力，足以嚇倒文學青年的名字，正如今年的辛克萊兒一般，所以以那時而論，形勢實在是已經非常嚴重。不過我現在無從確說，從那位留學生開手讀法蘭斯的小說起到伏園氣忿忿地跑到我的寓裏來爲止的時候，其間相距是幾月還是幾天。

『我辭職了。可惡！』

這是有一夜，伏園來訪，見面後的第一句話。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異的。第二步，我當然要問問辭職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關係。他說，那位留學生乘他外出時，到排字房去將我的稿子抽掉，因此爭執起來，弄到非辭職不可了。但我並不氣忿，因爲那稿子不過是三段打油詩，題作『我的失戀』，是看見當時『阿呀阿哨，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罷』收場的東西，開玩笑的。這詩後來又添了一段，登在『語絲』上，再後來就收在『野草』中。而且

所用的又是另一個清鮮的假名，在不肯登載第一次看見姓名的作者的稿子的刊物上，也當然很容易被有權者所放逐。

但我很抱歉伏園爲了我的稿子而辭職，心上似乎壓了一塊沈重的石頭。幾天之後，他提議要自辦刊物了，我自然答應願意竭力『吶喊』。至於投稿者，倒全是他獨力邀來的，記得是十六人，不過後來也並非都有投稿。於是印了廣告，到各處張貼，分散，大約又一星期，一張小小的週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學附近——出現了。這便是『語絲』。

那名目的來源，聽說，是有幾個人，任意取一本書，將書任意翻開，用指頭點下去，那被點到的字，便是名稱。那時我不在場，不知道所用的是什麼書，是一次便得了『語絲』的名，還是點了好幾次，而曾將不像名稱的廢去。但要之，即此已可知這刊本無所謂一定的目標，統一的戰線；那十六個投稿者，意見態度也各不相同，例如顧頡剛教授，投的便是『考古』稿子，不如說，和『語絲』的喜歡涉及

現在社會者，倒是相反的。不過有些人們，大約開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園的交情的罷，所以投了兩三回稿，便取「敬而遠之」態度，自然離開。連伏園自己，據我的記憶，自始至今，也只做過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從此要大為「語絲」撰述，然而宣言之後，却連一個字也不見了。於是「語絲」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時也不意中顯了一種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但應該產生怎樣的「新」，却並無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覺得有些危急之際，也還是故意隱約其詞。陳源教授痛斥「語絲派」的時候，說我們不敢直罵軍閥，而偏和握筆的名人爲難，便由於這一點。但是，叱叭兒狗險於叱狗主人，我們其實也知道，所以隱約其詞者，不過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獻功時，必須詳加說明，比較地費些力氣，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處而已。

當開辦之際，努力確也可驚，那時做事的，伏園之外，我記得還有小峯和川島

，都是乳毛還未褪盡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對，自疊報紙，還自己拿到大眾聚集之處去兜售，這真是青年對於老人，學生對於先生的教訓，令人覺得自己只用一點思索，寫幾句文章，未免過於安逸，還須竭力學好了。

但自己賣報的成績，聽說並不佳，一紙風行的，還是在幾個學校，尤其是北京大學，尤其是第一院（文科）。理科次之。在法科，則不大有人顧問，倘若說，北京大學的法，政，經濟科出身諸君中，絕少有『語絲』的影響，恐怕是不會很錯的。至於對於晨報的影響，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頗受些打擊，曾經和伏園來說和，伏園得意之餘，忘其所以，曾以勝利者的笑容，笑着對我說道——

『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

這話對別人說是不算什麼的。但對我說，却好像澆了一碗冷水，因為我即刻覺得這『炸藥』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過使自己為別人的一個小糾葛而粉身碎骨，心裏就一面想——

『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

我於是乎『彷徨』起來。

譚正璧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說的名目，來批評我的作品的經過的極伶俐而省事的話道：『魯迅始於「吶喊」而終於「彷徨」』（大意），我以為移來敘述我和『語絲』由始以至此時的歷史，倒是很確切的。

但我的『彷徨』並不用許多時，因為那時還有一點讀過尼采的『Zarathustra』的餘波，從我這裏只要能擠出——雖然不過是擠出——文章來，就擠了去罷，從我這裏只要做出一點『炸藥』來，就拿去做了罷，於是也就決定，還是照舊投稿了——雖然對於意外的被利用，心裏也耿耿了好幾天。

『語絲』的銷路可只是增加起來，原定是撰稿者同時負擔印費的，我付了十元之後，就不見再來收取了。因為收支已足相抵，後來並且有了贏餘。於是小峯就被尊為『老板』，但這推尊並非美意，其時伏園已另就『京報副刊』編輯之職，川島

還是搗亂小孩，所以幾個撰稿者便只好癡住了多眛眼而少開口的小峯，加以榮名，勒令拿出贏餘來，每月請一回客。這『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的方法果然奏效，從此市場中的茶居或飯居或一房門外，有時便會看見掛着一塊上寫『語絲社』的木牌，倘一駐足，也許就可以聽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響的談吐。但我那時是在避開宴會的，所以毫不知道內部的情形。

我和『語絲』的淵源和關係，就不過如此，雖然投稿時多時少。但這樣地一直繼續到我走出了北京。到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實際上是誰的編輯。

到得廈門，我投稿就很少了。一者因為相離已遠，不受催促，責任便覺得輕；二者因為人地生疏，學校裏所遇到的又大抵是些念佛老嫗式口角，不值得費紙墨。倘能做『魯賓孫教書記』或『蚊蟲叮卵脬論』，那也許倒很有趣的，而我又沒有這樣的『天才』，所以只寄了一點極瑣碎的文字。這年底到了廣州，投稿也很少。第一原因是和在廈門相同的；第二，先是忙於事務，又看不清那裏的情形，後來頗有

感慨了，然而我不想在他的敵人的治下去發表。

不願意在有權者的刀下，頌揚他的威權，并奚落其敵人來取媚，可以說，也是「語絲派」一種幾乎共同的態度。所以「語絲」在北京雖然逃過了段祺瑞及其叭兒狗們的撕裂，但終究被「張大元帥」所禁止了，發行的北新書局，且同時遭了封禁，其時是一九二六年。

這一年，小峯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議「語絲」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囑我擔任做編輯。以關係而論，我是不應該推託的。於是擔任了；從這時起，我纔探問向來的編法。那很簡單，就是：凡社員的投稿件，編輯者並無取捨之權，來則必用，只有外來的投稿，由編輯者略加選擇，必要時且或略有所刪除。所以我應做的，不過後一「事」，而且社員的稿子，實際上也十之九直寄北新書局，由那裏逕送印刷局的，等到我看見時，已在印釘成書之後了。所謂「社員」，也並無明確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餘早已無多，中途出現的人，已在中途忽來忽去，因為

『語絲』是又有愛登碰壁人物的牢騷的習氣的，所以最初出陣，尙無用武之地的人，本在別一團體，而發生意見，借此反攻的人，也每和『語絲』暫時發生關係，待到功成名遂，當然也就淡漠起來，至於因環境改變，意見分歧而去的，那自然尤爲不少。因此所謂『社員』者，便不能有明確的界限。前年的方法，是只要投稿幾次，無不刊載，此後便放心發稿，和舊社員一律待遇了。但經舊的社員介紹，直接交到北新書局，刊出之前，爲編輯者的眼睛所不能見者，也間或有之。

經我擔任了編輯之後，『語絲』的時運就很不濟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當局的禁止，還招了創造社式『革命文學』家的拼命的圍攻。警告的來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爲一篇戲劇；禁止的緣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爲登載了揭發復旦大學內幕的文字，而那時浙江的黨務指導委員老爺却有復旦大學出身的人們。至於創造社派的攻擊，那是屬於歷史底的了，他們在把守『藝術之宮』，還

未『革命』的時候，就已經將『語絲派』中的幾個人看作眼中釘的，敘事夾在這裏太沈長了，且待下一回再說罷。

但『語絲』本身，却確實也在消沈下去。一是對於社會現象的批評幾乎絕無，連這一類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餘的幾個較久的撰稿者，這時又少了幾個了。前者的原因，我以爲是在無話可說，或有話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個實證。後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舉一點例罷，自從我萬不得已，選登了一篇極平和的糾正劉半農先生的『林則徐被俘』之誤的來信以後，他就不再有片紙隻字；江紹原先生紹介了一篇油印的『馮玉祥先生……』來，我不給編入之後，紹原先生也就從此沒有投稿了。並且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伏園所辦的『貢獻』上登出，上有鄭重的小序，說明着我託辭不載的事由單。

還有一種顯著的變遷是廣告的雜亂。看廣告的種類，大概是就可以推見這刊物的性質的。例如『正人君子』們所辦的『現代評論』上就會有金城銀行的長期廣告

，南洋華僑學生所辦的『秋野』上就能見『虎標良藥』的招牌。雖是打着『革命文學』旗子的小報，只要有那上面的廣告大半是花柳藥和飲食店，便知道作者和讀者，仍然和先前的專講妓女戲子的小報的人們同流，現在不過用男作家，女作家替代了娼優，或捧或罵，算是在文壇上做工夫。『絲語』初辦的時候，對於廣告的選擇是極嚴的，雖是新書，倘社員以爲不是好書，也不給登載，因爲是同人雜誌，所以撰稿者也可行使這樣的職權。聽說北新書局之辦『北新半月刊』，就因爲在『語絲』上不能自由登載廣告的緣故。但從移在上海出版以後，書籍不必說，連醫生的診例也出現了，機廠的廣告也出現了，甚至於立愈遺精藥品的廣告也出現了。固然，誰也不能保證『語絲』的讀者決不遺精，況且遺精也並非惡行，但善後辦法，却須向『申報』之類，要穩當，則要醫藥學報的廣告上去留心的。我因此得了幾封詰責的信件，又就在『語絲』本身上登了一篇抄來的反對的文章。

但以前我也做了我的本分。當懺廠出現時，曾經當面質問過小峯，回答是「發廣告的人弄錯的」，遺精藥出現時，是寫了一封信，並無答覆，但從此以後，廣告却也不見了。我想，在小峯，大約還要算是讓步的，因為這時對於一部分的作家，早由北新書局致送稿費，不只負發行之責，而「語絲」也因此並非純粹的同人雜誌了。

積了半年的經驗之後，我就決計向小峯提議，將「語絲」停刊；沒有得到贊成，我便辭去編輯的責任。小峯要我尋一個替代的人，我於是推舉了柔石。

但不知爲什麼，柔石編輯了六個月，第五卷的上半卷一完，也辭職了。

以上是我所遇見的關於「語絲」四年中的瑣事。試將前幾期和近幾期一比較，便知道其間的變化，有怎樣的不同，最分明的是幾乎不提時事，且多登中篇作品了，這是因爲容易充滿頁數而又可免於遭殃。雖然因爲毀壞舊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裏面所藏的舊物來的一種突擊之力，至今尙爲舊的和自以爲新的人們所憎惡，但這

力是屬於往昔的了。

1929, 12, 22。

（選自萌芽月刊——光華版。）

一九三〇年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一

聽說『新月月刊』團體裏的人們在說，現在銷路好起來了。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際極少的人，也在兩個年青朋友的手裏見過第三卷第六七號的合本。順便一翻，是爭『言論自由』的文字和小說居多。近尾巴處，則有梁實秋先生的一篇『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以爲『近于死譯』。而『死譯之風也斷不可長』，就引了我的三段譯文，以及在『文藝與批評』的後記裏所說：『但因爲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于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劣句折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只有束手這一條路

了，所有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讀者還肯硬着頭皮看下去而已」這些話，細心地在字旁加上圓圈，還在「硬譯」兩字旁邊加上套圈，於是「嚴正」地下了「批評」道：「我們「硬着頭皮看下去」了，但是無所得。「硬譯」和「死譯」有什麼分別呢？」

「新月社」的聲明中，雖說並無什麼組織，在論文裏，也似乎痛惡無產階級式的「組織」，「集團」這些說，但其實是有組織的，至少，關於政治的論文，這一本裏都互相「照應」；關於文藝，則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評家所作的「文學是有階級性的麼？」的餘波。在那一篇裏有一段說「……但是不幸得很，沒有一本這類的書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到困難的是文字，……簡直讀起來比天書還難。……現在還沒有一個中國人，如中國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寫一篇文章告訴我們無產文學的理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字旁也有圈，怕排印麻煩，恕不照畫了。總之，梁先生自認是一切中國人的代表，這些書既爲自己所不懂，也就是爲一切中

國人所不懂，應該在中國斷絕其生命，於是出示曰『此風斷不可長』云。

別的『天書』譯著者的意見我不能代表，從我個人來看，則事情是不會這樣簡單的。第一，梁先生自以爲『硬着頭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沒有，是否能夠，還是一個問題。以硬自居了，而實則其軟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種特色。第二，梁先生雖自來代表一切中國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國中的最優秀者，也是一個問題。這問題從『文學是有階級性的麼？』這篇文章裏，便可以解釋。Proletarey 這字不必譯音，大可譯義，是有理可說的。但這位批評家却道：『其實翻翻字典，這個字的涵義並不見得體面，據韋白斯特大字典，Proletary 的意思就是.. 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l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letary, 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 普羅列塔利亞是國家裏只會生孩子的階級：（至少在羅馬時代是如此）』其實正無須來爭這『體面』，大約略有常識者，總不至於以現在爲羅馬時代，將現在的無產者都看作羅馬人的。這正如將 Chemie 譯作『舍密學』，讀者

必不和埃及的『鍊金術』混同，對於『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決不會去考查語源，誤解爲『獨木小橋』竟會動筆一樣。連『翻翻字典』（韋白斯特大字典！）也還是『無所得』，一切中國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罷。

二

但於我最覺得有興味的，是上節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裏，有兩處都用着一個『我們』，頗有些『多數』和『集團』氣味了。自然，作者雖然單獨執筆，氣類則決不只一人，用『我們』來說話，是不錯的，也令人看起來較有力量，又不至於一人雙肩負責。然而，當『思想不能統一』時，『言論應該自由』時，正如梁先生的批評資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種『弊病』。就是，既有『我們』便有我們以外的『他們』，於是新月社的『我們』雖以爲我的『硬譯之風斷不可長』了，却另有讀了並不『無所得』的讀者在，而我的『硬譯』，就還在『他們』之間生存，和『死譯』還

有一些區別。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們』之一，因為我的譯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條件，是全都一樣的。

那一篇『論硬譯』的開頭論誤譯勝於死譯說：『一部書斷斷不會完全曲譯……部分的曲譯即使是錯誤，究竟也還給你一錯誤，這個錯誤也許真是害人無窮的，而你讀的時候究竟還落個爽快』。末兩句大可以加上夾圈，但我却從來不幹這樣的勾當。我的譯作，本不在博讀者的『爽快』，却往往給以不舒服，甚至於使人氣悶，憎惡，憤恨。讀了會『落個爽快』的東西，自有新月社的人們的譯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詩，沈從文凌叔華先生的小說，陳西滢（即陳源）先生的閑話，梁實秋先生的批評，潘光旦先生的優生學，還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義。

所以，梁先生後文說：『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着手指來尋找句法的線索位置』這些話，在我也就覺得是廢話，雖說猶如不說了。是的，由我說來

，要看『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樣，要伸着手指來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的。看地圖雖然沒有看『楊妃出浴圖』或『歲寒三友圖』那麼『爽快』，甚至至於還預伸着手指（其實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罷了，看惜地圖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圖並不是死圖；所以『硬譯』即使有同一之勢，照例子也就和『死譯』有了些『什麼區別』。識得ABCD者自以為新學家，仍舊和化學方程式無關，會打算盤的自以為數學家，看起筆算的演草來還是無所得。現在的世間，原不是一為學者，便和一切事都會有緣的。

然而梁先生有實例在，舉了我三段的譯文，雖然明知道『也許因為沒有上下文
的緣故，意思不能十分明瞭』。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麼？』這篇文章中，也用了類似手段舉出兩首譯詩來，總評道：『也許偉大的無產文學還沒有出現，那麼我願等着，等着，等着』。這些方法，誠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這一本『新月月刊』裏的創作——是創作呀！——『搬家』第八頁上，舉出一段文字來

『小雞有耳朵沒有？』

『我沒看見這小雞長耳朵的。』

『它怎樣聽見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訴她的耳朵是管聽東西，眼是管看東西的。

『這個蛋是白雞黑雞？』枝兒見四婆沒答她，站起來摸着蛋子又問。

『現在看不出來，等孵出小雞纔知道。』

『婉兒姊說小雞會變大雞，這些小雞也會變大雞麼？』

『好好的餵它須會長大了，像這個雞買來時還沒有這樣大吧？』

也夠了，『文字』是懂得的，也無須伸出手指來尋線索，但我不『等着』了，

以爲就這一段看，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創作是很少區別的。

臨末，梁先生還有一個詰問：『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翻譯之難卽在這個地方。假如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那麼翻譯還成爲一件工作嗎？』：我們不妨把句法變換一下，以使講者能懂爲第一要義，因爲硬着頭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並且『硬譯』也不見得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假如『硬譯』而還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那真是一件奇蹟；還能說中國文是有一『缺點』嗎？』我倒不見得如此之愚，要尋求和中國文相同的外國文，或者希望『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我但以爲文法繁複的國語，較易於翻譯外國文，語系相近的，也較易於翻譯，而且也是一種工作。荷蘭翻德國，俄國翻波蘭，能說這和並不工作沒有什麼區別麼？日本語和歐美很『不同』，但他們逐漸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來，更宜於翻譯而不失原來的精悍的語句，開初自然是須『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很給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經找尋和習慣，現在已經同化，成爲

已有了。中國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還要不完備，然而也會有變遷，例如『史漢』不同於『書經』，現在的白話文又不同於『史漢』；有添造，例如唐譯佛經，元譯上諭，當時很有些『文法句法詞法』是生造的，一經習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現在又來了『外國文』，許多句子，即也須新造，——說得壞點，就是硬造。據我的經驗，這樣譯來，較之化爲幾句，更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但因爲有待於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國文是有缺點的。有什麼『奇蹟』，幹什麼『嗎』呢？但有待於『伸出手指』，『硬着頭皮』，於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過我是本不想將『爽快』或『愉快』來獻給那些諸公的，只要還有若干的讀者能夠有所得，梁實秋先生『們』的苦樂以及無所得，實在『於我如浮雲』。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於無產文學理論，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說：『魯迅先生前些年翻譯的文學，例如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還不是令人看不懂的東西，但是最近翻譯的書似乎改變風格了。『只要有些常識的人就知道：』

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種外國文，因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風格』和『句法的線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簡，名詞可常可專，決不會一種外國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譯『苦悶的象徵』，也和現在一樣，是按板規逐句，甚而至於逐字譯的，然而梁實秋先生居然以為還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緣故，也因為梁實秋先生是中國的新的批評家了的緣故，也因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較地看慣了的緣故。若在三家村裏，專讀『古文觀止』的學者們，有起來又何嘗不比『天書』還難呢。

三

但是，這回的『比天書還難』的無產文學理論的譯本們，却給了梁先生不小的影響。看不懂了，會有影響，雖然好像滑稽，然而是真的，這位批評家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裏說：『我現在批評所謂無產文學理論，也只能根據我所能了解

的一點材料而已。」這就是說，因此而對這理論的知識，極不完全了。

但對於這罪過，我們（含一切『天書』譯者在內，故曰『們』）也只能負一部分的責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塗或懶惰來負的。『什麼盧那卡爾斯基，蒲力汗諾夫』的書我不知道，若夫『婆格達諾夫之類』的三篇論文和託羅茲基的半部『快文學與革命』，則確有英文譯本的了。英國沒有『魯迅先生』，譯文定該非常容易。梁先生對於偉大的無產文學的產生，曾經顯示其『等着，等着，等着』的耐心和勇氣，這回對於理論，何不也等一下子，尋來看了再說呢。不知其有而不求曰胡塗，知其有而不求曰懶惰，如果單是默坐，這樣也許是『爽快』的，然而開起來，却很容易咽進冷氣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的高文，結論是並無階級性。要抹殺階級性，我以為最乾淨的是吳稚暉先生的『什麼馬克斯牛克斯』以及什麼先生的『世界上並沒有階級這東西』的學說。那麼，就萬喙息響，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却中

了一些『什麼馬克斯』毒了，先承認了現在許多地方是資產制度，在這制度之下則有無產者。不過這『無產者本來並沒有階級的自覺。是幾個過於富同情心而又態度過激的領袖把這個階級觀念傳授了給他們』，要促起他們的聯和，激發他們爭鬪的慾念。不錯，但我以為傳授者應該並非由於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況且『本無其物』的東西，是無從自覺，無從激發的，會自覺，能激發，足見那是原有的東西。原有的東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萊阿說地體運動，達爾文說生物進化，當初何嘗不或者幾被宗教家燒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擊呢，然而現在人們對於兩說，並不為奇者，就因為地體終於在運動，生物確也在進化的緣故。承認其有而要文飾為無，非有絕技是不行的。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鬥爭的辦法，以為如盧梭所說：『資產是文明的基礎』，『所以攻擊資產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個無產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這纔是正當的生活鬥爭』

的手段。」我想，盧梭去今雖已百五十年，但當不至於以爲過去未來的文明，都以資產爲基礎。（但倘說以經濟關係爲基礎，那自然是對的。）希臘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時俱非在資產社會，他大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錯誤。至於無產者應該『辛辛苦苦』爬上有產階級去的『正當』的方法，則是中國有錢的老太爺高興的時候，教導窮工人的古訓，在實際上，現今正在『辛辛苦苦誠誠實實』想爬上一級去的『無產者』也還多。然而這是還沒有人『把這個階級觀念傳授了給他們的時候。一經傳授，他們可就不肯一個一個的來爬了，誠如梁先生所說，『他們是一個階級了，他們要有組織了，他們是一個集團了，於是他們便不循常軌的一躍而奪取政權財權，一躍而爲統治階級。』但可還有想『辛辛苦苦誠誠實實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的『無產者』呢？自然還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尙未發財的有產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將爲無產者所嘔吐了，將只好和老太爺去互相讚賞而已了。

那麼，此後如何呢？梁先生以爲是不足慮的。因爲「這種革命的現象不能是永久的，經過自然進化之後，優勝劣敗的定律又要證明了，還是聰明才力過人的人佔優越的地位，無產者仍是無產者」。但無產階級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勢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勢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謂『無產階級文化』，……這裏面包括文藝學術。」

自此以後，這纔入了文藝批評的本題。

四

梁先生首先以爲無產者文學理論的錯誤，是「在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面」，因爲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有不同的地方，但還有相同的地方，「他們的人性（這兩字原本有套圈）並沒有兩樣」，例如都有喜怒哀樂，都有戀愛（但所「說的戀愛的本身，不是戀愛的方式」），「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

這些話是矛盾而空虛的。既然文明以資產爲基礎，窮人以竭力爬上去爲『有出息』，那麼，爬上是人生的要諦，富翁乃人類的至尊，文學也只要表現資產階級就夠了，又何必如此『過於富同情心』，一併包括『劣敗』的無產者？況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樣表現的呢？譬如原質或雜質的化學底性質，有化合力，物理學底性質有硬度，要顯示這力和度數，是須用兩種物質來表現的，倘說要不用物質而顯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單單『本身』，無此妙法；但一用物質，這現象卽又因物質而不同。文學不藉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裏，卽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常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寧呀！』固然並不就是無產文學，然而『一切東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來了，人喜了呀！』也不能表現『人性』

的『本身』的文學。倘以表現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學爲至高，則表現最普遍的動物性——營養，呼吸，運動，生殖——的文學，或者除去『運動』，表現生物性的文學，必當更在其上。倘說，因爲我們是人，所以以表現人性爲限，那麼，無產者就因爲是無產階級，所以要做無產文學。

其次，梁先生說作者的階級，和作品無關。託爾斯泰出身貴族，而同情於貧民，然而並不主張階級鬥爭；馬克斯並非無產階級中的人物；終身窮苦的約翰孫博士，志行吐屬，過於貴族。所以估量文學，當看作品本身，不能連累到作者的階級和身分。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證明文學的無階級性的。託爾斯泰正因爲出身貴族，舊性蕩滌不盡，所以只同情於貧民而不主張階級鬥爭。馬克斯原先誠非無產階級中的人物，但也並無文學作品，我們不能懸擬他如果動筆，所表現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戀愛本身。至於約翰孫博士終身窮苦，而志行吐屬，過於王侯者，我却實在不明白那緣故，因爲我不知道英國文學和他的傳記。也許，他原想『辛辛苦苦誠誠實實

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然後再爬上貴族階級去，不料終於『劣敗』，連相當的資產也積不起來，所以只落得擺空架子，『爽快』了罷。

其次，梁先生說『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大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是和文學無緣』，但鑑賞力之有無却和階級無干，因為『鑑賞文學也是天生的一種福氣』，就是，雖在無產階級裏，也會有這『天生的一種福氣』的人。由我推論起來，則只要有這一種『福氣』的人，雖窮得不能受教育，至於一字不識，也可以賞鑑『新月月刊』，來作『人性』和文藝『本身』，原無階級性的證據。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這一種福氣的無產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種東西（文藝？）來給他們看，『例如什麼通俗的戲劇，電影，通俗小說，之類』，因為『一般勞工勞農需要娛樂，也許需要少量的藝術的娛樂』的緣故。這樣看來，好像文學確因階級而不同了，但這是因鑑賞力之高低定的，這種力量的修養和經濟無關，乃是上帝之所賜——『福氣』。所以文學家要自由創造，既不該為皇室貴族所雇用，也不該受無產階級所

威脅，去做謳功頌德的文章。這是不錯的，但在我們所見的無產文學理論中，也並未見過有誰說或一階級的文學家，不該受皇室貴族的雇用，却該受無產階級的威脅，去做謳功頌德的文章，不過說，文學有階級性，在階級社會中，文學家雖自以為『自由』，自以為超了階級，而無意識底地，也終受本階級的階級意識所支配，那些創作，並非別階級的文化罷了。例如梁先生的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學上的階級性，張揚真理的。但以資產為文明的祖宗，指窮人為劣敗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資產家的鬥爭的『武器』，——，『文章』了。無產文學理論家以主張『全人類』『超階級』的文學理論為幫助有產階級的東西，這裏就給了一個極分明的例證。至於成仿吾先生似的『他們一定勝利的，所以我們去指導安慰他們去』，說出『去了』之後，便來『打發』自己們以外的『他們』那樣的無產文學家，那不消說，是和梁先生一樣地對於無產文學的理論，未免有『以意為之』的錯誤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無產文學理論家以文藝為鬥爭的武器，就是當作宣

傳品。他『不反對任何人利用文學來達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認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我以為這是自擾之談。據我看過的那些理論，都不過說凡文藝必有所宣傳，並沒有誰主張只要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誠然，前年以來，中國確有許多詩歌小說，填進口號和標語去，自以為就是無產文學。但那是因為內容和形式，都沒有無產氣，雖用口號和標語，便無從表示其『新興』的緣故，實際上並非無產文學。今年，有名的『無產文學底批評家』錢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還在引盧那卡爾斯基的話，以為他推重大眾能解的文學，足見用口號標語之未可厚非，來給那些『革命文學』辯護。但我覺得那也和梁實秋先生一樣，是有意的或無意的曲解。盧那卡爾斯基所謂大眾能解的東西，當是指託爾斯泰做了分給農民的小本子那樣的文體，工農一看便會了然的語法，歌調，談諧。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 Berini）曾因詩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詩中並不用標語和口號，便可明白了。

最後，梁先生要看貨色。這不錯的，是最切實的辦法；但抄兩首譯詩算是在示

衆，是不對的。『新月』上就會有『論翻譯之難』，何況所譯的文是詩。就我所見的而論，盧那卡爾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訶德』，法兌耶夫的『潰滅』，格拉特珂夫的『水門汀』，在中國這十一年中，就並無可以和這些相比的作品。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夢資產文明的餘蔭，而且忠意在擁護牠的作家而言。於號稱無產作家的作品中，我也舉不出相當的成績。但錢杏邨先生也曾辯護，說新興階級，于文學的本領當然幼稚而單純，向他們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爾喬亞』的惡意。這話爲農工而說，是極不錯的。這樣的無理要求，却如使他們凍餓了好久，倒怪他們爲什麼沒有富翁那麼肥胖一樣。但中國的作者，現在却實在並無剛剛放下鋤斧柄子的人，大多數都是進過學校的智識者，有些還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意識之後，就連先前的文學本領也隨着消失了麼？不會的。俄國的老作家亞歷舍·託爾斯泰和威壘賽耶夫，普理希文，至今都還有好作品。中國的有口號而無隨同的實證者，我想，那病根並不在『以文藝爲階級鬥爭的武器』，而在『借階

級鬥爭爲文藝的武器」，在「無產者文學」這旗幟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試看去年的新書廣告，幾乎沒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學，批評家又但將辯護當作「清算」，就是，請文學坐在「階級鬥爭」的掩護之下，于是文學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學和鬥爭兩方面都少關係了。

但中國目前的一時現象，當然毫不足作無產文學之新興的反證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臨末讓步說：『假如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傳文學喚做無產文學，那總算是一種新興文學，總算是文學國土裏的新收穫，用不着高呼打倒資產的文學來爭奪文學的領域，因爲文學的領域太大了，新的東西總有它的位置的。』但這好像「中日親善，同存共榮」之說，從羽毛未豐的無產者看來，是一種欺騙。願意這樣的『無產文學者』，現在恐怕實在也有的罷。不過這是梁先生所謂『有出息』的要爬上資產階級去的『無產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窮秀才未中狀元時候的牢騷，從開手到爬上以及以後，都決不是無產文學。無產者文學是爲了以自己們之力

，來解放本階級并及一切階級而鬥爭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位置。就拿文藝批評界來比方罷，假如在『人性』的『藝術之宮』（這須從成仿吾先生處租來暫用）裏，向南面擺兩把虎皮交椅，請梁實秋錢杏邨兩位先生並排坐下，一個右執『新月』一個左執『太陽』那情形可真是『勞資』媿美的了。

五

到這裏，又可以談到我的『硬譯』去了。

推想起來，這是很應該跟着發生的問題：無產文學既然重在宣傳，宣傳必須多數能懂，那麼，你這些『硬譯』而難懂的理論『天書』，究竟爲什麼而譯的呢？不是等子不譯麼？

我的回答，是：爲了我自己，和幾個以無產文學批評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圖『爽快』，不怕艱難，多少要明白一些這理論的讀者。

從前年以來，對於我個人的攻擊是多極了，每一種刊物上，大抵總要看見『魯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則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學家。但我看了幾篇，竟逐漸覺得廢話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彈所擊之處，也不是致命傷。例如我所屬的階級罷，就至今還未判定，忽說小資產階級，忽說『布爾喬亞』，有時還陞為『封建餘孽』，而且又等於猩猩（見『創造月刊』上的『東京通信』）；有一回則罵到牙齒的顏色。在這樣的社會裏，有封建餘孽出風頭，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餘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觀』上都沒有說明，也找不出牙齒色黃，即有害於無產階級革命的論據。我于是想，可供參考的這樣的理論，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塗。對於敵人，解剖，咬嚼，現在是在所不免的，不過有一本解剖學，有一本烹飪法，依法辦理，則構造味道，總還可以較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話中的 Prometheus 比革命者，以為竊火給人，雖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堅忍正相同。但我從別國裏竊火來，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庶幾在咬嚼

者那一面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不枉費了身軀：出發點全是個人主義，并且還夾雜着小市民性的奢華，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來，反而刺進解剖者的心臟裏去的『報復』。梁先生說：『他們要報復！』其實豈只『他們』。這樣的人在『封建餘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願意于社會上有些用處，看客所見的結果仍是火和光。這樣，首先開手的就是『文藝政策』，因為其中含有各派的議論。

鄭伯奇先生現在是開書鋪，印 Hauptmann 和 Gregory 夫人的劇本了，那時他還是革命文學家，便在所編的『文藝生活』上，笑我的翻譯這書，是不甘沒落，而可惜被別人着了先鞭。翻一本書便會浮起，做革命文學家真太容易了，我並不這樣想。有一種小報，則說我的譯『藝術論』是『投降』。是的，投降的事，爲世上所常有。但其時成仿吾元帥早已爬出日本的溫泉，住進巴黎的旅館了，在這裡又向誰去輸誠呢？今年，謚法又兩樣了，在『拓荒者』和『現代小說』上，都說是『方向轉換』。我看見日本的有些雜誌中，曾將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覺派片岡鐵兵上，算

是一個好名詞。其實，這些紛紜之談，也還是只看名目，連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譯一本關於無產文學的書，是不足以證明方向的，倘有曲譯，倒反足以爲害。我的譯書，就也要獻給這些速斷的無產文學批評家。因爲他們是有不貪『爽快』，耐苦來研究這些理的論義務的。

但我自信並無故意的曲譯，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疼，却決不肯有所增減，這也是始終『硬譯』的一個原因。自然，世間總會有較好的翻譯者，能夠譯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時我的譯本當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來填這從『無有』到『較好』的空間罷了，

然而世間紙張還多，每一文社的人數却少，志大力薄，寫不完所有的紙張，於是一社中的職司克敵助友，掃蕩異類的批評家，看見別人來塗寫紙張了，便喟然興歎，不勝其搖頭頓足之苦。上海的申報上，至於稱社會科學的翻譯者爲『阿狗阿貓

「其憤憤如此。在『中國新興文學的地位，早爲讀者所共知』的蔣光慈先生，曾往日本東京養病，看見磯原惟人，談倒日本有許多翻譯太壞，簡直比原文還難讀……他就笑了起來，說：『……那中國的翻譯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來中國有許多書籍都是譯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將歐洲人那一國的作品帶點錯誤和刪改，從日文譯到中國去，試問這作品豈不是要變了一半相貌麼？……』（見『拓荒者』）也就是深不滿於翻譯，尤其是重譯的表示。不過梁先生舉出書名和壞處，蔣先生却只嫣然一笑，掃蕩無餘，真是普遍得遠了。藏惟人是從俄文直接譯過許多文藝理論和小說的，於我個人就極有裨益。我希望中國也有一兩個這樣的誠實的俄文翻譯者，陸續譯出好書來，不僅自罵一聲『混蛋』就算盡了革命文學家的責任。

然而現在呢，這些東西，梁實秋先生是不譯的，稱人爲『阿狗阿貓』的偉人也不譯，學過俄文的蔣先生原是最爲適宜的了，可惜養病之後，只出了一本『一週間』，而日本則早已有了兩種的譯本。中國曾經大談達爾文，大談尼采，到歐戰時候

，則大罵了他們一通，但達爾文的著作的譯本，至今只有一種，尼采的則只有半部，學英德文的學者及文豪都不暇顧及，或不屑顧及，拉倒了。所以暫時之間，恐怕還只好任人笑罵，仍從日文來重譯，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譯本來直譯罷。我還想這樣做，並且希望更多有這樣做的人，來填一填澈底的高談中的空虛，因為我們不能像蔣先生那樣的『好笑起來』，也不該如梁先生的『等着，等着』了。

六

我在開頭曾有『以硬自居了，而實則軟如綿，正是「新月社」的一種特色』這些話，到這裏還應該簡短地補充幾句，就作爲本篇的收場。

『新月』一出世，就主張『嚴正態度』，但於罵人者則罵之，譏人者則譏之。這並不錯，正是『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雖然也是一種『報復』，而非爲了自己。到二卷六七號合本的廣告上，還說『我們都保持「容忍」的態度（除了

「不容忍」的態度是我們所不能容忍以外，我們都喜歡穩健的合乎理性的學說。『上兩句也不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和開初仍然一貫。然而從這條大路走下去，一定要遇到『以暴力抗暴力』，這和新月社諸君所喜歡的『穩健』也不能相容了。

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論』遭了壓迫，照老辦法，是必須對於壓迫者，也加以壓迫的，但『新月』上所顯現的反應，却是一篇『告壓迫言論自由者』，先引對方的黨義，次引外國的法律，終引東西史例，以見凡壓迫自由者，往往臻於滅亡：是一番替對方設想的警告。

所以，新月社的『嚴正態度』，『以眼還眼』法，歸根結蒂，是專施之力量相類，或力量較小的人的，倘給有力者打腫了眼，就要破例，只舉手掩住自己的臉，叫一聲『小心你自己的眼睛！』

習慣與改革

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對於極小的一點改革，也無不加以阻撓，表面上好像恐怕於自己不便，其實是恐怕於自己不利，但所設的口實，却往往見得極其公正而且堂皇。

今年的禁用陰歷，原也是瑣碎的，無關大體的事，但商家當是叫苦連天了。不特此也，連上海的無業游民，公司僱員，竟也常常慨然長歎，或是說這很不便於農家的耕種，或者說這很不便於海船的候潮。他們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鄉下的農夫，海上的舟子來。這真像煞有些博愛。

一到陰歷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處畢畢剝剝。我問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過舊歷年，明年一準過新歷年麼？』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他並不信明年非過陽歷年不可。但日歷上，却誠然刪掉了陰歷，只存節氣。

然而一面在報章上，則出現了『一百二十年陰陽合歷』的廣告。好，他們連曾孫玄孫時代的陰歷，也已經給準備妥當了，一百二十年！

梁實秋先生們雖然很討厭多數，但多數的力量偉大，要緊的，有志於改革者倘不深知民衆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干，僅止於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歎賞，得些自己滿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們拉回舊道上去。

真實的革命者，自有獨到的見解，例如烏略諾夫先生，他是將『風俗』和『習慣』，都包括在『文化』之內的，並且以爲改革這些，很爲困難。我想，但倘不將這些改革，則這革命卽等於無成，如沙上建塔，傾刻倒塌。中國最初的排滿革命，所以易得響應者，因爲口號是『光復舊物』，就是『復古』，易於取得保守的人民的同意的緣故。但到後來，竟沒有歷史上定例的開國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條辮子，就很爲大家所不滿了。

以後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敗，改革一兩，反動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歷上不準註陰歷，却來了陰陽合歷一百二十年。

這種合歷，歡迎的人們一定是很多的，因為這是風俗和習慣的擁護，所以也有風俗和習慣的後援。別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衆的大層中，於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究，解剖，分別好壞，立存廢的標準，而於存於廢，都慎選施行的方法，則無論怎樣的改革，都將爲習慣的岩石所壓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時。

現在已不是在書齋中，捧書本高談宗教，法律，文藝，美術……等等的時候了，即使要談論這些，也必須先知道習慣和風俗，而且有正視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爲倘不看清，就無從改革。僅大叫未來的光明，其實是欺騙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聽衆的。

（選自萌芽月刊——光華版。）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倘說，凡大隊的革命軍，必須一切戰士的意識，都十分正確，分明，這纔是真的革命軍，否則不值一哂。這言論，初看固然是很正當，徹底似的，然而這是不能的難題，是空洞的高談，是毒害革命的甜藥。

譬如在帝國主義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訓練大眾個個有了『人類之愛』，然後笑嘻嘻拱手變爲『大同世界』一樣，在革命者們所反抗的勢力之下，也決不容用言論或行動，使大多數人統得到正確的意識。所以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終極目的是極爲歧異的。或者爲社會，或者爲小集團，或者爲一個愛人，或者爲自己，或者簡直爲了自殺。然而革命軍仍然能夠前行。因爲在進軍的途中，對於敵人，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彈，和集團主義者所發的子彈是一樣地能夠致其死命；任何戰士死傷之際，便要減少些軍中的戰鬥力，兩者也相等的。但自然，因爲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成爲純粹

，精銳的隊伍了。

我先前爲葉永臻君的『小小十年』作序以爲已經爲社會盡了些力量，便是這意思。書中的主角，究竟上過前線（雖然連放鎗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單是抱膝哀歌，握筆憤歎的文豪們來，實在也切實得遠了。倘若要現在的戰士都是意識正確，而且堅於鋼鐵之戰士，不但是烏托邦的空想，也是出於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後來在『申報』上，却看見了更嚴厲，更徹底的批評，因爲書中的主角的從軍，動機是爲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滿。『申報』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動革命的報紙，初看彷彿是很不相稱似的，我在這裏要指出貌似徹底的革命者，而其實是極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個人主義的論客來，使那批評的靈魂和報紙的軀殼正相適合。

其一是頹廢者，因爲自己的沒有一定的理想和無力，便流落而求剎那的享樂，一定的享樂，又使他發生厭倦，則時時尋求新刺激，而這刺激又須厲害，這纔感到

暢快。革命便也是那頹廢者的新的刺戟之一，正如饕餮者壓足了肥甘，味厭了，胃弱了，便要喫胡椒和辣椒之類，使額上出一點小汗，纔能送下半碗飯去一般。他於革命文藝，就要澈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藝，一有時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皺眉，以爲不值一晒。和事實離開是不妨的，只要一個爽快。法國的波特萊爾，誰都知道是頹廢的詩人，然而他歡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頹廢生活的時候，他纔憎惡革命了。所以革命前夜的紙張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極徹底極激烈的革命家，臨革命時，便能夠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覺的假面。這種史例，是也應該獻給一碰小銅子，有一小地位（或小款子），便東竄東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樣『革命文學家』的。

其二，我還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無定見，因而覺得世上沒有一件對，自己沒有一件不對，歸根結蒂，還是現狀最好的人們。他現爲批評家而說話的時候，就隨便撈到一種東西以駁詰相反的東西。要駁互助說時用爭存說，駁爭存說時用

互助說；反對和平論時用階級鬥爭說，反對鬥爭時就主張人類之愛。論敵是唯心論者呢，他的立場是唯物論，待到和唯物論者相辯難，他却又化爲唯心論者了。要之，是用英尺來量俄里，又用法尺來量密達，而發見無一相合的人。因爲別的一切，無一相合，於是永遠覺得自己是『允執厥中』，永遠得到自己滿足。從這些人們的批評的指示，則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現在的人，的事，那里會有十分完全，並無缺陷的呢，爲萬全計，就只好毫不動彈。然而這毫不動彈，却也就是一個大錯。總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煩難了，至於做革命家，那當然更不必說。

『申報』的批評家對於『小小十年』雖於要求徹底的革命的主角，但於社會科學的翻譯，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靈魂是後一流，而略帶一些頹廢者的對於人生的無聊，想喫些辣椒來開開胃的氣味。

（選自萌芽月刊——光華版。）

一九三二年

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

——爲美國「新羣衆」作——

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惟一的文藝運動。因爲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國已經毫無其他文藝。屬於統治階級的所謂「文藝家」，早已腐爛到連所謂「爲藝術的藝術」以至「頹廢」的作品也不能生產，現生來抵制左翼文藝的，只爲誣蔑，壓迫，囚禁和殺戮；來和左翼作家對立的，也只有流氓，偵探，走狗，劊子手了。

這一點，已經由兩年以來的事實，證明得十分明白。

前年，最初介紹蒲力汗諾夫 (Plekhanov) 和盧那卡爾斯基 (Lunacharsky) 的

文藝理論進到中國時候，先使一位白璧德先生 (Mr Prof Irving Babbitt) 的門徒，感覺銳敏的「學者」憤慨，他以為文藝原不是無產階級的東西，無產者倘要創作或鑒賞文藝，先應該辛苦地積錢，爬上資產階級去，而不應該大家渾身襤褸，到這花園中來吵嚷。並且造出謠言，說在中國主張無產階級文學的人，是得了蘇俄的盧布。這方法也並非毫無效力，許多上海的新聞記者就時時捏造新聞，有時還登出盧布的數目。但明白的讀者們並不相信它，因為比起這種紙上的新聞來，他們却更切實地在事實上看見只有從帝國主義國家運到殺戮無產者的鎗礮。

統治階級的官僚，感覺比學者慢一點，但去年也就日加壓迫了。禁期刊，禁書籍，不但內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連書面用紅字的，作者是俄國的，綏拉菲摩維支 (A. Serafimovitch)，伊凡諾夫 (V. Ivanov) 和奧格涅夫 (H. Ognev) 不必說了，連契訶夫 (A. chekhov) 和安特來夫 (L. Andreev) 的有些小說，也都在禁止之列。於是使書店只好出算學教科書和童話，如 Mr Cat 和 Miss Rose 談天，稱

讚春天如何可愛之類——因爲至爾妙倫 (H. Zur mühlen) 所作的童話的譯本也已被禁止，所以只好竭力稱讚春天。但現在又有一位將軍發怒，說動物居然也能說話而且稱爲「人」，有失人類的尊嚴了。

單是禁止，還不是根本的辦法。於是今年有五個左翼作家失了踪，經家族去探聽，知道是在警備司令部，然而不能相見，半月以後，再去問時，却道已經「解放」——這是「死刑」的嘲弄的名稱——了，而上海的一切中文和西文的報章上，絕無紀載。接着是封閉曾出新書或代售新書的書店，多的時候，一天五家，——但現在又陸續開張了，我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惟看書店的廣告，知道是在竭力仰些英漢對照，如斯蒂文生 (Robert Stevenson)，槐爾特 (Oscar Wilde) 等人的文章。

然而統治階級對於文藝，也並非沒積極的建設。一方面，他們將幾個書店的原先的老闆和店員趕開，暗暗換上肯聽喉使的自己的一夥。但這立刻失敗了。因爲裏面是走狗，這書店便像一座威嚴的衙門，而中國的衙門，是人民所最害怕最討厭的東

西，自然就沒有人去。喜歡去跑跑的還是幾隻閑逛的走狗。這樣子，又怎能使門市熱鬧呢？但是，還有一方面，是做些文章，印行雜誌，以代被禁止的左翼的刊物，至今爲止，已將十種。然而這也失敗了。最有妨礙的是這些『文藝』的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員和一位警備司令部的偵緝隊長，他們的善于『解放』的名譽，都比『創作』要大得多。他們倘做一部『殺戮法』或『偵探術』，大約倒還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畫畫，吟詩。這實在譬如美國的亨利·福特 (Henry Ford) 先生不談汽車，却來對大家唱歌一樣，只令人覺得非常詫異。

官僚的書店沒有人來，刊物沒有人看，救濟的方法，是去強迫早經有名，而並不明左傾的作者來做文章，幫助他們的刊物的流布。那結果，是只有一兩個胡塗的中計，多數却至今未曾動筆，有一個竟嚇得躲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了。

現在他們裏面的最寶貴的文藝家，是當左翼文藝運動開始，未受迫害，爲革命的青年所擁護的時候，自稱左翼，而現在爬到他們的刀下，轉頭來害左翼作家的

幾個人。爲什麼被他們所寶貴的呢？因爲他曾經是左翼，所以他們的有幾種刊物，那面子還有一部分是通紅的，但將其中的農工的圖，換上了畢亞茲萊（*Aubrey Beardsley*）的個個好像病人的圖畫了。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那些讀者們，凡是一向愛讀舊式的強盜小說的和新式的肉慾小說的，倒並不覺得不便。然而較進步的青年，就覺得無書可讀，他們不得已，只得看看空話很多，內容極少——這樣的纔不至于被禁止——的書，姑且安慰飢渴，因爲他們知道，與其去買官辦的催吐的毒劑，還不如喝喝空杯，至少，是不至于受害。但一大部分革命的青年，却無論如何，仍在非常熱烈地要求，擁護，發展左翼文藝。

所以，除官辦及其走狗辦的刊物之外，別的書店的期刊，還是不能不設種種方法，加入幾篇比較的急進的作品去，他們也知道專賣空杯，這生意決難久長。左翼文藝有革命的讀者大衆支持，『將來』正屬於這一面。

這樣子，左翼文藝仍在滋長。但自然是好像壓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樣，在曲折地滋長。

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還沒有農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為農工歷來只被壓迫，搾取，沒有略受教育的機會；二者，因為中國的象形——現在是早已變得連形也不象了——的方塊字，使農工雖是讀書十年，也還不能任意寫出自己的意見。這事情很使拿刀的『文藝家』喜歡。他們以為受教育能到會寫文章，至少一定是小資產階級，小資產者應該抱住自己的小資產，現在却反而傾向無產者，那一定是『虛偽』。惟有反對無產階級文藝的小資產階級的作家倒是出于『真』心的。『真』比『偽』好，所以他們的對於左翼作家的誣讟，壓迫，囚禁和殺戮。便是更好的文藝。

但是，這用刀的『更好的文藝』。却在事實上，證明了左翼作家們正和一樣在被壓迫被殺戮的無產者負着同一的運命，惟有左翼文藝現在在和無產者一同受難

(Passion) ，將來當然也將和無產者一同起來。單單的殺人究竟不是文藝，他們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無所有了。

(選自二心集——合衆版。)

『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一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從帝國主義的眼睛看來，惟有他們是最要緊的奴才，有用的鷹犬，能盡殖民地人民非盡不可的任務：一面靠着帝國主義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羣之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寵兒，——不，寵犬，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治者之上的。

上海當然也不會不在這例子裏。巡警不進幫，小販雖自有小資本，但倘不另尋一個統氓來做債主，付以重利，就很難立足。到去年，在文藝界上，竟也出現了『拜老頭子』的『文學家』。

但這不過是一個最露骨的事實。其實是，即使並非幫友，他們所謂『文藝家』的許多人，是一向在盡『寵犬』的職分的，雖然所標的口號，種種不同，藝術至上主義呀，國粹主義呀，民族主義呀，爲人類的藝術呀，但這僅如巡警手裏拿着前膛鎗或後膛鎗，來福鎗，毛瑟鎗的不同，那終極的目的只一個：就是打死反帝國主義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寵犬派文學之中，鑼鼓敲得最起勁的，是所謂『民族主義文學』。但比起偵探，巡捕，劊子手們的顯著的勤勞來，却還有很多的遜色。這緣故，就因爲他們還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沒有流氓的剽悍，不過是飄飄蕩蕩的流氓。然而這又正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寵』的。

翻一本他們的刊物來看罷，先前標榜過各種主義的各種人，居然湊合在一起了。這是『民族主義』的巨人的手，將他們抓過來的麼？並不，這些原是上海灘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屍，本來散見于各處的，但經風浪一吹，就漂集一處，形成一個堆積，又因為各個本身的腐爛，就發出較濃厚的惡臭來了。

這『叫』和『惡臭』有能夠較為遠聞的特色，于帝國主義是有益的，這叫做『爲王前驅』，所以流屍文學仍將與流氓政治同在。

二

但上文所說的風浪是什麼呢？這是因無產階級的勃興而捲起的小風浪。先前的有些所謂文藝家，本未嘗沒有半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覺得自身的潰敗，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種種美名來掩飾，曰高逸，曰放達（用新式話來說就是『頹廢』），畫的是裸女，靜物，死，寫的是花月，聖地，失眠，酒，女人。一到舊社會的崩潰愈加分

明，階級的鬥爭愈加鋒利的時候，他們也就看見了自己的死敵，將創造新的文化，一掃舊來的污穢的無產階級，並且覺到了自己就是這污穢，將與在上的統治者同其運命，於是就必然漂集於爲帝國主義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順民所豎起的『民族主義文學』的旗幟之下，來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後的掙扎了。

所以，雖然是雜碎的流屍，那目標却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樣，用一切手段，來壓迫無產階級，以苟延殘喘。不過究竟是雜碎，而且多帶着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從發出宣言以來，看不見一點鮮明的作品，宣言是一小羣雜碎胡亂湊成的雜碎，不足爲據的。

但在『前鋒月刊』第五號上，却給了我們一篇明白的作品，據編輯者說，這且『參加討伐閻馮軍事的實際描寫』。描寫軍事的小說並不足奇，奇特的是這位『青年軍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戰場上的心緒，這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的自畫像，極有鄭重引用的價值的——

「每天晚上站着那閃爍的羣星之下，手裏執着馬鎗，耳中聽着蟲鳴，四週飛動着無數的蚊子，那樣都使人想到法國「客軍」在非洲沙漠裏與阿剌伯人爭鬥流血的生活，」（黃震遐『隴海線上』）

原來中國軍閥的混戰，從『青年軍人』，從『民族主義文學者』看來，是並非驅同國人民互相殘殺，却是外國人在打別一外國人，兩個國度，兩個民族，在戰地上一到夜裏，自己就飄飄然覺得皮色變白，鼻梁加高，成爲臘丁民族的戰士，站在野蠻的非洲了。那就無怪乎看得周圍的老百姓都是敵人，要一個一個的打死。法國人對於非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義而論，原是不必愛惜的。僅僅這一節，大一點，則說明了中國軍閥爲什麼做了帝國主義的爪牙，來毒害屠殺中國的人民，那是因爲他們自己以爲是『法國的客軍』的緣故；小一點，就說明中國的『民族主義文學家』根本上只同外國主子休戚相關，爲什麼倒稱『民族主義文學家』來朦混讀者，那是因爲他們自己覺得有時好像臘丁民族，條頓民族了的緣故。

黃震遐先生寫得如此坦白，所說的心境當然是真實的，不過據他小說中所顯示的智識推測起來，却還有並非不知而故意不說的一點諱飾。這，是他將『法國的安南兵』含糊的改作『法國的客軍』了，因此就較遠於『實際描寫』，而且也招來了上節所說的是非。

但作者聰明的，他聽過『友人傅彥長君平時許多議論……許多地方不可諱地是受了他的薰陶』，並且考據中外史傳之後，接着又寫了一篇較切『民族主義』這個题目的劇詩，這回不用法蘭西人了，是『黃人之血』（『前鋒月刊』七號）。

這劇詩的事蹟，是黃色人種的西征，主將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元帥，真正的黃色種。所征的是歐洲，其實專在韓羅斯（俄羅斯）——這是作者的目標；聯軍的構成是漢，韃靼，女貞，契丹人——這是作者的計劃？一路勝下去，可惜後來四種

人不知『友誼』的要緊和『團結的力量』，自相殘殺，竟爲白蓮武士所乘了——這
是作者的諷喻，也是作者的悲哀。

但我們且看這黃色軍的威猛和惡辣罷——

.....

恐怖呀，煎着屍體的沸油；

可怕呀，遍地的屍骸如何凶醜；

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摟；

美人螻首變成豬猛的髑髏；

野獸般的生番在故宮裏蠻爭惡鬥；

千年的棺才洩出地凶穢的惡臭；

十字軍戰士的臉上充滿了哀愁；

鐵蹄踐着斷骨，駱駝的鳴聲變成怪吼；

上帝已逃，魔鬼揚起了火鞭復仇；

黃禍來了！黃禍來了！

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

這德皇威廉因為要鼓吹『德國德國，高於一切』而大叫的『黃禍』，這一張『亞細亞勇士們張大』的『喫人的血口』，我們的詩人却是對着『幹羅斯』，就是現在無產者專政的第一個國度，以消滅無產階級的模範——這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目標；但究竟因為是殖民地順民的『民族主義文學』，所以我們的詩人所奉為首領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華人趙構，張開『喫人的血口』的是『亞細亞勇士們』不是中國勇士們，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統馭之下的『友誼』，不是各民族間的平等的友愛——這就是露骨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但也是青年軍人的作者悲哀。

拔都死了；在亞細亞的黃人中，現在可以擬爲那時的蒙古的只有一個日本。日本的勇士們雖然也痛恨蘇聯，但也不愛撫中華的勇士，大唱『日支親善』雖然也和主張『友誼』一致，但事實又和口頭不符，從中國『民族主義文學者』的立場上，在已覺得悲哀，對他加以諷喻，原是勢所必至，不足詫異的。

果然，詩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證實了，而且還差得遠。當『揚起火鞭』焚燒『翰羅斯』將到開頭的時候，就像拔都那時的結局一樣，朝鮮人亂殺中國人，日本人『張大吃人的血口』，吞了東三省了。莫非他們因爲未受傅彥長先生的薰陶，不知『團結的力量之重要』，竟將中國的『勇士們』也看成非洲的阿刺伯人了嗎？！

五

這實事是一個大打擊。軍人的作者還未喊出他勇壯的聲音，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是『民族主義』旗下的報章上所載的小勇士們的憤激和絕望。這也是勢所必至，無

足詫異的。理想和現實本來易于衝突，理想時已經含了悲哀，現實起來當然就會絕

望。于是小勇士們要打仗了——

『戰啊，下個最後的決心，

殺盡我們的敵人，

你看敵人的槍砲都響了；

快上前，把我們的肉體築一座 長城。

雷電在頭上咆哮，

浪濤在脚下吼叫，

熱血在心頭燃燒，

我們向前線奔跑。』

（蘇鳳：『戰歌』。『民國日報』載。）

『去，戰場上去，

我們的熱血在沸騰，

我們的肉身好像瘋人，

我們去把熱血鏤住賊子的槍頭，

我們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去，戰場上去；

憑着我們一般勇氣，

憑着我們一點純愛的精靈，

去把仇人驅逐，

不，去把仇人殺盡。」

（甘豫慶：『去上戰場去』『申報』載。）

『同胞，醒起來罷，

踢開了弱者的心，

踢開了弱者的腦。

看，看，看，

看同胞們的血噴出來了，

看同胞們的肉割開來了，

看同胞們的屍體掛起來了。

（邵冠華：『醒起來罷同胞』。同上。）

這些詩裏很明顯的是作者都知道沒有武器，所以只好用『肉體』，用『純愛的精靈』，用『屍體』。這正是『黃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隨拔都元帥之後，主張『友誼』的緣故。武器是主子那裏買來的，無產者已都是自己的敵人，倘主子又不諒其衷，要加以『懲膺』，那麼，惟一的路也實在只有一個死了

『我們是初訓練的一隊，

有堅卓的志願，
有沸騰的熱血，

來掃除強暴的歹類。

同胞們，親愛的同胞們，

快起來準備去戰，

快起來奮鬥。

戰死是我們生路。」

（沙珊：『學生軍』。同上。）

「天在嘯，

地在震，

人在衝，獸在吼，

宇宙間的一切在咆哮，

朋友喲，

準備着我們的頭顱去給敵人砍掉。」

（給之津：『偉大的死』。同上。）

一羣是發揚踔厲，一羣是慷慨悲歌，寫寫固然無妨，但倘若真要這樣，卻未免太不懂得『民族主義文學』的精義了，然而，却也盡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

六

『前鋒月刊』上用大號字題目『黃人之血』的作者黃震遐詩人。不是早已告訴我們過理想的元帥拔都了嗎？這詩人受過傅彥長先生的薰陶，查過中外的史傳，還知道『中世紀的東歐是三種思想的衝突點』，豈就會偏不知道趙冢末葉的中國，是蒙古人的淫掠場？拔都元帥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國時，所至淫掠婦女，焚燒

廬舍，到山東曲阜看見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罵道：『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的，不就是你嗎？』夾臉就給他一箭。這是宋人的筆記裏垂涕而道的，正如現在常見于報章上的流淚文章一樣。黃詩人所描寫的『幹羅斯』那『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摟……』那些妙文，其實就是那時出現於中國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孫子，他們不就攜手『西征』了嗎？現在日本兵『東征』了東三省，正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的開場。不過先得在中國咬一口。因為那時成吉思皇帝也像對於『幹羅斯』一樣，先使中國人變成奴才，然後趕他打仗，並非用了『友誼』，送東帖來敦請的。所以，這瀋陽事件，不但和『民族主義文學』毫無衝突，並且還實現了他們的理想境，倘若不明這精義，要去硬送頭顱，使『亞細亞勇士』減少，那實在是很可惜的。

那麼，『民族主義文學』無須有那些嗚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調子嗎？謹對曰：要有的他們也一定有的。否則不抵抗主義，城下之盟，斷送土地這些勾當，在沈靜中

就顯得更加露骨。必須痛哭怒號，摩拳擦掌，令人被這擾攘嘈雜所惑亂，聞悲歌而淚垂，聽壯歌而憤洩，於是那『東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隱隱的跨過去了。落葬的行列裏有悲哀的哭聲，有壯大的軍樂，那任務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熱鬧來掩過了這『死』，給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却』。現在『民族主義文學』的發揚踔厲，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盡着同一的任務的。

但這之後，『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為有一個問題，更加臨近，就是將來主子是否不至於再蹈拔都元帥的覆轍，肯信用而且優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們呢？這實在是一個很要緊，很可怕的問題，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榮』的大關鍵。

歷史告訴我們：不能的。這，正如連『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已經知道一樣，不會有這一回事。他們將只盡些送喪的任務，永含着戀主的哀愁，須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風濤怒吼起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纔能脫出這沉滯猥劣和腐爛的運命。

唐朝的釘梢

上海的摩登少爺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隨不捨，術語謂之『釘梢』。『釘』者，堅附而不可拔也，『梢』者，末也，後也，譯成文言，大約可以說是『追躡』。據釘梢專家說，那第二步便是『扳談』；即使罵，也就大有希望，因爲一罵便可有言語來往，所以也就是『扳談』。開頭。我一向以爲這是現在的洋場上纔有的，今看『花間集』，乃知道唐朝就已經有了這樣的事，那裏面有張泌的浣溪紗調十首，其九云；

晚逐香車入鳳城，東風斜揭繡簾輕，慢迴嬌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計從，便須佯醉且隨行，依稀聞道『太狂生』。

這分明和現代的釘梢法是一致的。倘要譯成白話詩，大概可以是這樣：

夜趕洋車路上飛，

東風吹起印度綢衫子，顯出腿兒肥，

亂丟倦眼笑迷迷。

難以扳談有什麼法子呢？

只能帶着油腔滑調且釘梢，

好像聽得罵道『殺千刀』！

但恐怕在古書上，更早的也還能夠發見，我極希望博學者見教，因為這是對於研究『釘梢史』的人，極有用處的。

選自二心集——合衆版。

一九三二年

論『第三種人』

這三年來，關於文藝上的論爭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揮刀的保護之下，掛着『左翼』的招牌，在馬克斯主義裏發見了文藝自由論，列寧主義裏找到了殺盡共匪說的論客的『理論』之外，幾乎沒有人能夠開口，然而，倘是『爲文藝而文藝』的文藝，却還是『自由』的，因爲他決沒有收了盧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種人』，就是『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人』，又不免有一種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壇要說他是『資產階級的走狗』。

代表了這一種『第三種人』來鳴不平的，是『現代』雜誌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蘇汶先生的文章（我在這裏先應該聲明：我爲便利起見，暫且用了『代表』，『第三

種人」這些字眼，雖然明知道蘇先生的「作家之羣」，是也如拒絕「或者」，「多少」，「影響」這一類不十分決定的字眼一樣，不要固定的名稱的，因為名稱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為左翼的批評家，動不動就說作家是「資產階級的走狗」，甚至於將中立者認為非中立，而非中立，便有認為「資產階級的走狗」的可能，號稱「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第三種人」又要作而不敢，於是文壇上便沒有東西了。然而文藝據說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於階級鬭爭之外的，為將來的，就是「第三種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藝。——但可惜，被左翼理論家弄得不敢作了，因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罵的豫感。

我相信這種豫感是會有的，而以「第三種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說。現在很有懂得理論，而感情難變的作家。然而感情不變，則懂得理論的度數，就不免和感情已變或略變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兩樣。蘇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來，是並不正確的。

自然，自從有了左翼文壇以來，理論家曾經犯過錯誤，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蘇汶先生所說，有『左而不作』的，並且還有由左而右，甚至於化爲民族主義文學的小卒，書坊的老闆，敵黨的探子的，然而這些討厭左翼文壇了的文學家所遺下的左翼文壇，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還在發展，克服自己的壞處，向文藝這神聖之地進軍。蘇汶先生問過：克服了三年，還沒有克服好麼？回答是：是的，還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說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進軍着，不會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後行進那樣的傻事的。但是，蘇汶先生說過『笑話』：左翼作家在從資本家取得稿費；現在我來說一句真話，是左翼作家還在受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壓迫，禁錮，殺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殘，現在非常寥寥，即偶有發表，批評作品的也絕少，而偶有批評作品的，也並未會不動便指作家爲『資產階級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或國外殺進來的仇敵，他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

但現在要問：左翼文壇現在因為受着壓迫，不能發表很多的批評，倘一旦有『發表的可能，不至於動不動就指『第三種人』爲『資產階級的走狗』麼？我想，倘若左翼批評家沒有宣誓不說，又只從壞處着想，那是有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這還要壞。不過我以為這種豫測。實在和想到地球也許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殺一樣，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蘇汶先生的『第三種人』，却據說是爲了這未來的恐怖而『擱筆』了。未曾身歷，僅僅因爲心造的幻影而擱筆，『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的擁抱力，又何其弱呢？兩個愛人，有因爲豫防將來的社會上的斥責而不敢擁抱的麼？

其實，這『第三種人』的『擱筆』，原因並不在左翼批評的嚴酷。真實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這樣的『第三種人』，做不成這樣的人，也就沒有了第三種筆，擱與不擱，還談不到。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鬪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鬪而獨

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着，然而並非因爲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敵拔了的緣故。

所以雖是『第三種人』，却還是一定超不出階級的，蘇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階級的批評了，作品裏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也一定離不開戰鬥的，蘇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種人』之名提出抗爭了，雖然『抗爭』之名又爲作用所不願受；而且也跳不過現在的，他在創作超階級的，爲將來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於左翼的批判了。

這確是一種苦境。但這苦境，是因爲幻影不能成爲實有而來的。即使沒有左翼文壇作梗，也不會有這『第三種人』，何況作品。但蘇汶先生却又心造了一個橫暴的左翼文壇的幻影，將『第三種人』的幻影不能出現，以至將來的文藝不能發生的罪孽，都推給牠了。

左翼作家誠然是不高超的，連環圖畫，唱本，然而也不到蘇汶先生所斷定那樣

的沒出息。左翼也要託爾斯泰，弗羅培爾。但不要『努力去創造一些屬於將來（因為他們現在是不要的）的東西』的託爾斯泰和弗羅培爾。他們兩個，都是爲現在而寫的，將來是現在的將來，於現在有意義，才於將來會有意義。尤其是託爾斯泰，他寫些小故事給農民看，也不自命爲『第三種人』，當時資產階級的多少攻擊，終於不能使他『擱筆』。左翼雖然誠如蘇汶先生所說，不至於蠢到不知道『連環圖畫是產生不出託爾斯泰，產生不出弗羅培爾來』，但却以爲可以產出密開朗該羅，達文希那樣偉大的畫手。而且我相信，從唱本說書裏是可以產生託爾斯泰，弗羅培爾的。現在提起密開朗該羅們的畫來，誰也沒有非議了，但實際上，那不是宗教的宣傳畫，『舊約』的連環圖畫麼？而且是爲了那時的『現在』的。

總括起來說，蘇汶先生是主張『第三種人』與其欺騙，與其做冒牌貨，倒還不如努力去創作，這是極不錯的。

『定要有自信的勇氣，才會有工作的勇氣』！這尤其是對的。

然而蘇汶先生又說，許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種人』們，却又因爲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論家的批評而『擱筆』了！

「怎麼辦呢？」

（十月十日。）

（選自南腔北調——同文版。）

祝中俄文字之交

十五年前，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十五年以來，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這裏的所謂『勝利』，是說：以牠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而得到廣大的讀者，並且給與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牠在中國，也沒有出於這例子之外。

我們曾在梁啟超所辦的『時務報』上，看見了『福爾摩斯包探案』的變幻，又在『新小說』上，看見了焦士威奴 (Jules Verne) 所做的號稱科學小說的『海底旅行』之類的新奇。後來林琴南大譯英國哈葛德 (H. Rider Haggard) 的小說了，我們又看見了倫敦小姐之纏絲和非洲野蠻之古怪。至於俄國文學，却一點不知道，——但有幾位也許自己心裏明白，而沒有告訴我們的『先覺』先生，自然是例外。不過在別一方面，是已經有了感應的。那時較為革命的青年，誰不知道俄國青年是革命的，暗殺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蘇菲亞，雖然大半也因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現在的國貨的作品中，還常有『蘇菲』一類的名字，那淵源就在此。

那時——十九世紀末——的俄國文學，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託爾斯泰的作品，已經很影響了德國文學。但這和中國無關，因為那時研究德國文的人少得很。最有關係的是英美帝國主義者，他們一面也翻譯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託爾斯泰，契訶夫的選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給印度人讀的讀本來教我們的青年以拉瑪和吉

利瑟那 (Kama and Krishna) 的對話，然而因此也攜帶了閱讀那些選集的可能。包探，冒險家，英國姑娘，非洲野蠻的故事，是只能當醉飽之後，在發脹的身體上搔癢癢的，然而我們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經覺得壓迫，只有痛楚，他要掙扎，用不着癢癢的撫摩，只在尋切實的指示了。

那時就看見了俄國文學。

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裏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裏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

從現在看來，這是誰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時，却是一個大發見，正不亞於古人的發見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東西。

俄國的作品，漸漸的紹介進中國來了，同時也得了一部分讀者的共鳴，只是傳

佈開去。零星的譯品且不說罷。成爲大部的就有『俄國戲曲集』十種和『小說月報』增刊的『俄國文學研究』一大本，還有『被壓迫民族文學號』兩本，則是由俄國文學的啓發，而將範圍擴大到一切弱小民族，並且明明點出『被壓迫』的字樣來了。

於是也遭了文人學士的討伐，有的主張文學的『崇高』，說描寫下等人是鄙俗的勾當，有的比創作爲處女，說翻譯不過是媒婆，而重譯尤令人討厭。的確，除了『俄國戲曲集』以外，那時所有的俄國作品幾乎都是重譯的。

但俄國文學只是紹介進來，傳佈開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們雖然從安特來夫 (L. Andreev) 的作品裏遇到了恐怖，阿爾志跋綏夫 (M. Artsybashev) 的作品裏看見了絕望和荒唐，但也從珂羅連珂 (V. Korolenko) 學得了寬宏，從戈理基 (Maxim Gorky) 感受了反抗。讀者大眾的共鳴和熱愛，早不是幾個論客的自私的曲說所能掩蔽，這偉力，終於使先

前膜拜曼殊斐兒 (John Masefield) 的紳士也重譯了都介涅夫的『父與子』，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譯着託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了。

這之間，自然又遭了文人學士和流氓警犬的聯軍的討伐。對於介紹者，有的說是爲了盧布，有的說是意在投降，有的笑爲『破鑼』，有的指爲共黨，而實際上的對於書籍的禁止和沒收，還因爲是祕密的居多，無從列舉。

但俄國文學只是紹介進來，傳佈開去。

有些人們，也譯了莫索里尼傳，也譯了希特拉傳，但他們引介不出一冊現代意國或德國的白色的大作品，『戰後』是不屬於希特拉的卍字旗下的，『死的勝利』又只好以『死』自傲。但蘇聯文學在我們却已有了里培進斯基的『一週間』，革拉珂夫的『上敏士』，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摩微文的『鉄流』；此外中篇短篇，還多得很。凡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鎗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讀者大眾的懷裏去，給一一知道了變革，戰鬥，建設的辛苦和成功。

但一月以前，對於蘇聯的『輿論』，剎時都轉變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許多報章，總要提起幾點蘇聯的好處，有時自然也涉及文藝上：『復交』之故也。然而，可祝賀的却並不在這里。自利者一淹在水裏面，將要滅頂的時候，只要抓得着，是無論『破鑼』破鼓，都會抓住的，他決沒有所謂『潔癖』。然而無論他終於滅亡或幸而爬起，始終還是一個自利者。隨手來舉一個例子罷，上海稱爲『大報』的『申報』，不是一面甜嘴蜜舌的主張着『組織蘇聯考察團』（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時評），而一面又將林克多的『蘇聯聞見錄』稱爲『反動書籍』（同二十七日新聞）麼？

可祝賀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開始雖然比中英，中法遲，但在近十年中，兩國的絕交也好，復交也好，我們的讀者大眾却不因此而進退；譯本的放任也好，禁壓也好，我們的讀者也決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擴大；不但雖絕交和禁壓是如常，而且雖絕交和禁壓而更加擴大。這可見我們的讀者大眾，是一向不用

自私的『勢利眼』來看俄國文學的。我們的讀者大眾，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裏，要生長出什麼東西來，而這『黑土』卻也確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鬪，變革，戰鬪，建設，戰鬪，成功。

在現在，英國的蕭，法國的羅蘭，也都成爲蘇聯的朋友。這，也是當我們中國和蘇聯在歷來不斷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擴大而與世界結成真的『文字之交』的開始。

這是我們應該祝賀的。

（十二月三十日。）

（選自南腔北調集——同文版。）

一九三三年

又論「第三種人」

戴望舒先生遠遠的從法國給我們一封通信，敘述着法國A.E.A.R.（革命文藝家協會）得了紀德的參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會，猛烈的反抗德國法西斯諦的情形，並且介紹了紀德的演說，發表在六月號的『現代』上。法國的文藝家，這樣的仗義執言的舉動是常有的：較遠，則如左拉爲德來孚斯打不平，法朗士當左拉改葬時候的講演；較近，則有羅曼羅蘭的反對戰爭。但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歡欣，因爲問題是當前的問題，而我也正是憎惡法西斯諦的一個。不過戴先生在報告這事實的同時，一併指明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蒙』和像軍閥一般的橫暴。我卻還想來說幾句話。但希望不要誤會，以爲意在辯解。希圖中國也從所謂『第三種人』得到

對於德國的被壓迫者一般的聲援，——並不是的。中國的焚禁書報，封閉書店，囚殺作者，實在還遠在德國的白色怖以前，而且也得到過世界的革命的文藝家的抗議了。我現在要說的，不過那通信裏的必須指出的幾點。

那通信敘述過紀德的加入反抗運動之後，說道——

『在法國文壇中，我們可以說紀德是「第三種人」，……自從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現在為止，他始終是一個忠實於他的藝術的人。然而，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法國的革命作家沒有這種愚蒙的見解（或者不如說是精明的策略），因此，在熱烈的歡迎之中，紀德便在羣衆之間發言了。

這就是說：『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就是『第三種人』，而中國的革命作家，卻『愚蒙』到指這種人爲全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現在已經由紀德證實，是『不一定』的了。

這裏有兩個問題應該解答：

第一，是中國的左翼理論家是否真指『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爲全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據我所知道，卻並不然。左翼理論家無論如何愚蒙，還不至於不明白『爲藝術的藝術』在發生時，是對於一種社會的成規的革命，但待到新興的戰鬥的藝術出現之際，還拿着這老招牌來明明暗暗阻礙他的發展，那就成爲反動，且不只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了。至於『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卻並未視同一律。因爲不問那一階級的作家，都有一個『自己』，這『自己』，就都是他本階級的一分子，忠實於他自己的藝術的人，也就是忠實於他本階級的作者，在資產階級如此，在無產階級也如此。這是極顯明粗淺的事實，左翼理論家也不會不明白的。但這位——戴先生用『忠實於自己的藝術』來和『爲藝術的藝術』掉了一個包，可真顯得左翼理論家的『愚蒙』透頂了。

第二，是紀德是否真是中國所謂的『第三種人』？我沒有讀過紀德書，對於

作品，沒有加以批評的資格。但我相信：創作和演說，形式雖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決不會兩樣的。我可所引出戴先生所介紹的演說裏的兩段來——

『有人會對我說：『在蘇聯呢是這樣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卻是完全兩樣的，而且，爲了要建設一個新社會起見，爲了把發言權給與那些一向做着受壓迫者，一向沒有發言權的人們起見，不得已的矯枉過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爲什麼並怎樣會在這裏贊同我在那邊所反對的事呢？那就是因爲我在德國的恐怖政策中，見到了最可歎最可憎的過去底再演，在蘇聯的社會創設中，我卻見到一個未來的無限的允約。』

這說得清清楚楚，雖是同一手段，而他卻因目的之不同而分爲贊成或反抗。蘇聯十月革命後，側重藝術的『緩拉比翁的兄弟們』這團體，也被稱爲『同路人』，但他們卻並沒有這麼積極。中國關於『第三種人』的文字，今年已經彙印了一本專

書，我們可以查一查，凡自稱爲『第三種人』的言論，可有絲毫近似這樣的意見的麼？倘其沒有，則我敢決定地說：『不可以說紀德是「第三種人」』。

然而正如我說紀德不像中國的『第三種人』一樣，戴望舒先生也覺得中國的左翼作家和法國的大有賢愚之別了。他在參加大會，爲德國的左翼藝術家同伸義憤之後，就又想起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蠢橫暴的行爲。於是他臨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國對於德國法西斯諦的暴行有沒有怎麼表示。正如我們的軍閥一樣，我們的文藝者也是勇於內戰的。在法國的革命作家們和紀德攜手的時候，我們的左翼作家想必還在把所謂『第三種人』當作唯一的敵手吧！』

這里無須解答，因爲事實具在：我們這里也曾經有一點表示，但因爲和在法國兩樣，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見什麼『把所謂「第三種人」當作唯一的敵手』的文章，不再內戰，沒有軍閥氣味了。戴先生的預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國的左翼作家，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國左翼作家一樣賢明了麼？我以

爲並不這樣，而且也不應該這樣的。如果聲音還沒有全被消除的時候，對於『第三種人』的討論，還極有從新提起和展開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國革命作家們的隱衷，覺得在這危急時，和『第三種人』攜手，也許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爲單靠『策略』，是沒有用的，有真切的見解，才有精明的行爲，只要看紀德的演說，就知道他並不超然於政治之外，決不能貿貿然稱之爲『第三種人』，加以歡迎，是不必別具隱衷的。不過在中國的所謂『第三種人』，卻還複雜得很。

所謂『第三種人』，原意只是說：站在甲乙對立或相關之外的人。但在實際上，是不能有的。人體有胖和瘦，在理論上，是該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種人的，然而事實上卻並沒有，一加比較，非近於胖，就近於瘦。文藝上的『第三種人』也一樣，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罷，其實是總有些偏向的，平時有意的或無意的遮掩起來，而一遇切要的事，他便會分明的顯現。如紀德，他就顯出左向來了；別的人，也能從幾句話裏，分明的顯出。所以在這混雜的一羣中，有的能和革命前進，共鳴；有

的也能乘機將革命中傷，軟化，曲解。左翼理論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務。

如果這就等於『軍閥』的內戰，那麼，左翼理論家就必須更加繼續這內戰，而將營壘分清，拔去了從背後射來的毒箭！

（六月四日。）

（選自南腔北調集——同文版。）

『蜜蜂』與『蜜』

陳思先生：

看了『濤聲』上批評『蜜蜂』的文章後，發生了兩個意見，要寫出來，聽聽專家的判定。但我不再來辯論，因為『濤聲』並不是打這類官司的地方。

村人火燒蜂羣，另有緣故，並非階級鬭爭的表現，我想，這是可能的。但蜜蜂是否會於蟲媒花有害，或去害風媒花呢，我想，這也是可能的。

昆蟲有助於蟲媒花的受精，非徒無害，而且有益，就是極簡略的生物學上都

這樣說，確是不錯的。但這是在常態時候的事。假使蜂多花少，情形可就不同了，蜜蜂爲了採粉或者救飢，在一花上，可以有數匹甚至十餘匹一湧而入，因爲爭，將花瓣弄傷，因爲餓，將花心咬掉，聽說日本的果園，就有遭了這種傷害的。牠的到風媒花上去，也還是因爲飢餓的緣故。這時釀蜜已成次要，牠們是喫花粉去了。

所以，我以爲倚花的多少，足供蜜蜂的需求，就天下太平，否則，便會『反動』，譬如蟻是養護蚜蟲的，但倘將牠們關在一處，又不另給食物，蟻就會將蚜蟲喫掉；人是喫米或麥的，然而遇着饑饉，便喫草根樹皮了。

中國向來也養蜂，何以並無此弊呢？那是極容易回答的：因爲少。近來以養蜂爲生財之大道，幹這事的愈多，然而中國的蜜價，遠遜歐美，與其賣蜜，不如賣蜂。又因報章鼓吹，思養蜂以獲利者輩出在，故買蜂者也多於買蜜。因這緣故，就使養蜂者的目的，不在於使蜂蜜而在於使繁殖了。作種種之業，卻並不與之俱進，遂成蜜多花少的現象，鬧出上述的亂子來了。

總之，中國倘不設法擴張蜂蜜的用途，及同時開闢果園農場之類。而一味出賣密種以圖目前之利，養蜂事業不久就要到了絕路的。此信甚希發表，以冀有心者留意也。專此，順請

著安。

羅撫。

（六月十一日。）

（選自南腔北調集——同文版。）

九一八

陰天，晌午大風雨。看晚報，已有紀念這紀念日的文章，用風雨作材料了。明天的日報上，必更有千篇一律的作品。空言不如事實，且看看那些記事罷——

戴季陶講如何救國（中央社）

南京十八日——國府十八日晨舉行紀念週，到林森戴季陶陳紹寬朱家驊呂

超魏懷暨國府職員等四百餘人，林主席領導行禮，繼戴講「如何救國」，略謂本日係九一八兩週年紀念，吾人於沉痛之餘，應想法達到救國目的，救國之道甚多，如道德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最近又有所謂航空運動及節約運動，前者之動機在於國防與交通上建設，此後吾人應從根本上設法增強國力，不應只知向外國講買飛機，至於節約運動須一面消極的節省消費，一面積極的將金錢用於生產方面。在此國家危急之秋，吾人應該各就自己的職務上盡力量，根據總理的一貫政策，來做整個三民主義的實施。

吳敬恆講紀念意義（中央社）

南京十八日——中央十八日晨八時舉行九一八二週年紀念大會，到中委汪兆銘陳果夫邵元冲陳公博朱培德賀耀祖王祺等暨中央工作人員共六百餘人，汪主席，由吳敬恆演講以精誠團結充實國力，為紀念九一八之意義，闡揚甚多，並指正愛國之道，詞甚警惕。至九時始散。

漢口靜默停止娛樂（日聯社）

漢口十八日——漢口九一八紀念日華街各戶均揭半旗，省市兩黨部上午十時舉行紀念會，各戲院酒館等一律停業。上午十一時全市人民默禱五分鐘。

廣州禁止民衆遊行（路透社）

廣州十八日——各公署與公共團體今晨均舉行九一八國耻紀念，中山紀念堂晨間行紀念禮，演說者均抨擊日本對華之侵略，全城汽笛均大鳴，以警告民衆，且有飛機於行禮時散發傳單，惟民衆大游行，爲當局所禁，未能實現。

東京紀念祭及犬馬（日聯社）

東京十八日——東京本日舉行九一八紀念日，下午一時在日比谷公會堂舉行陣亡軍人遺族慰安會，築地本願寺舉行軍馬軍犬軍鴿等之懸靈祭，在鄉軍人於下午六時開大會，靖國神社舉行陣亡軍人追悼會。

但在上海怎樣呢？先看租界——

雨絲風片倍覺消沉

今日之全市，既因絲雨風片之侵襲，愁雲慘霧之籠罩，更顯黯淡之象。但駕車遍遊全市，則殊難得見九一八特殊點綴，似較諸去年今日，稍覺消沉，但此非中國民衆之已漸趨於麻木，或者爲中國民衆已覺悟於過去標語口號之不足恃，祇有埋頭苦做之一道乎？所以今日之南市開北以及租界區域，情形異常平安，道途之間，除警務當局多派警探在衝要之區，嚴密戒備外，簡直無甚可以紀述者。

以上是見於「大美晚報」的，很爲中國人祝福。至華界情狀，卻須看「大晚報」的紀載了——

今日九一八

華界戒備

公安局據密報防反動

今日爲「九一八」，日本侵佔東北國難二週紀念，市公安局長文鴻恩，昨據密報，有反動份子，擬藉國難紀念爲由秘密召集無知工人，乘機開會，企圖煽惑搗亂秩序等語，文局長核報後，卽訓令各區所隊，仍照去年「九一八」實施特別戒備辦法，除通告該局各科處於今晨十時許，在局長辦公廳前召集全體職員，及警察總隊第三中隊警士，舉行「九一八」國難紀念，同時併行紀念週外，並飭督察長李光會派全體督察員，男女檢查員，分赴中華路，民國路，方浜路，南陽橋，唐家灣，斜橋等處，會同各區所警士，在各要隘街衢，及華租界接壤之處，自上午八時至十一時半，中午十一時半至三時，下午三時至六時半，分三班輪流檢查行人。南市大吉路公共體育場，滬西曹家渡三角場，閘北譚子灣等處，均大批巡邏警士，禁止集會遊行。製造局路之西，徐家匯區域內主要街道，尤宜特別注意，如遇發生事故，不能制止者，卽向麗園路報告市保安處第二團長處置，凡工廠林立處所，加派雙崗駐守，紅色車巡隊，沿城環行

駛巡，形勢非常壯嚴。該局偵緝隊長盧英，飭偵緝領班陳光炎，陳才福，唐炳祥，夏品山，各率偵緝員，分頭密赴曹家渡，白利南路，膠州路及南市公共體育場等處，嚴密暗探反動份子行動，以資防範，而遏亂萌。公共租界暨法租界兩警務處，亦派中西探員出發搜查，以防反動云。

「紅色車」是囚車，中國人可坐，然而從中國人看來，並覺得「形勢非常壯嚴」云。記得前兩天（十六日）出版的『生活』所載的『兩年的教訓』裏，有一段說：

「第二，我們明白誰是友誰是仇了。希特勒在德國民族社會黨大會中說：『德國的仇敵，不在國外，而在國內。』北平整委員主席黃郛說：『和共抗日之說，實爲謬論；剿共和外方爲救時救黨上策。』我們黨要說『民族的仇敵，不僅是帝國主義，而是出賣民族利益的帝國主義走狗們。』民族反帝的真正障礙在那裏，還有比這過去兩年的事實指示得更明白嗎？」

現在再來一個切實的註腳：分明的鐵證還有上海華界的『紅色車』！是一天裏的大教訓！

年年的這樣的情狀，都被時光所埋沒了，今夜作此，算是紀念文，倘中國人而終不至被害殺絕，則以貽我們的後來者。

（是夜，記。）

（選自南腔北調集——同文版。）

『以夷制夷』

我還記得，當去年中國有許多人，一味哭訴國聯的時候，日本的報紙上往往加以譏笑，說道是中國祖傳的『以夷制夷』的老手段。粗粗一看，也彷彿有些像的，但是，其實不然。那時的中國的許多人，的確將國聯看作『青天大老爺』，心裏何嘗還有一點兒『夷』字的影子。

倒相反，『青天大老爺』們却常常用着『以華制華』的方法的。

例如罷，他們所深惡的反帝國主義的『犯人』，他們自己倒是不做惡人的，只是鬆鬆爽爽的送給華人，叫你自己去殺去。他們所痛恨的腹地的『共匪』，他們自己是並不明白表示意見的，只將飛機炸彈賣給華人，叫你自己去炸去。對付下等華人的有黃帝子孫的巡捕和西崽，對付智識階級的有高等華人的學者和博士。

我們自誇了許多日子的『大刀隊』，好像是無法制伏的了，然而四月十五日的『××報』上，有一個用頭號字印『我斬敵二百』的題目。粗粗一看，是要令人覺得勝利的，但我們再來看一看本文罷——

『（本報今日北平電）昨日喜峯口右翼，仍在灤陽城以東各地，演爭奪戰。敵出現大刀隊千名，係新開到者，與我大刀隊對抗。其刀特長，敵使用不靈活。我軍揮刀砍抹，敵招架不及，連刀帶臂，被我砍落者縱橫滿地，我軍傷亡亦達二百餘。』……

那麼，這其實是『敵斬我軍二百』了，中國的文字，真是樣『國步』一樣，正在一天一天的艱難起來。但是我要指出來的却並不在此。

我要指出來的是『大刀隊』乃中國人自誇已久的特長，日本人雖有擊劍，大刀却非素習。現在可是『出現』了，這不必遲疑，就可決定是滿洲的軍隊。滿洲從明末以來，每年即大有直隸山東人遷居，數代之後，成爲土著。則雖是滿洲軍隊，而大多數實爲華人，也決無疑義。現在已經各用了特長的大刀，在灤東相殺起來，一面是『連刀帶臂，縱橫滿地』，一面是『傷亡亦達二百餘』，開演了極顯著的『以華制華』的一幕了。

至於中國的所謂手段，由我看來，有是也應該說有的，但決非『以夷制夷』，倒是想『以夷制華』。然而『夷』又那有這麼愚笨呢，却先來一套『以華制華』給你看。

這例子常見於中國的歷史上，後來的官吏爲新朝作頌，稱此輩的行爲曰：『爲

王前驅』！

近來的戰報是極可詫異的，如同日同報記冷口失守云：『十日以後，冷口方面之戰，非常激烈，華軍……頑強抵抗，故繼續未曾有大激戰，』但由宮崎部隊以十餘兵士，作成人梯，前仆後繼，『卒越過長城，因此宮崎部隊犧牲二十三名之多。』越過一個險要，而日軍只死了二十三人，但已云『之多』，又稱爲『未曾有大激戰』，也未免有起費解。所以大刀隊之戰，也許並不如我所猜測。但既經寫出，就姑且留下以備一說罷。

(四月十七日)

〔跳跟〕：

『以華制華』

李家作

報紙不可不看。在報上不但可以看到虔修功德如唸唸阿彌陀佛，選拔國士如徵求飛簷走壁之類的「善」文，還可以隨時長許多見識。譬如說殺人，以前

只知道有砍頭絞頸子，現在却知道還有吃人肉，而且還有「以夷制夷」，「以夷制華」等等的分別。經明眼人一說道是越想越覺得不錯的。

尤其是「以華制華」，那樣的手段真是越想越覺得多的，原因是人太多了，華對華並不會親熱；而且爲了自身的利害要坐大交椅，當然非解決別人不可。所以那「制」是，無論如何要「制」的。假如因爲制人而能得到好處。或是因爲制人而能討得上頭的歡心，那自然更其起勁。這心理，夷人就 very 善於利用，從侵略土地到賣肥皂，都是用的這「華人」善於「制華」的美點。然而，華人對夷人，其實也很會利用這種方法，而且非常巧妙。雙方不必明言，彼此心照，各得其所；旁人看來，不露痕蹟。據說那被利用的人便是哈叭狗，即走狗。但細細甄別起來，倒並不祇是哈叭狗一種，另外還有一種是警犬。

做哈叭狗與做警犬，當然都是「以華制華」，但其中也不無分別。哈叭狗只能聽主人吩咐，向仇人搖搖尾，狂吠幾聲。他知道他是什麼樣的身分。警犬

則不然：老於世故者往往如此。他只認定自己是一個好漢，是一個權威，是一個執大義以繩天下者。在那門庭間的方寸之地上，祇有他可以彷徨彷徨，吶喊吶喊。他的威風沒有人敢冒犯，和哈叭狗比較起來，哈叭狗真是淺薄得可憐。但何以也是一「以華制華」呢？那是因為雖然老於世故，也不免露出破綻。破綻是：他儼若嫉惡如仇。平時蹲在地上冷眼旁觀，一看到有類乎「可殺」的情形時，就縱身向前，猛咬一口；可是，他決不是亂咬，他早已看得分明，凡在他寄身的地段上的（他當然不能不有一個寄身的地方），他決不傷害，有了也祇當不看見，以免引起「不便」。他咬，是咬圈子外頭的，尤其是，圈子外頭是礙眼的仇人。這便是勇，這便是執大義。同時，既可顯出自己的權威，又可博得主人底歡心：因為，他所咬的，往往會是他和他東家的共同的敵人。主人對於他所痛恨，自己是並不明白表示意見的，只給你一些供養和地位，叫你自己去咬去。因此有接二連三的奮勇，和吹毛求疵的找機會。旁觀者不免有點不明

白，覺得這仇太深，却不知道這正是老於世故者的做人之道，所謂向惡社會『搏戰』『周旋』是也。那樣的用心，真是很苦！

所可哀者，爲了要掙扎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之下，竟然不惜受員外府君之類的供奉。把那旗子斜插在莊院的門樓邊，暫且作個『江湖一應水碗不得騷擾』的招貼紙兒。也可見得做中國人的不容易，和『以華制華』的效勞，雖賢者亦不免焉。

——三，四，二一。

（四月二十二日，大晚報報副刊『火炬』。）

【搖擺】：

過而能改

傅紅蓼

孔老夫子，在從前教訓着那麼許多門生說：「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意思是錯誤人人都有，只要能夠回頭。我覺得孔老夫子這句話尚有未盡意處，譬

如說：「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之後，再加上一句：「知過不改，罪孽深重」，那便覺得天衣無縫了。

譬如說現在前線打得落花流水的時候，而有人覺得這種爲國犧牲是殘酷，是無聊，便主張不要打，而且更主張不要講和，只說索性藏起頭來，等個五十年。俗諺常有一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看起來五十年的教訓，大概什麼都夠了。凡事有了錯誤，才有教訓，可見中國人尙還有些救藥，國事弄得烏烟瘴氣到如此，居然大家都恍然大悟自己內部組織的三大不健全，更而發現武器的不充足。眼前須要幾十個年頭，來作準備。言至此，吾人對於熱河一直到樂東的失守，似乎應當有些感到失得不大冤枉。因爲吾黨（借用）建基以至於今日，由軍事而至於憲政，尙還沒有人肯認過錯，則現在失掉幾個國土，使一些負有自信天才的國家棟梁學貫中西的名儒，居然都肯認錯，所謂「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塞翁夫馬，又安知非福的聊以自慰，也只得閉着眼睛喊兩聲了。

，不過假使今後「知過尙不能改，罪孽的深重，」比寫在訃文上，大概也更
來得使人注目了。

譬如再說，四月二十二日本刊上李家作的「以華制華」裏說的警犬。警犬咬人。是蹲在地上冷眼傍觀，等到有可殺的時候，便一躍上前，猛咬一口。不過，有的時候那警犬被人們提起棍子，向着牠當頭一棒，也會把專門咬人的警犬，打得藏起頭來，伸出舌頭在暗地裏發急。這種發急，大概便是所謂「過」了。因為警犬雖然野性，但有時被棍子當頭一擊，也會被打出自己的錯誤來的，於是「過而能改」的警犬，在暗地裏發急時，自又便會想懺悔，假使是不大曉得改過的警犬，在暗地發急之餘，還想乘機再試，這種犬，大概是「罪孽深重」的了。

中國人只曉得說過而能改 善莫大焉，可惜都忘記了底下那一句。

（四月二十六日，大晚報副刊「火炬」。）

【只要幾句】：

案語

家幹

以上兩篇，是一星期之內，登在『大晚報』附刊『火炬』上的文章，爲了我的那篇『以夷制夷』而發的，揭開了『以華制華』的黑幕，他們竟有如此的深惡痛嫉，莫非真是太傷了此輩的心麼？

但是，不盡然的。大半倒因爲我引以爲例的『××報』其實是『大晚報』，所以使他們有這樣的跳跟和搖擺。然而無論怎樣的跳跟和搖擺，所引的記事具在。舊的『大晚報』也具在。終究掙不脫這一個本已扣得緊緊的籠頭。

此外也無須多話了。只要轉載了這兩篇，就已經由他們自己十足的說明了『火炬』的光明，露出了他們真實的嘴臉。

（七月十九日。）

（選自偽自由書——青光版。）

電的利弊

日本幕府時代，曾大殺基督教徒，刑罰很凶，但不准發表，世無知者。到近幾年，乃出於當時的文獻不少。曾見『切利支丹殉教記』，其中記有拷問教徒的情形，或牽到溫泉旁邊，用熱湯燒身。或周圍生火，慢慢的烤炙，這本是『火刑』，但主管者却將火移遠。改死刑爲虐殺了。

中國還有更殘酷的。唐人說部中曾有記載，一縣官拷問犯人，四周用火遙焙，口渴，就給他喝醬醋。這是比日本更進一步的辦法。現在官廳拷問嫌疑犯，有用辣椒煎汁灌入鼻孔去的，似乎就是唐朝遺下的方法，或則是古今英雄，所見略同。曾見一個囚在反省院裏的青年的信，說先前身受此刑，苦痛不堪，辣汁流入肺臟及心，已成不治之症，即釋放亦不免于死云云。此人是陸軍學生，不明內臟構造，其實倒掛灌鼻，可以由氣管流入肺中，引起致死之病，却不能進入心中，大約當時因在

苦楚中，知覺替亂，遂疑爲已到心臟了。

但現在之所謂文明人所造的刑具，殘酷又超出于此種方法萬萬。上海有電刑，一上，卽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少頃有醒，則又受刑。聞曾有連受七八次者，卽幸而免死，亦從此牙齒皆搖動，神經亦變鈍，不能復原。前年紀念愛迪生，許多人讚頌電報電話之有利于人，却沒有想到同是一電，而有人得到這樣的大害，福人用電氣療病，美容，而被壓迫者却以此受苦，喪命也。

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却用牠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却用牠看風水；外國用雅片醫病，中國却拿來當飯喫。同是一種東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蓋不但電氣而已。

（一月三十一日。）

（選自偽自由書——青光版。）

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

『文化列車』破格的開到我的書桌上面，是十二月十日開車的第三期，託福使我知道了近來有這樣一種雜誌，並且使我看見了楊邨人先生給我的公開信，還要求着答覆。對於這一種公開信，本沒有一定給以答覆的必要的，因為牠既是公開，那目的其實是在給大家看，對我個人倒還在其次。但是，我如果要回答也可以，不過目的也還是在給大家看，要不然，不是只要直接寄給個人就完了麼？因為這緣故，所以我在回答之前，應該先將原信重抄在下面——

魯迅先生：

讀了李儵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李又燃先生，抑或曹聚仁先生的筆名）的讀
偽自由書一文，近末一段說：

「讀着魯迅：偽自由書，便想到魯迅先生的人。那天，見魯迅先生吃

飯，咀嚼時牽動着筋肉，連胸肋骨也拉拉動的，魯迅先生是老了！我當時不禁一股酸味上心頭。記得從前看到父親的老態時有過這樣的情緒，現在看了魯迅先生的老態又重溫了一次。這都是使司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況旁邊早變心了魏延。「這末一句照原文十個字抄，一字無錯，確是妙文！」

不禁令人起了兩個感想：一個是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一個是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爲什麼是諸葛亮？先生的「旁邊」那裏來的「早變心了魏延」？無產階級大衆何時變成了阿斗？

第一個感想使我惶恐萬分！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這是多麼令人驚心動魄的事：記得「吶喊」在北京最初出版的時候（大概總在十年前），我拜讀之後，景仰不置，曾爲文介紹頌揚，揭登於張東蓀先生編的「學燈」，在當時我的敬愛先生甚於敬愛創造社四君子。其後一九二八年「語絲」上先生爲文譏

請我們，雖然兩方論戰絕無感情，可是論戰是一回事，私心敬愛仍然如昔。一九三〇年秋先生五十壽辰的慶祝會上，我是參加慶祝的一個，而且很親切地和先生一起談天，私心很覺榮幸。左聯有一次大會在一個日本同志家裏開着，我又和先生見面，十分快樂。可是今年我脫離共產黨以後，在左右夾攻的當兒，「藝術新聞」與「出版消息」都登載着先生要「噓」我的消息，說是書名定爲：「北平五講與上海三噓」，將對我一用噓的方式加以襲擊，而且將我與梁實秋張若谷同列，這自然是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才有了「新儒林外史第一回」之作。但在「新儒林外史第一回」裏頭只說先生出陣交戰用的是大刀一詞加以反攻的諷刺而已。其中引文的情緒與態度都是敬愛先生的。文中的意義却是以爲先生對我加以「噓」的襲擊未免看錯了敵人吧了。到了拜讀大著「兩地書」以後爲文介紹，筆下如十分恭敬并沒半點謾罵的字句，可是先生於「我的種痘」一文裏頭却有所誤會似地順筆對我放了兩三枝冷箭兒，特別地說是有人攻擊先

生的老，在我呢，並沒有覺得先生老了，而且那篇文章也沒有攻擊先生的老，先生自己認爲是老了吧了。伯納蕭的年紀比先生還大，伯納蕭的鬚毛比先生還白如絲吧，伯納蕭且不是老了，先生怎麼這樣就以爲老了呢？我是從來沒感覺到先生老了的，我只感覺到先生有如青年而且希望先生永久年青。然而，讀了李儼先生的文章，我惶恐，我驚訝，原來先生真的老了。李儼先生因爲看了先生老了而「不禁一股酸味上心頭」有如看他的令尊的老態的時候有過的情緒，我雖然也時常想念着我那年老的父親，但並沒有如人家攻擊我那樣地想做一個「老子」，不過是天性所在有時未免興感而想念着吧了，所以我看了李儼先生的文章並沒有聯想到我的父親上面去。然而先生老了，我是惶恐與驚訝。我惶恐與驚訝的是：我們敬愛的文壇前輩老了，他將因爲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在這敬愛的心理與觀念上，我將今年來對先生的反感打個粉碎，竭誠地請先生訓誨。可是希望先生以嚴肅的態度出之，如「噓」，如放冷箭兒等

卻請慎重，以令對方心服。

第二個感想使我……因為那是李儼先生的事，這裏不願有擾清聽。

假如這信是先生覺得有答覆的價值的話，就請寄到這裏「文化列車」的編者將牠發表，否則希望先生爲文給我一個嚴正的批判也可以。發表的地方我想隨處都歡迎的。

專此并竭誠地恭敬地問了一聲安好并祝

康健

楊邨人謹啓。

一九三三，一二，三。

末了附帶聲明一句，我作這信是出諸至誠，并非因爲鬼兒子罵我和先生打筆墨官司變成小鬼以後向先生求和以……「大鬼」的意思。邨人又及。

以下算是我的回信。因爲是信的形式，所以開頭照例是——

邨人先生：

先生給我的信是沒有答覆的價值的。我並不希望先生「心服」。先生也無須我批判，因為近二年來的文字，已經將自己的形像畫得十分分明了。自然，我決不會相信「鬼兒子」們的胡說，但我也相信先生。

這並非說先生的話是一樣的叭兒狗式的猖獗；恐怕先生是自以為永久誠實的罷，不過因為急促的變化，苦心的躲閃，弄得左支右絀，不能自圓其說，終於變成廢話了，所以在聽者的心中，也就失去了重量。例如先生的這封信，倘略有自知之明，其實是不必寫的。

先生首先問我「爲什麼是諸葛亮」？這就問得稀奇。李儻先生我曾經見過面，並非曹聚仁先生，至於是否李又燃先生，我無從確說，因為又燃先生我是沒有預先見過的。我「爲什麼是諸葛亮」呢？別人的議論，我不能，也不必代爲答覆，要不

然，我得整天的做答案了。也有人說我是「人羣的蝨賊」的。「爲什麼？」——我都由牠去。但據我所知道，魏延變心，是在諸葛亮死後，我還活着。諸葛亮的頭銜是不能加到我這里來的，所以「無產階級大衆何時變成了阿斗？」的問題也就落了空。那些廢話，如果還記得『三國志演義』或吳稚暉先生的話，是不至於說出來的，書本子上及別人，並未說過人民是阿斗。現在請放心罷。但先生站在『小資產階級文學革命』的旗下，還是什麼『無產階級大衆』，自己的眼睛看見了這些字，不覺得可羞或可笑麼？不要再提這些字，怎麼樣呢？

其次是先生『驚心動魄』於我的老，可又『驚心動魄』得很稀奇。我沒有修煉仙丹，自然規則，一定要使我老下去。絲毫也不足爲奇的，請先生還是鎮靜一點的好，而且我後來還要死呢，這也是自然的規則，豫先聲明，請千萬不要『驚心動魄』，否則，逐漸就要神經衰弱，愈加滿口廢話了。我即使老，即使死，卻決不會將地球帶進棺材裏去，牠還年青，牠還存在，希望正在將來，目前也還可以插先生的

旗子。這一節我取保證，也請放心工作罷。

於是就要說到『三嘯』問題了。這事情是有的，但和新聞上所載的有些兩樣。那時是在一個飯店裏，大家閒談，談到有幾個人的文章，我確曾說：這些都只要以一噓了之，不值得反駁。這幾個人們中，先生也在內。我的意思是：先生在那冠冕堂皇的『自白』裏，明明的告白了農民的純厚，小資產階級的知識者的動搖和自私，卻又要來豎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就自己打着自己的嘴，不過也並未說出，走散了就算完結了。但不知道是輾轉傳開去的呢，還是當時就有新聞記者在座，不久就大張其辭的在報上登了出來，並請讀者猜測。近五六年來，關於我的記載多極了，無論爲毀爲譽，是假是真，我都置之不理，因爲我沒有聘定律師，常登廣告的鉅款，也沒有遍看各種刊物的工夫。況且新聞記者爲要哄動讀者，會弄些誇張的手段，是大家知道的，甚至於還全盤捏造。例如先生還在做『革命文學家』的時候，用了『小記者』的筆名，在一種報上說我領到了南京中央黨部的文學獎金，大開

筵宴，祝孩子的週年，不料引起了郁達夫先生對於亡兒的記憶，悲哀了起來。這真說得栩栩如生，連出世不過一年的嬰兒，也和我一同被噴滿了血汗。然而這事實的全出於創作，我知道，達夫先生知道，記者兼作者的您楊邨人先生當然也不會不知道。

當時我一聲不響。爲什麼呢？革命者爲遠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爲不錯的，所以即使因爲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來開刀，我也敢於咬着牙關忍受。殺不掉，我就退進野草裏，自己舐盡了傷口的血痕，決不煩別人敷藥。但是，人非聖人，爲了麻煩而激動起來的時候也有的，我誠然譏誚過先生『們』，這些文章，後來都收在『三閒集』中，一點也不刪去，然而和先生『們』的造謠言和攻擊文字的數量來比一比罷，不是不到十分之一麼？不但此也。在講演裏，我有時也會嘲笑葉靈鳳先生或先生，先生們以『前衛』之名，雄赳赳出陣的時候，我是祭旗的犧牲，則戰不數合便從火線上爬了開去之際，我以爲實在也難以禁絕

我的一笑。無論在階級的立場上，在個人的立場上，我都有一笑的權利的。然而我從未傲然的假借什麼『良心』或『無產階級大眾』之名，來凌壓敵手，我接着一定聲明：這是因爲我和他有些個人的私怨的。先生，這還不夠退讓麼？

但爲了不能使我負責的新聞記事，竟引起先生的『反感』來了，然而仍蒙破格的優待，在『新儒林外史』裏，還賞我拿一柄大刀。在禮儀上，我是應該致謝的，但在實際上，卻也如大張筵宴一樣，我並無大刀，只有一枝筆，名曰『金不換』。這也並不是在廣告不收虛布的意思，是我從小用慣，每枝五分的便宜筆。我確曾用這筆碰着了先生，不過也正如運用古典一樣，信手拈來，涉筆成趣而已，並不特別含有報復的惡意。但先生卻又給我掛上『三枝冷箭』了。這可不能怪先生的，因爲這只是陳源教授的餘唾。然而，即使算是在報復罷，由着上面所說的原因，我也還不至於走進『以怨報德』的隊伍裏面去。

至於所謂『北平五講與上海三嘯』。其實是至今沒有寫，聽說北平有一本『五

講」出版，那可並不是我做的，我也沒有見過那一本書。不過既然鬧了風潮，將來索性寫一點也難說，如果寫起來，我想名爲『五講三噓集』，但後一半也未必正是報上所說的三位。先生似乎羞與梁實秋張若谷兩位先生爲伍，我看是排起來倒也並不怎樣辱沒了先生，只是張若谷先生比較的差一點，淺陋得很，連做一『噓』的材料也不夠，我大概要零換一位的。

對於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見，寫起來恐怕也不會怎麼壞。我以爲先生雖是革命場中的一位小販，卻並不是奸商。我所謂奸商者，一種是國共合作時代的闊人，那時頌蘇聯、讚共產，無所不至，一到清黨時候，就用共產青年，共產嫌疑青年的血來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闊人，時勢變了，而不變其闊；一種是革命的驍將，殺土豪，倒劣紳，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稱爲『棄邪歸正』，罵『土匪』，殺同人，也激烈得很，主義改了，而仍不失其驍。先生呢，據『自白』，革命與否以親之苦樂爲轉移，有些投機氣味是無疑的，但並沒有反過來做大批的買賣，僅在竭力要化爲

『第三種人』，來過比革命黨較好的生活。既從革命陣線上退回來，爲辯護自己，做穩『第三種人』起見，總得有一點另星的懺悔，對於統治者，其實是頗有些益處的，但竟還至於遇到『左右夾攻的當兒』者，恐怕那一方面，還嫌先生門面太小的緣故罷，這和銀行僱員的看不起小錢店伙計是一樣的。先生雖然覺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種人』的存在不獨是左翼，卻因先生的經驗而證明了，這也是一種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論，先生是不算失敗的，雖然自己覺得被『夾攻』，但現在只要沒有馬上殺人之權的人，有誰不遭人攻擊。生活當然是辛苦的罷，不過比起被殺戮，被囚禁的人們來，真有天淵之別；文章也隨處能夠發表，較之被封鎖，壓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遠了。和閹人驍將比，那當然還差得很遠，這就因爲先生並不是商奸的緣故。這是先生的苦處，也是先生的好處。

話已經說得太多了，就此完結。總之，我還是和先前一樣，決不肯造謠說謊，

特別攻擊先生，但從此改變另一種態度，卻也不見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請先生也不要因為我的『將因為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工作』而原諒我，為幸。

專此奉答，並請

著安。

魯迅。

一九三三，一二，二八。

（選自南腔北調集——同文版。）

關於翻譯。

今年是『國貨年』，除『美麥』外，有些洋氣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雖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長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卻因為討厭洋服而記得了袍子和馬褂。翻譯也倒了運，得到一個籠統的頭銜是『硬譯』和『亂譯』。但據我所見，這些『批

評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譯』者，卻一個也沒有的。

創作對於自己人，的確要比翻譯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發生『硬作』，『亂作』的毛病，而這毛病，卻比翻譯要壞得多。我們的文化落後，無可諱言，創作力當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較的薄弱，是勢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時時取法於外國。所以翻譯和創作，應該一同提倡，決不可壓抑了一面，使創作成爲一時的驕子，反因容縱而脆弱起來。我還記得先前有一個排貨的年頭，國貨家販了外國的牙粉，搖鬆了兩瓶，裝作三瓶，貼上商標，算是國貨，而購買者卻多損失了三分之一；還有一種痲子藥水，模樣和洋貨完全相同，價錢却便宜一半，然而牠有一個大缺點，是搽了之後，毫無功效，於是購買者便完全損失了。

注重翻譯，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催進和鼓勵着創作。但幾年以前，就有了攻擊『硬譯』的『批評家』，搔下他舊瘡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藥上的麝香一樣，因爲少，就自以爲是珍奇。而這風氣竟傳佈開來了，許多新起的論者，今年都在開始

輕薄着販來的洋貨。比起武人的大買飛機，市民的拚命捐款來，所謂『文人』也者，真是多麼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譯』。理由還在中國有許多讀者層，有着並不全是騙人的東西，也許總有人會多少吸收一點，比一張空盤較爲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來感謝着翻譯的，例如關於蕭的毀譽和現在正在提起的題材的積極性的問題，在洋貨裏，是早有了明確的解答的。關於前者，德國的尉特甫格 (Karl Wittvogel) 在『蕭伯納是丑角』裏說過——

『至於說到蕭氏是否有意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這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哲學家們，也並不希望法國的大革命。雖然如此，然而他們都是引導着必至的社會變更的那種精神崩潰的重要勢力。』(劉大杰譯：『蕭伯納在上海』所載。)

關於後者，則恩格勒在給明那·考茨基 (Minna Kautsky) ，就是現存的考茨基

的母親」的信裏，已有極明確的指示。對於現在的中國，也是很有意義的——

『還有，在今日似的條件之下，小說是大抵對於布爾喬亞層的讀者的，所以，由我看來，只要正直地敘述出現實的相互關係，毀壞了罩在那上面的作偽幻影，使布爾喬亞世界的樂觀主義動搖，使對於現存秩序的永遠的支配起疑，則社會主義的傾向的文學，也就十足地盡了牠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這時並未提出什麼特定的解決，或者有時連作者站在那一邊也不很明白。』（日本上田進原譯，『思想』百三十四號所載。）

（八月二日。）

（選自偽自由書 青光版。）

一九三四年

憶韋素園君

我也還有記憶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覺得我的記憶好像被刀括過了的魚鱗，有些還留在身體上，有些是掉在水裏了，將水一攪，有幾片還會翻騰，閃爍，然而中間混着血絲，連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賞鑑家的眼目。

現在有幾個朋友要紀念韋素園君，我也須說幾句話。是的，我是有這義務的。我只好連身外的水也攪一下，看看泛起怎樣的東西來。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罷，我在北京大學做講師，有一天，在教師預備室裏遇見了一個頭髮和鬍子統統長得要命的青年，這就是李霽野。我的認識素園，大約就是霽

野介紹的罷，然而我忘記了那時的情景。現在留在記憶裏的，是他已經坐在客店的一間小房子裏計畫出版了。

這一間小房子，就是「未名社」。

那時我正在編印兩種小叢書，一種是「烏合叢書」，專收創作，一種是「未名叢刊」，專收翻譯，都由北新書局出版。出版者和讀者的不喜歡翻譯書，那時和現在也並不兩樣，所以「未名叢刊」是特別冷落的。恰巧，素園他們願意介紹外國文學到中國來，便和李小峯商量，要將「未名叢刊」移出，由幾個同人自辦，小峯一口答應了，於是這一種叢書便和北新書局脫離。稿子是我們自己的，另籌了一筆印費，就算開始。因這叢書的名目，連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並非「沒有名目」的意思，是「還沒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還未成了」似的。

未名社的同人，實在並沒有什麼雄心和大志，但是，願意切切實實的，點點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幹就是素園。

于是他坐在一間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裏辦事了，不過小半好像也因為他生着病，不能上學校去讀書，因此便天然的輪着他守寨。

我最初的記憶是在破寨裏看見了素園，一個瘦小，精明，正經的青年，窗前的幾排破舊外國書，在證明他窮着也還是釘住着文學。然而，我同時又有了一種壞印象，覺得和他是很難交往的，因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種特色，不過素園顯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夠令人感得。但到後來，我知道我的判斷是錯誤了，和他也並不難于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約是因為年齡的不同，對我的一種特別態度罷，可惜我不能化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確證了。這真相，我想，霽野他們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誤解之後，却同時又發見了一個他的致命傷：他太認真；雖然似乎沈靜，然而他激烈。認真會是人的致命傷的麼？至少，在那時以至現在，

可以是的。一認真，便容易趨於激烈，發揚則送掉自己的命，沈靜着，又嚙碎了自己的心。

這裏有一點例子。——我們是有小例子的。

那時候，因為段祺瑞總理和他的幫閒們的壓迫，我已經逃到廈門，但北京的狐虎之威還正是無窮無盡。段派的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林素園，帶兵接收學校去了，演過全副武行之後，還指留着的幾個教員爲「共產黨」。這個名詞，一向就給有一些人以「辦事」上的便利，而且這方法，也是一種老譜，本來並不希罕的。但素園却好像激烈起來了，從此以後，他給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惡「素園」兩字而不用，改稱爲「漱園」。同時社內也發生了衝突，高長虹從上海寄信來，說素園壓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講一句話。我一聲也不響。于是在「狂飈」上罵起來了，先罵素園，後是我。素園在北京壓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長虹來抱不平，要在

廈門的我去下判斷，我頗覺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個團體，雖是小小的文學團體罷，每當光景艱難時，內部是一定有人起來搗亂的，這也並不希罕。然而素園却很認真，他不但寫信給我，敘述詳情，還作文登在雜誌上剖白。在一天才一們的法庭上，別人剖白得清楚的麼？——我不禁長長的歎了一口氣，想到他只是一個文人，又生着病，却這麼拚命的對付着內憂外患，又怎麼能夠支持呢。自然，這僅僅是小憂患，但在認真而激烈的個人，却也相當的大。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幾個人還被捕。也許素園已經咯血，進了病院了罷，他不在內。但後來，被捕的釋放，未名社也啓封了，忽封忽啓，忽捕忽放，我至今還不明白這是怎麼的一個玩意。

我到廣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仍舊陸續的接到他幾封信，是在西山病院裏，伏在枕頭上寫就的，因為醫生不允許他起坐。他措辭更明顯，思想也

更清楚，更廣大了。但也更使我擔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書，是布面裝訂的素園翻譯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個寒噤：這明明是他送給我的一個紀念品，莫非他已經自覺了生命的期限了麼？

我不忍再翻閱這一本書，然而我沒有法。

我因此記起，素園的一個好朋友也略過血，一天竟對着素園咯起來，他慌張失措，用了愛和憂急的聲音命令道：「你不許再吐了！」我那時却記起了伊孛生的「勃蘭特」。他不是命令過去的人，從新起來，却並無這神力，只將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麼？……

我在空中看見了勃蘭特和素園，但是我沒有話。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為倣倣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園談了天。他爲了日光浴，皮膚被曬得很黑了，精神却並不萎頓。我們和幾個朋友都很高興。但

我在高興中，又時時夾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愛人，已由他同意之後，和別人訂了婚；忽而想到他竟連介紹外國文學給中國的一點志願，也怕難于達到；忽而想到他在這裏靜臥着，不知道他自以爲是在等候全愈，還是等候滅亡；忽而想到他爲什麼要寄給我一本精裝的一外套？……

壁上還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畫像。對於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殘酷到了冷靜的文章。他佈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個個拉了不幸的人來，拷問給我們看。現在他用沈鬱的眼光，凝視着素園和他的臥榻，好像在告訴我：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裏的不幸的人。

自然，這不過是小不幸，但在素園個人，是相當的大。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時半，素園終於病歿在北平同仁醫院裏了，一切計畫，一切希望，也同歸于盡。我所抱憾的是因爲避禍，燒去了他的信札，我只能將一

本「外套」當作唯一的紀念，永遠放在自己的身邊。

自素園病歿之後，轉眼已是兩年了，這其間，對於他，文壇上並沒有人開口。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傑，活的時候，既不過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後，當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沒。但對於我們，却是值得紀念的青年，因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現在是幾乎消滅了，那存在期，也並不長久。然而自素園經營以來，紹介了果戈理 (N. 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 (F. Dostoevsky)，安特列夫 (L. Andreev)，紹介了望·藹草 (F. van Eeden)，紹介了愛倫堡 (I. Ehrenburg) 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 (B. Lavrenev) 的「四十一」。還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叢蕪的「君山」，靜農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花夕拾」，在那時候，也都還算是相當可看的作品。事實不為輕薄陰險小兒留情，曾幾何年，他們

就都已煙消火滅，然而未名社的譯作，在文苑裏却至今沒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園却並非天才，也非豪傑。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牠多。他不入于觀賞者的眼中，只有建築者和栽植者，決不會將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蠶起，既以自銜，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現在我以這幾千字紀念我所熟識的素園，但願還沒有營私肥己的處所，此外也別無話說了。

我不知道以後是否還有記念的時候。倘止于這一次，那麼，素園，從此別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之夜。

（選自文學——生活版。）

一九三五年

病後餘談

我常說明朝永樂皇帝的凶殘，遠在張獻忠之上，是受了宋端儀的立齋開錄的影響的。那時我還是滿洲治下的一個拖着辮子的十四五歲的少年，但已經看過記載張獻忠怎樣屠殺蜀人的蜀碧，痛恨着這「流賊」的凶殘。後來又偶然在破書堆裏發見了一本不全的立齋開錄，還是明抄本我，就在那書上看見了永樂的上諭。於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樂身上去了。

那時我毫無什麼歷史的知識，這憎恨轉移的原因，是極簡單的，只以為流賊尚

可，皇帝却不該，還是「禮不下庶人」的傳統思想。至於立齋開錄，好像是一部少見的書，作者是明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少就可想而知。記得彙刻書目說是在明代的一部什麼叢書中，但這叢書我至今沒有見；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牠放在存目裏，那麼，四庫全書裏也是沒有的。我家並不是藏書家，我真不解怎麼會有這明抄本，這書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為肚子餓得慌了，才和別的兩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宮闈秘典去賣給以藏書家和學者出名的傅某，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後，才說一總給我八塊錢，我賭氣不賣，抱回來了，又藏在北平的寓裏；但久已沒有人照管，不知道現在究竟怎樣了。

那一本書，還是四十年前看的，對於永樂的憎恨雖然還在，書的內容却早已模糊胡胡，所以在前幾天寫病後雜談時，舉不出一句永樂上諭的實例。我也很想看一看永樂實錄，但在上海又如何能夠；來青閣有殘本在奇售，十本，實價却是一百六十元，也決不是我輩書架上的書。又是一個偶然昨天在安徽叢書第三集中看見了清

俞正燮（1775—1840）癸巳類稿的改定本，那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裏，却引有永樂皇帝的上諭，是很據王世貞弇洲史料中的南京法司所記的，雖然不多，又未必是精粹。但也足夠「略見一斑」，和獻忠流賊的作品相比較了。摘錄於下——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口奏：齊泰姊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女，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子有奏請聖旨。奉欽依：由他的。不到長大便是個淫賊材兒？」

「鐵鉉妻楊氏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張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病故。教坊司安政於奉天門奏。奉聖旨：分付上元縣抬出門去，着狗喫了！欽此！」

君臣之間的問答，竟是這等口吻，不見舊記，恐怕是萬想不到的罷。但其實，這也僅僅是一時的一例。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

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俞正燮看過野史，正是一個因此覺得義憤填膺的人，所以在記載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戶，罷教坊，停女樂的故事之後，作一結語道——

「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後晉高祖，金，元，及明景帝，於法寬假之，而尚存其舊。除皆視爲固然。本朝盡去其籍，而天地爲之廓清矣。

漢儒歌頌廷功德，自云「舒憤懣」，除樂戶之事，該可以舒憤懣者；故列古語瑣事之實，有關因革者如此。」

這一段結語有兩事使我吃驚。第一件事，是寬假奴隸的皇帝中，漢人居很少數。但我疑心俞正燮還是考之未詳，例如金，元，是並非厚待奴隸的，只因那時連中國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隸，從征服者看來，並無高下，即所謂「一視同仁」，於是就好像對於先前的奴隸加以寬假了。第二事，就是這自有歷史以來的虐政，竟必待滿洲的清才來廓清使考史的儒生，爲之拍案稱快，自比於漢儒的「舒憤懣」——就是

明末清初才了們之所謂「不亦快哉」，然而解放樂戶却是真的，但又並未「廓清」，例如這紹興的惰民，直到民國革命之初，他們還是不與良民通婚，去給大戶服役，不過已有報酬，這一點，恐怕是和解放之前大不相同的了。革命之後，我久不回到紹興去了，不知道他們怎樣，推想起來，大約和三十年前是不會有什麼兩樣的。

二

但俞正燮的歌頌清朝功德，却不得不說是當然的事。他生於乾隆四十年，到他壯年以至晚年的時候，滿洲人的凶燄已經緩和，那時的禁書，我想他都未必看見。現在不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最陰險的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爲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却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遠看不出底細來。

嘉慶道光以來，珍重宋元版本的風氣逐漸旺盛，也沒有悟出乾隆皇帝的「聖慮」，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書籍很有些出版了，這就使那時的陰謀露了馬脚。最初啓示了我的是琳琅祕室叢書裏的兩部茅亭客話，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庫本，同是一種書，而兩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關於「華夷」的處所。這一定是四庫本刪改了的；現在連影宋本的茅亭客話也已出版，更足據爲鐵證，不過倘不和四庫本對讀，也無從知道那時的陰謀。琳琅祕室叢書我是在圖書館裏看的，自己沒有，現在去買起來又嫌太貴，因此也舉不出實例來。但還有比較容易的法子在。

新近陸續出版的四部叢刊續編自然應該說是一部新的古叢書，但其中保存着滿清暗殺中國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邁的容齋隨筆至五筆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據張元濟跋，其中有三條就爲清代刻本中所沒有。所刪的是怎樣內容的文章呢？爲惜紙墨計，現在只摘錄一條容齋三筆卷三裏的，北狄俘虜之苦在這裏——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無分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

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盡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爲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責火得煖氣，燃纒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卽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圍坐地上，以敗席或蘆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

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殘，還要替金人來掩飾他們的凶殘。據此一條，可見俞正燮入金朝於仁君之列，是不確的了，他們不過是一掃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爲奴隸，而自己則是主子。但是，這校勘，是用清朝的書坊刻本的，不知道四庫本是否也如此。要更確鑿，還有一部也是四部叢刊續編裏的影舊抄本宋晁說之嵩山文集在這裏，卷末就有單將負薪對一篇和四庫本相對比，以見一班的實證。現在摘錄幾條

在下面，大抵非刪則改，語意全非，彷彿宋臣晁說之，已在對金人或慄，囁嚅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

舊抄本

四庫本

金賊以我疆場之臣無狀，斥侯不遂，遂逐豕突河北，蛇結河東。

金人擾疆場之地，邊城斥侯不明，遂長驅河北，盤結河東。

犯孔子春秋之大禁，……

爲上下臣民之大恥，……

以百騎却虜梟將，……

以百騎却遼梟將，……

彼金賊雖非人類，而犬豕亦有掉瓦恐

彼金人雖甚強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

掉瓦恐怖之號，顧弗之懼哉！

以威令之森嚴，顧弗之懼哉！我因

我取而殲焉可也。

而取之可也。

太宗時，女真困於契丹之三柵，信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不謂敢眦睨

太宗時，女真困於契丹之三柵，控告乞援，亦和好甚矣。不謂敢眦釀思滋

中國之地於今日也。

禍一至於今日也。

忍棄上皇之子於胡虜乎？

忍棄上皇之子於異地乎？

何則：夷狄喜相吞併鬥爭，是其犬羊

猜吠咋嚙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

。古今夷狄族帳，大小見於史冊者

（無）

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財富

而自底滅亡者也。今此小醜不指日

而滅亡，是無天道也。

褫中國之衣冠，復夷狄之態度。

遂其報復之心，肆其凌侮之意。

取故相家孫女姊妹，縛馬上而去，執

故相家皆攜老嫗幼，棄其籍而去，焚掠

待帳中，遠近胆落，不暇寒心。

之餘，遠近胆落，不暇寒心。

即此數條，已可見「賊」「虜」「犬羊」是諱的；說金人的淫掠是諱的；「夷

狄」當然要諱，但也不許看見「中國」兩個字，因為這是和「夷狄」對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種族思想來的。但是，這嵩山文集的抄者不自改，讀者不自改，尙存舊文，使我們至今能夠看見晃氏的真面目，在現在說起來，也可以算是令人大「舒憤懣」的了。

清朝的考據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後，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今人標點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着糞：這是古書的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

三

對於清朝的憤懣的從新發作，大約始於光緒中，但在文學界上，我沒有查過以離爲「禍首」。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滿的驍將著名的，然而在他那廬書的未改訂本

中，還承認滿人可以主中國，稱爲「客帝」，比於嬴秦的「客卿」，但是，總之，到光緒末年，翻印的利於清朝的古書，可是陸續出現了；太炎先生也自己改正了，「客帝」說，在再版的「楹書」裏「刪而存此篇」；後來這書又改名爲檢論，我却不知道是否還是這辦法。留學日本的學生們中的有些人，也在圖書館裏搜尋可以鼓吹革命的明末清初的文獻。那時印成一大本的有漢聲，是湖北學生界的增刊，面子上題着四句集文選句：「舒懷舊之積念，發思古之幽情」，第三句想不起來了，第四句是「振大漢之天聲」，無古無今，這種文獻倒是總要在外國的圖書館裏抄得的。

我生長在偏僻之區，毫不知道什麼是滿漢，只在飯店的招牌上看見過「滿漢酒席」字樣，也從不引起什麼疑問來。聽人講「本朝」的故事是常有的，乾隆皇帝南巡的盛事也很少有人講述了，最多的是「打長毛」。我家裏有一個年老的女工，她說長毛時候，她已經十多歲，長毛故事要算她對我講得最多，但她並無邪正之分，只說最可怕的东西有三種，一種自然是「長毛」，一種是「短毛」，還有一種是「花

「綠頭」——到得後來，我才明白後兩種其實是官兵，但在愚民的經驗上，是和長毛並無區別的。給我指明長毛之可惡的倒是幾位讀書人；我家裏有幾部縣志，偶然翻開來看，那時殉難的烈士烈女的名冊就有一兩卷，同族裏的人也有幾個被殺掉的，後來封了「世襲雲騎尉」，我於是確切的認定了長毛之可惡。然而，真所謂「心事如波濤」罷，久而久之，由於自己的閱歷，證以女工的講述，我竟決不定那些烈士烈女的兇手，究竟是長毛呢，還是「短毛」或「花綠頭」了。我真很慕羨「四十而不惑」的聖人的幸福。

對我最初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這辮子，是吹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而且還要從辮子上玩出花樣來；小丑挽一個結，插上一朵紙花打諢；開口跳將小辮子掛在鐵杆上，慢慢的吸煙獻本領；變把戲的不必動手，只消將頭一搖，辟拍一聲，辮子便

自會跳起來盤在頭頂上，他於是耍起關王刀來了。而且還切於實用；打架的時候可以拔住，掙脫極難；捉人的時候可以拉着，省得繩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辮梢頭，一個人就可以牽一大串。吳友如畫的申江勝景圖裏，有一幅會審公堂，就有一個巡捕拉着犯人的辮子的形像，但是，這是已經算作「勝景」了。

住在偏僻之區還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時會聽到一句洋話；Pig tail——豬尾巴。這一句話，現在是早不聽見了，那意思，似乎也不過說人頭上生着豬尾巴，和今日之上海，中國人自己一鬥嘴，便彼此互罵爲「豬囉」的，還要客氣得遠。不過那時的青年，好像涵養工夫沒有現在的深，也還未懂得「幽默」，所以聽起來實在覺得刺耳。而且對於擁有二百餘年歷史的辮子的模樣，也漸漸的覺得並不雅觀，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又打起來拖在背後，真好像做着好給別人來拔着牽着的柄子。對於牠終於懷了惡感，我看也是人情之常，不足怪的。

我的辮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給客店裏的一位使女做了假髮，一半給了理髮匠，人是在宣統初年回到故鄉來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裝假辮子。這時上海有一個專裝假辮的專家，定價每條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約那時的留學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別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學生，留心研究起來，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裏要防擠掉或擠歪，也不行。裝了一個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原沒有辮子更不好看麼？索性不裝了。賢人說過的：一個人做人要真實。

但這真實的代價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時，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全和先前兩樣了。我從前是只以為訪友作客，才有待遇的，這時才明白白路上也一樣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獸看。但大抵是冷笑，惡罵。小則說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為那時捉住奸夫，總是首先剪去他辮子的，我至今還不明白為什麼；大則指為「裏通外國」，就是

現在之所謂「漢奸」。我想，如果一個沒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還未必至於這麼受苦，假使沒有了影子，那麼，那恐怕也要這樣的受社會的責罰了。

我回中國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員，還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鄉紹興中學去做學監，却連洋服也不行了，因為有許多人是認識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裝束，總不失爲「裏通外國」的人，於是我所受的無辮之災，以在故鄉爲第一。尤其應該小心的是滿州人的紹興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學校來，總喜歡注視我的短頭髮，和我多說話。

學生們裏面，忽然起了剪辮風潮了，很有許多人要剪掉。我連忙禁止。他們就舉出代表來詰問道：究竟有辮子好呢，還是沒有辮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覆是：沒有辮子好，然而我勸你們不要剪。學生是向來沒有一個說我「裏通外國」的，但從這時起，却給了我一個「言行不一致」的結語，看不起了。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後來紹興也掛起白旗來。算

是革命了，我覺得革命給我的好處，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從此可以昂頭露頂，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聽到什麼嘲罵。幾個也是沒有辮子的老朋友從鄉下來，一見面就摩着自己的光頭，從心底裏笑了出來道：哈哈，終於也有了這一天了。

四

然而辮子還有一場小風波，那就是張勳的「復辟」，一不小心，辮子是又可以種起來的，我曾見他的辮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對於沒辮子的人們真是氣餒萬丈，幸而不幾天就失敗了，使我們至今還可以剪短，分開，披落，燙捲……

張勳的姓名已經暗淡，「復辟」的事件也逐漸遺忘，我曾在風波裏提到牠，別的作品上卻似乎沒有見，可見早就不受人注意。現在是，連辮子也日見稀少，將與周鼎商彝同列，漸有賣給外國的資格了。

我也愛看繪畫，尤其是人物。國畫呢，方巾長袍，或短褐椎結，從沒有見過一

條我所記得的辮子；洋畫呢，歪臉漢子，肥腿女子，也從沒有見過一條我所記得的辮子。這回見了幾幅鋼筆畫和木刻的阿Q像，這才算遇到了在藝術上的辮子，然而是一條生得合式的。想起來也難怪，現在的二十歲上下的青年，他生下來已是民國，就是三十歲的，在辮子時代也不過四五歲，當然不會深知道辮子的底細的了。

（十二月十七日。）

一星期後，我在病後雜談裏說到鐵氏二女的詩。據杭世駿說，鐵謙益編的歷朝詩集裏是有的，但我沒有這書，所以只引了訂譌類編完事。今天四部叢刊讀篇的明遺民彭貽茗齋集出版了，後附明詩抄，却有鐵氏長女詩在裏面。現在就照抄在這裏，並將范昌期原作，與所謂鐵女詩不同之處，用刮弧附注在下面，以便比較。照此看來，作僞者實不過改了一句，并每句各改易一二字而已。

教坊獻詩

教坊脂粉（落籍）洗鉛華，一片閒（春）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空）有恨，故園歸去已（却）無家。雲鬟半挽（蹕）臨粧（青）鏡，兩淚空流（頻彈）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安得江州司馬在），尊前重與訴（爲賦）琵琶。

但俞正燮癸己類稿又據茅大芳希董集，言「鉄公妻女以死殉」；并記或一說云：「鉄二子，無女。」那麼，連鉄鉉有無女兒，也都成爲疑案了。兩個近視眼論扁額上字，辯論一通，其實連扁額也沒有掛，原也是能有的事實。不過鉄妻死殉之說，我以爲是粉飾的。弇州史料所記，奏文與上諭具存，王世貞明人，決不敢捏造。

倘使鉄鉉真的並無女兒，或有而實已自殺，則由這虛構的故事，也可以窺見社會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難者家族中，無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殺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鉄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淪教坊，終覺於心不安，所以還是和尋常女子不同，因獻詩而配了士子。這和小生落難，下獄挨打，到底中了狀元的公式，

完全是一致的。

（二十三日之夜，附記。）

（選自文學——生活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6 12 69128

魯迅論文選集

定價大洋貳元

特價大洋二角

著者 魯迅

選者 阿良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出版

上海山東路榮吉里

龍虎書店

版權所有

總發行

